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賴盈銓博士



索忍尼辛小說《癌症病房》
權力與空間研究

碩士班研究生：呂正山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碩士論文題目：

索忍尼辛小說《癌症病房》
權力與空間研究

研究生：呂正山

指導教授：

郭 盈 銓

(簽章)

審查教授：

李 鈺 梅

(簽章)

鄔 定 嘉

(簽章)

郭 盈 銓

(簽章)

系主任：

郭 盈 銓

(簽章)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班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28 日

題 獻

謹以此微小成果敬獻養育我的父母



誌 謝

這部論文的付梓，花費約莫三年的時間；但若是談到與俄文的結緣，那就是一段從大一延續到今的故事了。對於俄文系（現為斯語系），我有著滿滿的感謝，因為她帶給我太多太多：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文化，還有最重要的，許許多多讓我感懷與尊敬的人們。指導教授——賴盈銓老師，在我的論文寫作道路乃至人生價值的引導上，都有著難以抹滅的影響。三年來，無論是在論文的指導或是課堂教誨，老師的風範都給予我很大的啟發；同時，老師對於我的構想亦能給予支持與改善，因此這部論文得以面世，老師的教導居功厥偉。兩位論文審查委員李細梅老師以及鄢定嘉老師在論文大綱審查和口試期間的指教與鼓勵，讓這部論文更臻完備，每每想及總令我感念在心！我也要感謝徐孟宜老師及中研院陳相因老師的關心，讓我更有動力去攀爬這座學術的天梯。感謝學長姐的建議與協助，以及同學、學弟妹的相互切磋與砥礪。謝謝親愛的朋友們這段時間給予我的協助和鼓勵。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父母及弟弟，給予我有形無形的支持和愛，沒有你們，就不會有這部論文，我愛你們！

謝謝斯語系帶給我的一切，再次感謝大家！

呂正山

謹誌於政治大學

2011年8月

摘要

俄國作家索忍尼辛在其文學創作生涯中，以不凡勇氣對抗蘇聯體系聞名於世，並因對俄羅斯文學精神價值的延續而榮膺 1970 年諾貝爾文學獎。過往對於索忍尼辛的研究受到冷戰政治語境的限制而有所侷限，然今日觀之，其創作中雖有許多對於蘇聯體制的直接指涉與批判，但其中的藝術內涵與永恆價值仍值得文學研究者深究。具有高度自傳色彩的小說《癌症病房》以作家曾罹患癌症並奇蹟痊癒的經歷寫就，該作品雖是以癌症病房為背景，但延續作家在創作中對於蘇聯的批判傳統，文本呈現權力、空間與個體的深刻互動：權力透過種種規訓手段對個體加以馴化，個體則透過不同方式對權力進行抵制，權力關係在兩者的積極互動之中成形；空間成為權力施展與個體抵抗的場域，以及反映個體權力之消長等多重角色。本論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以傅柯的權力理論分析小說中所存在的規訓權力；接著以傅柯的異質空間理論和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析論癌症病房同時亦為一抵抗場域，並分析小說中個體的抵抗形式及其意義；最後續以異質空間理論，分析小說中病房外的其它空間在喻示個體權力之升沉所具備的意涵。

關鍵詞：權力、規訓、抵抗、空間、異質空間、廣場、狂歡化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壹、研究動機.....	1
貳、研究目的.....	5
第二節 研究途徑、研究方法、研究客體與主題.....	7
壹、研究途徑.....	7
貳、研究方法.....	11
參、研究客體（объект）與主題（предмет）.....	11
第三節 研究限制及預期貢獻.....	12
壹、研究限制.....	12
貳、預期貢獻.....	12
第四節 研究課題.....	13
第五節 文獻回顧.....	14
第六節 索忍尼辛相關評述.....	17
壹、索忍尼辛抗議文學創作.....	17
貳、索忍尼辛的權力觀.....	21
第七節 西方暨俄國相關權力理論評述.....	25
壹、西方相關權力理論研究.....	25
貳、俄國相關權力理論研究.....	27
第二章 《癌症病房》的規訓權力探討.....	35
第一節 傅柯權力理論概述.....	36
壹、傅柯其人與其研究的主要範疇.....	36
貳、傅柯的權力理論.....	36
第二節 醫院規訓權力探討.....	40
壹、醫院規訓權力的特性.....	40
貳、醫院中的層級監視.....	40
參、增加可見性的規訓——檢查和巡房.....	42
第三節、社會規訓權力探討.....	46
壹、規範化裁決的作用.....	46

貳、規訓手段——引入文件領域	48
參、全景敞視的規訓社會	50
第三章 《癌症病房》中的抵抗形式與意義探討	55
第一節 「抵抗」在傅柯權力理論中的意義	56
第二節 作為抵抗場域的癌症病房	58
壹、異質空間角度的詮釋	58
貳、癌症病房的狂歡化意涵	60
第三節 個體對醫療的抵制形式及意義探討	66
壹、科斯托格洛托夫作為抵抗者的外在形象與精神特點	67
貳、對注射之醫療的抵抗及其意涵	68
參、對射線治療（ <i>рентгеновские лечения</i> ）的抵抗	70
肆、自我治療中的抵抗意識	71
伍、拒絕做為知識輸出之個體的意涵	73
第四節 對性意識之捍衛的形式及其意涵	75
第四章 《癌症病房》的異質空間探討	83
第一節 流放地	84
第二節 國營百貨商店	89
第三節 動物園	94
第四節 薇拉的住所	99
第五章 結論	103
參考書目	107
附錄：俄文摘要	11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在俄羅斯民族爭取自由的歷史過程中，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忍尼辛（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1918 – 2008）¹以其文學及政論對史達林極權統治展開的抵抗方式，是史無前例的。索忍尼辛艱難且充滿作品驚奇的一生中，扮演過各式各樣，甚至互相矛盾的角色，包括愛國者、反叛者²、反共鬥士、先知³、俄羅斯良心、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等，其在世時就已被視為一個歷史人物被評價著。直到 2008 年溘然辭世，俄羅斯政治領導人對他公開盛譽，有如錦上添花追認其歷史功業，雖對於他這樣一位終身對抗蘇聯國家機器的作家來說，不啻錦上添花，卻也反映歷史的詭譎，但就其不朽的歷史地位而言，實多此一舉。

索忍尼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有其東西方冷戰背景，世人對作家索忍尼辛在政治方面的涉入給予各種不同評價，隨著冷戰結束，傳統政治思想、意識型態互解，全球思潮興起，用理性、客觀態度研究索忍尼辛的精神資產、世界觀的時機已臻成熟。我們必須指出，過往由於索忍尼辛反共義士的鮮明形象，與冷戰時期的東西對峙態勢，很容易令人以過於先人為

¹ 台灣譯為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忍尼辛，中國大陸採俄語發音，將其姓氏直譯為索爾仁尼琴，港澳普遍譯為索贊尼辛；另有索善尼琴、索忍尼津等譯法。本論文採台灣譯法。

² Большеv A.O., *Исповедально-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начало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СПб: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с. 86.

³ Антонов А., Пророк в своём отечестве и мире // *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1998-2003): Писатели, критик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ы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Альманах*.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5, сс. 87-89.

主，甚至帶有目的性的眼光，去詮釋與解讀索忍尼辛的作品，甚至有英美學者對於索忍尼辛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抱持保留的態度，認為他是時勢創造的英雄，對於他的藝術造詣存有不同的解讀。⁴筆者認為，在冷戰時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意識形態對抗氣氛下，對於索忍尼辛之言論，往往失之簡化甚至流為輕率評斷的制式反應所造成的結果。在面對別人指稱自己「似乎偏愛於成為具歷史性影響力的歷史小說作家，因此純文學技巧較為次要」⁵的質疑時，索忍尼辛曾經提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以文學藝術的角度審視，因為政治性論述使他「深感侷限」，文學作品則為「多面的、豐富的表現」⁶。正如同瑞典皇家學院在頒贈索忍尼辛諾貝爾文學獎的頌辭中所提及，索忍尼辛的作品體現「對俄羅斯傳統的繼承，這是不可摧毀的對『人的尊嚴』的肯定和破壞這一尊嚴的一切企圖的批判」，⁷頌辭中更提到，「個人不應作為集體一員出現…個人的命運體現在百萬人中間，而百萬人的命運體現在個人身上」⁸，此「為人類而藝術」創作理想之根源，必須從作家的生命歷程進行檢視。

索忍尼辛出生自一個殷實而富有教養的農民家庭，其「命中帶箭」的際遇——尚在母親懷胎時，父親即在狩獵中受傷致死，似預告其傳奇的一生。他曾參加二次大戰，在戰爭中因英勇表現而獲得殊榮。卻於戰爭勝利前夕，因在信件中對史達林使用不敬之詞而遭舉發，因而獲罪進入集中營服刑，刑滿之後又被流放到哈薩克。流放期間他罹患癌症，卻奇蹟似地痊癒，此後他便戮力創作。當時適逢赫魯雪夫對史達林進行批判，索忍尼辛的作品因符合其政治需要而得以出版，遂誕生了一系列帶有自傳色彩的創作，包括《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1962）、《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 1962-1978）、《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1973-1980）等小說。此外，他亦出版了《瑪特遼娜的小屋》

⁴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時正是他在蘇聯文藝界被迫害得最為嚴重的時刻，難免招來不少英文評家批評，索氏作品能得獎原因大部分來自政治因素。」——引自陳相因，〈時代的考驗：回顧與評論索忍尼辛〉，《思想》，第10期，2008，頁58。

⁵ 奧古斯坦（Rudolf Augstein）訪問，歐茵西譯，〈紅色巨輪的悲劇——索忍尼辛的文學觀與歷史觀〉，《聯合文學》，第五卷，第八期，台北：聯合文化，1989，頁170-171。

⁶ 同上註。

⁷ 索忍尼辛著，姜明河譯，〈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癌症樓》。南京：譯林，2009，頁581。

⁸ 同上註。

(Матрёнин двор, 1963)、《克雷切托夫卡車站紀事》(Случай на станции Кречетовка, 1963) 等作品，以及本論文所研究的小說《癌症病房》(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1963-1966)。⁹

身為蘇聯集中營文學的開創者，索忍尼辛不僅讓自己的作品在地下廣泛流傳，他亦幫助那些無法通過蘇維埃官方審查的作家秘密流通自己的作品，使地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於 1960-70 年代在蘇聯廣泛流傳。但這一切作為觸怒了蘇聯當局，1969 年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1970 年索忍尼辛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此時他的《古拉格群島》在海外出版，視其此舉為背叛行為的蘇聯當局將他驅逐出境，直到蘇聯解體前他都未再踏上俄羅斯土地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索忍尼辛是俄國作家中少數與台灣有過直接交集的人物。作為堅定的反共鬥士，他對於同樣身處反共前沿的台灣有著同情與認同，因此他曾於 1982 年來到台灣，並發表〈給自由中國〉演說，在國內造成極大轟動。¹⁰但綜觀當時的文獻，仍不難看出台灣學界及輿論界對於索忍尼辛仍反映某種政治語境下的傾向性，索忍尼辛作為「俄羅斯的良心」，其文本在時間的推移下，已成為俄羅斯思想與文化的重要成分，此時回顧其作品若輔以新的探討視角，相信能夠為索忍尼辛研究挖掘出新意。

《癌症病房》的創作背景來自索忍尼辛在流放期間罹癌的經歷。他回憶，在 1953 年 3 月史達林死訊傳來不久，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且醫生宣布他的生命已不超過三個星期。¹¹但後來的痊癒改變了他的一生，索忍尼辛從中看到了上帝的旨意：給他延期，為的是替 1917 年後受難的俄國人民和所有已死去的人申訴。¹²

⁹ 台灣譯為《癌症病房》，其它地區亦有譯作《癌症樓》、《癌病房》等。本論文採台灣譯法。

¹⁰ 有關索忍尼辛訪台經過及輿論迴響，可參考吳豐山等編著的《索忍尼辛及其訪華始末》(台北：自立晚報，1982 年)及中央日報印行的《索忍尼辛與自由中國》(台北：中央日報，1982)。

¹¹ Васильев В. 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под. Ред. Т. Н. Нагайцевой. – СПб: Нева, 1998, с. 395.

¹² 阿格諾索夫主編，凌建侯等譯，《20 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1，頁 510。

索忍尼辛嘗言，「《癌症病房》寫生與死的拉鋸，寫人如何在死亡邊緣掙扎、如何死去。」¹³強調作品中「生與死」的主題，或許是索忍尼辛在面臨出版本書的壓力時一貫的說法¹⁴，因為作為一個異議作家的作品，《癌症病房》在蘇聯境內遲遲未能出版，這乃是由於作品當中隱含著對蘇聯體制的控訴與質疑而遭到當局猜忌所致。因此索忍尼辛在 1967 年面對蘇聯作家協會的質問時，否認《癌症病房》具有象徵意義，他堅持該小說寫的就是一個醫療事件，「其主題明白無誤的、確確實實的就是說癌症」。¹⁵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認同這個觀點，認定《癌症病房》當中不存在對於蘇聯政權的指控，也不認為《癌症病房》就是對於集中營的隱喻。¹⁶但是細心的讀者不難發覺，無論是直接地指涉抑或是隱喻的語言，其實《癌症病房》所針對者，乃是集中營與其背後所代表的蘇聯體制。例如，當小說主人翁科斯托格洛托夫（Олег Филимонович Костоготов）從側面得知流放可能終止的時候，他自忖，「我的天哪，要知道是時候到了！早該這樣做了，難道不是嗎！——一個人會由於腫瘤而喪命，一個國家增生了許多集中營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癌》，353）¹⁷

在閱讀索忍尼辛的作品時，很容易就會感受到他字裡行間對於個體的關注：權力機制無所不在、如影隨形地監視與介入；而他小說中的正面形象則是以一種姿態與之抗衡，以保存關於自身那一絲微弱卻凜然不可侵的力量，令人動容。而這樣的特質，在小說《癌症病房》中亦獲得體現。

《癌症病房》主角科斯托格洛托夫大學時因論及對史達林不敬的言論而被判有罪，入集中營服刑，二次大戰爆發後他曾從軍，戰後被永久流放到中亞一帶，後因癌症病重才獲准進入醫院接受治療。在醫院中他展現極強的叛逆性，拒絕接受治療，質疑醫師治療的權力，也極力捍衛病人知道

¹³ 〈紅色巨輪的悲劇——索忍尼辛的文學觀與歷史觀〉，《聯合文學》，第五卷，第八期，頁 180。

¹⁴ 類似的言論亦散見在索忍尼辛與莫斯科作家協會聚會等場合中，詳參見：拉培茲著，張平男等譯，〈莫斯科作家對《癌症病房》的看法〉，《索忍尼辛創作歷程》。台北：長春，1974，頁 64-87。

¹⁵ 同上註，頁 93。

¹⁶ 蘇珊·桑塔格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台北：大田，2000，頁 95。

¹⁷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М.: Центр «Новый мир», 1991. 翻譯參考姜明河譯，《癌症樓》。南京：譯林，2009。本論文以下出自該作品之引言，僅在括號中標出《癌》及頁數，不再另行作註。

病情與自我治療的權力；長達 14 年的監禁歲月讓他一度失去對女性的本能興趣，但在醫院中隨著自己逐漸康復，讓他慢慢重拾對於女性的欲望、恢復為一個正常的人，並從中體會到身為人的生命活力進而重新體驗到愛情，這一切一切皆重燃了他對於生命的熱情。但是療程當中的「激素療法」卻使他逐漸喪失性能力，以致最後雖然幸運痊癒，但由於性能力的喪失與長期監禁的遭遇讓他在出院後短暫的外出中徹底感到與世界的格格不入，他再也沒有愛人的勇氣，對自己的價值感亦感到茫然。

《癌症病房》所探討的問題既深且廣，它深入一個曾經接受過軍隊、集中營、醫院等機構運作的人的心靈，去探求他內心的掙扎，他與外在環境對抗的軌跡，和做為一個個體所極力抓住的生存依據——那些慾望，以及那些激烈頑抗中極力維護的個體價值。結局晦暗不明的處理方式，隱約傳達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幾經嘗試、奮力突圍之後依舊無法如願，似乎某種力量在他身上執行的痕跡已永遠改變了他。儘管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小說中是以一個抵抗者的姿態出現，其堅強、剛毅的神采令人嚮往，但最後他卻依舊屈服了。可以說，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個被馴化的悲劇角色，他曾試圖做出掙扎，卻沒能成功，令人低迴。探討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醫院時之叛逆行為的動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命題，是怎樣的遭遇讓他對施加己身的救治如此抵抗？又，究竟是怎樣的力量造成了他最終的馴化？此外，在小說中不斷出現的抵抗，究竟有哪些形式？這些抵抗與權力的互動關係又是什麼？最後，「空間」在小說中被凸顯，這些空間在作為權力運作的場域以及抵抗的據點，乃至喻示科斯托格洛托夫內心的過程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都是本論文亟欲解決的問題。

貳、研究目的

本文首先擬以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權力理論的研究模式，從對小說中之不同機構的分析，科斯托格洛托夫經歷過的集中營、醫院等所在，研究《癌症病房》當中的權力建構途徑，以及其與個體間的互動關係，從而說明小說中存在的權力結構，所扮演之屈服並馴化（docile）個體的重要角色。

其次，呼應傅柯在權力研究中，對「抵抗」的重視，因此從研究抵抗的原則出發，以傅柯「異質空間」理論為本，探討小說中存在的異質空間，分析其在喻示人物自主權力消長間所扮演的角色。

此外，病房在功能上的獨特性使病房中充滿了無所顧忌的對話與行為，本論文將以巴赫金（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 1895-1975）的「狂歡化」（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理論為本，就小說中的「廣場性」、「肉體物質形象」、「離心」等狂歡化特質進行研究，以探討文本中的抵抗形式與其意義。



第二節 研究途徑、研究方法、研究客體與主題

壹、研究途徑

一、傅柯的權力理論

傅柯對權力的研究並非旨在建立一種理論，而是提出一種權力解釋法。他認為，「…如果權力事實上是一組開放的、多少是能夠同化的關係，那麼唯一的問題只是去提供一種分析框架，它使對權力關係的解釋成為可能。」¹⁸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等學者則認為，傅柯所理解的權力，「不是一個商品、一個地位、一個獎品或一個策謀；它是政治技術貫穿於社會機體的運作。正是這些權力政治儀式的運作建立了非均等的、非對稱的關係。」¹⁹即是傅柯所說的，其權力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走向一種權力的解析法，而不是走向一種權力的理論；也就是說，要界定權力形成的具體領域、並決定使其分析成為可能的具體手段。」²⁰

要了解權力的實質性、理解其日復一日的運作，必須到達微觀的「實踐」層次去探究，因為理論僅在「當它相對於特定的文化實踐並處於其中時，才能存在並獲得理解。」²¹這一項見解使得權力研究得以突破「通過政治制度研究權力」的限制，而可以從對機構的討論中，去探討權力施行與運作上的意義。傅柯指出，權力發揮一種「生產性」的作用，因為其技術在具體的機構（如軍隊、監獄、醫院）內找到一個定域時，權力才真正地發揮作用。必須界定清楚的是，權力與機構是不能等同的。我們或許可以透由機構去探討權力運作的方式，但不能就此說機構的一切運行都與權

¹⁸ Foucault M., *Power /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0, p. 199.

¹⁹ 德雷弗斯、拉比諾著，錢俊譯，《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台北：桂冠，1992，頁 238。

²⁰ 米歇爾·傅柯著，尚衡譯，《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桂冠，1990，頁 71。

²¹ 同上註，頁 247。

力直接等同。本論文將採用傅柯的方法，從對小說中機構之運作的分析對其權力建構進行研究。

傅柯在探討權力的細緻運作中，舉了「圓形監獄」(panopticism)²²的例子，將抽象的權力運作以具象化的建築加以說明。圓形監獄使得權力的擴散極為有效，並能以較小的代價得到行使，最大限度地增加那些被屈從者的可見度，在其運作中把所有同其有接觸的人都涉及進去。最重要的是，它將監督的「權力之眼」(eye of power)植入被監督者的內心，使得被監視者仿若時時受到監視，成為馴順的個體。這樣的監督技術如今已逐漸溢出機制界限，以某種模糊但確實存在的姿態行使於開闊的社會領域之中。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反抗」在傅柯權力理論中所扮演的角色。傅柯認為，權力之所以具備永恆存在的狀態，正是由於其運作中具有固執抵抗與不順從的因子；若沒有抵抗甚且脫逃等反叛的行為，則權力的網絡關係亦將不存在。他主張以權力的反抗型式作為出發點，以便從反面揭示權力關係，詰問反抗權力的型式，以及分解這些關係的企圖。順著這樣的理路，本論文將徵引傅柯所提出的「異質空間」理論及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研究小說中所存在之「抵抗」的內涵，具體研究途徑將於下文詳述。

二、傅柯「異質空間」(heterotopia) 理論

傅柯曾在一次訪談中指出，「空間是一切公共形式的基礎，同時也是所有權力運作的基礎」，²³傅柯十分醉心於對空間理論與其實踐意義的探

²² 圓形監獄由一個中有高塔的大中庭，以及旁邊圍繞的一系列建築物所組成。這些建築物被分割成不同樓層和牢房。每個牢房中有兩扇窗子：其中一扇面向外界以引入光線，而另一扇則面朝著有大片監視窗、可監督這些牢房的高塔。每個禁閉者不只可被監視者看到，而且是單獨地看到；被監視者彼此不能互相接觸。其優點在於，任何人都可以運作此一建築機制以進行監督；同時，就算無監視者出現，這項監督機制仍可有效運作——因為一旦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監視，其實他就已在監視著自己。詳見：米歇爾·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2003，頁 224-225。

²³ Foucault M.,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Power*. Ed. James D. Faubion.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p. 349-364.

討，他曾自承自己對於空間的著魔（*Spatial obsessions*）。²⁴在對空間的長期研究中，他提出了「異質空間」理論。傅柯指出，「當今的時代應是空間的紀元，我們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係，比之時間更甚。」²⁵今日，我們所身處的空間，把我們從自身中抽離，與我們相關的一切都在其中發生，這個緊抓著我們的空間，本身即具有「異質性」，所以我們實際上是生活在一組空間的關係中。按照傅柯的說法，這些空間，與所有其它空間相連並矛盾。它們是一種有效制定的基地，與所有不同的真實基地共存，處於所有地點之外，但依舊可以指出它們在現實中的位置；由於它們絕對地異於自身所反映與討論的基地，同時又有別於虛構地點，所以它們被稱為「異質空間」。²⁶

傅柯歸納出異質空間的幾項原則，包括，一、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文化不建構異質空間；二、每一個社會，就如它所展現的，可使既存的差異地點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運作；三、異質空間可在一單獨地點中，並列數個彼此矛盾的空間與基地；四、異質空間通常與時間之片刻性相關；五、異質空間經常預設一個開關系統，以隔離或使它變成可以進入；六、異質空間對於其它空間具有「某種」功能。或許是某種幻想空間以揭露真實空間；或是創造一個不同的空間來對應真實空間的不完美。²⁷傅柯在對於差異空間的詮釋中，強調關於異質空間的生產性與對照性，這樣的論點應用到本論文中，則可以用於分析小說中所存在的異質空間與真實空間的對照性和互動性，以分析書中個體抵抗權力的自我技術之結構。

上述原則將在論文中作為空間分析的依據，深入研究《癌症病房》中所存在的異質空間。小說中，醫院本身即具有強烈的「異質性」，其在小說人物對權力進行抵抗之角色上所具有的意義，將在論文中深入研究。此外，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出院後經過的國營百貨商店、動物園等地點亦具有「異質空間」的特質，但這些空間的功能則主要顯現在暗喻科斯托格洛托夫被

²⁴ Foucault M., "Question on Geography", in C. Gordon (ed.), *Power / knowledge -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p. 63-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²⁵ Foucault M., "Texts /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s*, 16 (1) (Spring): 22-7.

²⁶ 或可譯為「異托邦」。

²⁷ 米歇爾·傅柯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1993，頁 402-408。

規訓而馴化之遭遇，具有豐富的象徵意涵。

三、巴赫金「狂歡化」(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 理論

傅柯權力理論可與巴赫金「狂歡化」理論有所連結，我們將應用「狂歡化」理論來對小說中的「權力 / 抵抗關係」進行詮釋，以強化有關小說權力關係之論述的建構。與「狂歡化」在巴赫金的文化理論中具有重要意義，巴赫金在離心力與向心力的衝突、中心權威話語的解體和眾聲喧嘩的興盛等文化理論思索中，為西方文化內部的他者聲音找到了依據。²⁸

與狂歡化緊密相連的是「公共廣場」的概念，這個理念部分體現了巴赫金的政治理想。他致力於建立起理性的公共空間，關注著官方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之外的公共空間的建立。「公共廣場」具有某種象徵性，發生在公共廣場上的民間話語，與官方和教會的語言互相對立；它不承認任何權威和中心，而強調的是一種離心的力量。以《癌症病房》為例，小說主要場景——癌症病房，由於其特殊性，使得一切話語的發生在這裡成為可能，而這些話語往往是激烈的、叛逆的、具有反省意識且生氣勃勃的。公共廣場上經常存在著「加冕 / 脫冕」的形式，強調某種「上下倒錯」的原則。在書中受病痛所苦的人們之中廣場性的此項特質表現明顯。

「狂歡化」所標誌的，是某種向心力與離心力、中心與非中心之間的對話與抗衡，公眾廣場為自己建立了一個空間，以向中心力量挑戰。其中，「物質肉體形象」是巴赫金對於狂歡節世界的美學概括。狂歡節的肉體具有生機，欣欣向榮，肉體形象是自我與他者對話與交流的基本方式，豐沛的傳宗接代能力所代表的暢旺生命力，是人原始生命交流的媒介。《癌症病房》中可以見到許多對於身體及病體的關注，以及透過欲望彰顯個體價值與叛逆意涵之例證，此部分亦將在論文中深入研究。

²⁸ 劉康著，《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1995，頁 268。

貳、研究方法

一、藝術文本分析：凸顯文本之文學藝術的根本因素，強調對文本進行細膩的解讀與藝術形式的分析。

二、藝術文本外部研究：論文將參照文學作品的創作背景、作家的生平史實。這些外在因素決定了作家創作的動機，因此決定了文本的意義結構與美學形式。

三、比較分析：將就文本中的型態和意象與傅柯、巴赫金等人的理論相互對照、比較研究，以凸顯其意涵。

參、研究客體（объект）與主題（предмет）

一、研究客體：中篇小說《癌症病房》為主，並參考索忍尼辛相關自傳以及其它集中營題材作品。

二、研究主題：傅柯的權力及異質空間理論和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在《癌症病房》中的具體應用及表現。

第三節 研究限制及預期貢獻

壹、研究限制

本論文取材之研究途徑取法法國哲學家傅柯的理論，受限本身語言能力，無法直接閱讀原文，但其思想中具有跨語言的普遍價值，足以用以探討文本當中的深層意義。我們將從其著作之中譯及英譯本著手進行研究，以補這方面之不足。由於索忍尼辛為著名作家，我們對他政論性質作品或思想意識形態並不陌生，所以我們擬將焦點放在《癌症病房》文本上，而不全面研究作家的所有作品。由於索忍尼辛研究的中文資料較為匱乏，大部份參考資料來源皆為俄文書籍，在閱讀非母語資料時，筆者受限於自身的語文能力以及部份專有名詞完全沒有相應的中文翻譯，故分析的過程中或有理解上的不同面向。

貳、預期貢獻

本論文從傅柯權力與空間理論取法，以對索忍尼辛《癌症病房》中權力建構提出詮釋，並採用俄國理論家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對小說進行研究，期望能為索忍尼辛研究提出不同的視野，提供索忍尼辛研究者以新的素材。對於俄羅斯文學研究者期能提供一次應用傅柯學說進行文學文本研究的案例。期望本研究成果將對在索忍尼辛專題研究及俄國文學課程教學上略盡棉薄之力。

第四節 研究課題

壹、透過分析小說中的規訓空間：社會普遍存在的規訓權力、醫院中的規訓權力，研究《癌症病房》中的權力建構型態。

貳、以傅柯「異質空間」理論研究作為抵抗之場域的癌症病房。

參、以傅柯「異質空間」理論研究小說中具有象徵意涵的空間（流放地、國營百貨商店、動物園、醫師薇拉的住所等場所之分析）。

肆、《癌症病房》中的「廣場性」研究與「物質肉體形象」意涵分析。



第五節 文獻回顧

索忍尼辛在俄羅斯文壇崛起於 60 年代的《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 雜誌，但受限於當時的時代語境，因此在作家嶄露頭角時的相關研究甚為缺乏。索忍尼辛的研究熱潮，主要興盛於 70、80 年代歐美學術界，其研究特點為對於索忍尼辛創作背後的政治與社會思想進行爬梳；另一個熱潮則是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蘇聯解體索忍尼辛回歸俄羅斯之後，伴隨俄羅斯紛亂的情勢，對索忍尼辛的評價角度顯得較為多元。直到近年，開始以較為冷靜與客觀的視角，全面檢視索忍尼辛的精神遺產及其歷史意義。²⁹

論文集《兩次周年紀念日之間(1998-2003)》(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1998-2003)) 收錄了當代最具代表性之俄國的作家、評論家、文學批評家以及文學研究學者關於索忍尼辛其人及其作品的論著。其中，塔琪亞娜·克列奧法斯托娃(Татьяна Клеофастова)在其論文〈20 世紀語境中的索忍尼辛作品〉(Творчество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XX века) 分析索忍尼辛之複雜經歷與其創作間的關係，凸顯其遭蘇聯放逐海外之前作品，包括《癌症病房》所具有之突出的文學性。她並且肯定索忍尼辛在作品中對「具創造性之個體」的強調在俄國作家當中的獨特之處。

安德烈·祖博夫(Андрей Зубов)在〈索忍尼辛作品中的民族自覺〉(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Народ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Солженицына) 一文中肯定索忍尼辛為「俄羅斯民族的心靈忠樸」(служитель Духа в русском народе)；他指出，《癌症病房》的藝術形式具體體現了俄國人民心中的「Мир」；它代表了上帝、真理、良知、責任等在蘇聯所失落的東西。為了 Мир，人們不惜以身相殉，《癌症病房》則凝聚了人們對於 Мир 的信念。帕維爾·佛金

²⁹ Эриксон Э.,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ая критик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А.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 *Путь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большого времени*.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9, сс. 215-220.

(Павел Фокин) 於〈亞歷山大·索忍尼辛，賽局之外的藝術〉(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Искусство Вне Игры) 一文中剖析索忍尼辛在 1955 到 1967 年的創作特色，指出他此時的作品依循著傳統的軌跡，亦即以寫實主義詩學的方法進行書寫，但也提出了其侷限性。

米哈伊爾·別爾格 (Михаил Берг) 在其著作〈文學中權力的取得與再分配研究〉(Проблема присвоения и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指出，索忍尼辛時代的主流思潮為社會主義寫實主義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本身也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寫實主義，其中文學權力取決於文化權力。筆者看來，索忍尼辛在二十世紀的蘇聯語境當中，無疑持有文學權力。瑞士學者喬胥·尼瓦 (Жорж Нива) 於〈活的經典作家〉(Живой классик) 一文中指出了索忍尼辛作品中的「對話原則」(диа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他並分析索忍尼辛作品中對權力烏托邦的破滅之描寫如何創造出了包括科斯托格洛托夫等在心靈上自由的人們。

台灣學者李細梅在論文《從文學—哲學觀點看索忍尼辛早期作品》(Ране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А.С.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спект)) 中討論索忍尼辛早期作品中「個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特別是對在蘇聯體制下艱困大環境之中個人的道德困境有著深刻剖析。學者陳相因在〈時代的考驗：回顧與評論索忍尼辛〉一文中對索忍尼辛的地位、晚期文學創作及索氏後期政治立場等皆持保留態度，強調其功過留待歷史檢驗。

中國學者劉亞丁在〈癌病房：消解中心文學的對話〉指出，索忍尼辛在小說中維持其一貫的在敘述方式上的自由，以及高度壓縮小說之時空的特性；作者並以《癌症病房》中的情節舉例，說明作者對於「崇高」的戲擬。香港學者郁旭映在〈癌症樓的隱喻〉一文中指出，評論者往往視《癌症病房》為政治狀子，將小說中深刻的寓意作簡單的現實投影。但作者認為，它更多的是象徵著人所處的一種極端的境遇。他亦將癌症病房比作是

異托邦（即異質空間），但是僅是從異托邦之「烏托邦理想」的破滅著手，強調癌症病房的惡質化，忽略了傅柯異質空間理論對於真實空間在意義上的積極性。作者亦提及《癌症病房》的「廣場性」，但僅提到其「對話」的特性而未再申論，惟其諸多觀點仍甚具啟發性，值得研究者深入研究。

在所蒐集的資料中尚無發現從傅柯之權力理論角度分析《癌症病房》的文獻，以下擬就傅柯權力理論相關評述文獻進行回顧。

在〈空間、知識、權力〉(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一文中，傅柯強調自己對於空間的興趣，這些對空間的探究追尋著社會中權力的基礎或自助制度，其中包含著不同意圖間的共生關係和永恆的鴻溝。葛溫德林·萊特 (Gwendolyn Wright) 與保羅·拉比諾在其〈權力的空間化——米歇爾·傅柯作品的討論〉(Spatialization of Power: A Discussion of the Work of Foucault) 中從傅柯權力理論出發，討論空間的技術之於紀律、工作場、空間疾病、階級等關係，強調傅柯對空間的著魔正是針對社會中特殊權力運作之解析的一條道路。在哈伯特·德雷弗斯 (Hubert L. Dreyfus) 與保羅·拉比諾合著的《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一書中辨析指出，傅柯並非一位結構主義者，而是從外部來分析作為自主性的言說，因此他從未提出一種普遍通用的言說理論，而是力求描述論述實踐呈現的歷史狀態。

中國學者汪行福在〈空間哲學與空間政治——福柯異托邦理論的闡釋與批判〉一文中，強調「場所」在傅柯理論中的核心地位，不只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且深具本體論的意涵。他指出，傅柯想通過「異托邦」對後現代政治下政治反抗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解釋，他的空間指向的是對現實和自我的超越，以對另一種空間關係敞開和接納。劉康所著的《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將巴赫金的對話主義看成是一種轉型時期的文化理論，並指出其思想的核心是透過語言和話語的變遷來審視文化轉型的問題。

第六節 索忍尼辛相關評述

壹、索忍尼辛抗議文學創作

索忍尼辛繼承了十九世紀俄羅斯寫實主義的批判傳統，大膽揭露史達林時代的蘇維埃社會陰暗面和其它種種弊端。他並且繼承了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作家注重宗教問題之探討的路線，努力挖掘俄羅斯人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意識，並把這種探求與對於真理和美好境界的追求相結合。在他所開創的二十世紀蘇聯抗議文學當中，作家的眼光投注在對於蘇聯體制下受苦之個體的關懷，並對蘇聯體制展開深刻而犀利的批判，這樣的意志雖使他無法見容於蘇聯，導致他流亡海外的命運，但確是他作品中的一貫脈絡。下文將就作家其它重要的抗議文學作品進行評述。其作品中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與一貫批判蘇聯的立場，具有對民族的深刻關懷、國族反思的意涵與重構俄羅斯歷史形象的企圖。

一、《牛犢頂橡樹》(Бодался теленок с дубом)

索忍尼辛的自傳作品《牛犢頂橡樹》紀錄了索忍尼辛 60 年代到 1974 年間的主要經歷，書中對於《癌症病房》的創作歷程有許多著墨。該書的標題，即是以個人之身對抗蘇聯體制的隱喻。文本中，索忍尼辛有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之主人翁般，在壓抑中述說著自己的想望。歷經從一個地下作家到獲得諾貝爾獎桂冠的興起之歷程，該文本對於當時時代背景下蘇聯社會、文化、精神心理的狀態都有所著墨，雖然是索忍尼辛的自傳作品，但是依舊具有文學美學的價值，與政治和歷史研究的意義，可說是索忍尼辛在其抗議文學的脈絡中，以自身為主角所進行的一個側寫，字裡行間都透顯出他對於自己的心靈結晶能夠重見天日的期待，呈現出作家不朽而高尚的靈魂。

二、《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索忍尼辛的初試啼聲之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是一部對俄羅斯人性光明面進行謳歌，以及對於蘇聯之醜陋現實進行批判的傑作。索忍尼辛曾經在集中營度過漫長歲月，他親身經歷其中並且目睹了許多不堪的現象，所以他認為自己應該把那裡的事實寫出來，他曾說：「我與那些集中營的獄友沒有甚麼區別，與他們無法分辨出來。若說真有差別的話，那不過是我必須說出許多事情……應當發表這些東西，以某種方式對周遭的人產生作用。」³⁰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主角伊凡被無辜地抓進集中營，並且在當中受盡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磨難。難得的是，無論精神的摧殘和肉體的折磨都沒有擊垮他，他熬過了煉獄般的集中營，表現出俄羅斯平民美好而良善的品德，體現了一個對自身尊嚴凜然不屈的俄羅斯人形象。在這個集中營看似平凡無奇的「一天」當中，索忍尼辛透過伊凡·傑尼索維奇揭露遍布蘇聯大地的集中營當中之生活現實。在俄國文學中，小說開創了集中營題材的風氣之先，把俄羅斯文學的寫實性提高到一個全新境界。他小說中的寫實性後人難出其右，因為作者以驚人的記憶力，使他能夠精準地再現當時所身處的場域，使同樣身處其中的人們能夠正確無誤地判斷出小說中的場景出於哪一個實際地點。與索忍尼辛在同一處服刑的獄友在讀過《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後曾說道：「在這本小說中我首先尋找虛假或是作者捏造的東西，但是並未找到。」³¹透過這樣力求真實的嚴謹，索忍尼辛揭露了蘇聯體制下極為黑暗的一面。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出版頗為曲折，最後是在赫魯雪夫的批准下才得以問世。一部作品的發表要經過最高領導人的批准，這在蘇聯社界當中毋寧是罕見的。同時，由於揭露史達林治下之集中營此一扭曲醜惡的體制，使得本書成為二十世紀 60 年代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此現象之

³⁰ Чуковская Е.,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О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цензуры к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об Архипелаге ГУЛАГе// *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1998-2003)*: Писатели, критик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ы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Альманах.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5, с. 367.

³¹ 《索忍尼辛創作歷程》，頁 27。

持久連索忍尼辛本人都感到意外。在答覆著名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所說，索忍尼辛在小說問世時將成為「最出名之人」（*самый знаменитый человек*）的預言時，索忍尼辛同意她，但卻不認為這個現象可以維持多久。³²殊不知，這部被阿赫瑪托娃號召蘇聯公民「讀完和背誦」³³的中篇小說，竟會產生這麼大的穿透力量，把索忍尼辛推向震古鑠今的文學巨擘之路。可以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是索忍尼辛對於蘇聯體制的一道挑戰書，由此，他開始了對蘇聯這個龐然巨獸抵抗的艱難歷程。

三、《地獄第一層》（*В первом курге*）

小說取名的寓意，按照作者在小說結尾所點明的，係來自義大利詩人但丁在《神曲·地獄篇》中將地獄劃分為九層之典故：這當中，處於最上層的第一層收容的是死於耶穌基督誕生之前的異教徒的靈魂——他們不受地獄中種種酷刑的折磨，因此第一層也是地獄中最不恐怖，也最令人羨慕的地方。與之相類似，索忍尼辛把蘇聯境內集中營和監獄系統直至整個蘇聯社會比作一座龐大的監獄，而把物質條件稍好、自由程度稍高的莫斯科附近的特種監獄比為地獄的第一層，在此基礎上開展整部小說。

《地獄第一層》的特別之處，在於將史達林納入人物組成中，並把矛頭直接指向史達林和蘇聯當局，對之進行嚴厲的批判。小說的寫作技巧，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其具有時空濃縮性，在中文版長達九百餘頁的龐大篇幅中，呈現發生於1949年底某四天內的事件，用極短的時間軸展現出眾多人物的命運；同時，小說大部分場景發生在該特種監獄中，延續索忍尼辛作品經常將時間與空間高度壓縮的寫作特色。其二，是小說人物採用多聲部的手法——文本中每一章都有各自的中心人物，但全書沒有特定的主角。這個部分符合索忍尼辛作品向來傾向有眾多人物，但是當中並沒有中心人物的特色；透過這種手法，他突出了歷史動向及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藉由鋪陳人民臉譜的宏大敘事，彰顯出蘇聯的邪惡腐敗，維持其一貫對蘇

³² Крохин Ю., Архипелаг Судьбы // *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1998-2003) : Писатели, критик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ы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Альманах*.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5, с. 109.

³³ Крохин Ю., с. 109.

聯體制的批判性。

四、《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古拉格群島》這部索忍尼辛在副標題中寫下「藝術研究嘗試」(опы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作品，是作家對於蘇聯集中營和集中營不堪歷史的永恆印記。索忍尼辛認為，集中營作為歷史現象或許在俄羅斯已經成為過去，但它在人們意識裡依舊作為一個理念、一個理想和一個座標而存在，³⁴《古拉格群島》就是他為了要永久消除人們意識當中的這種思維而創作的。作家對於小說的重視，從他在戈巴契夫改革後重歸故土時的唯一要求，便是要讓《古拉格群島》的回歸先於其它作品可見一斑。《古拉格群島》書名本身即具有隱喻色彩，「古拉格」(ГУЛАГ)是由「改造勞工營總管理處」(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的俄文字母簡寫所拼綴的發音組成；「群島」則是指秘密警察機關、營房、監牢、轉運中心、通信設備、運輸系統以及情報組織等整個祕密控制的機制，由於蘇聯的集中營和監獄到處星羅棋布，遍布在整個蘇聯大地，猶如密密麻麻的島群，故而使用「古拉格群島」來稱呼那一大片大規模的恐怖體系。

這是一部曝露集中營真相的另一寫實鉅著，當中描寫了蘇聯集中營制度的全景，和身處其中之若干個人的掙扎，延續索忍尼辛創作集中營文學時力求寫實的傳統。索忍尼辛將小說的形式以訪談或紀錄的方式呈現，而表現出類似「報導文學」的取向，因此歷來關於小說之體裁的定義出現了許多爭論，探討其究竟是文學作品，亦或是政治文件，甚至有論者指出，《古拉格群島》是索忍尼辛創作當中最具爭議性的作品，³⁵但是在銘刻集中營這樣一個人類歷史悲劇所做的努力上，《古拉格群島》毋寧是成功的。透過小說，索忍尼辛告訴世人，可怕的並不只是集中營本身，更是人們內心的監牢；他分析了歷史事件和這些事件中的人們，為他們的位置提供座標，並且揭露其內心世界，對於蘇聯體制中的畸形現象提出了具有洞察力的批判，對後世影響甚鉅。

³⁴ 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2007，頁368。

³⁵ Рональд Вроон,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как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 *Солженицын: мыслитель, историк, художник*,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10, с. 417.

貳、索忍尼辛的權力觀

索忍尼辛權力觀的範疇，包括他有關俄羅斯民族的國家想像、對蘇聯體制的批判等，他的權力觀具體而微地體現在其作品中，成為作家對於民族的關懷和對體制之罪惡的挑戰。

要探討索忍尼辛權力觀的根源，必須了解其信仰觀的轉變過程。在基督教傳統中，存在著凱撒真理與神的真理之間的對抗，³⁶亦即：世俗權力與神權之互相糾葛。這一直是讓俄羅斯知識分子感到不安的問題。³⁷索忍尼辛從一個衛國戰爭的英勇士兵與共產主義的擁護者，到站在共產主義的對立面，成為一個以俄羅斯傳統自居的反共鬥士，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呈現了其抵抗蘇聯權力體制的脈絡——對於史達林主義之集權與專制路線的不滿與抵制的態度。他把蘇聯比作意欲吞噬世界的惡龍，嘗言，這條惡龍曾經嘗試吞噬他，但是他始終不願屈服，並積極對之頑抗。³⁸

在具體的作法上，索忍尼辛並不承認蘇聯足以代表俄羅斯，為了尋回或者形塑去蘇聯化的嶄新俄羅斯，索忍尼辛對俄羅斯的文化脈絡進行了許多思考，他對於斯拉夫文化的捍衛與堅持，和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使他承繼了俄羅斯傳統斯拉夫派哲人的思維，甚至被稱呼為「新斯拉夫派」的代表者。³⁹

中世紀以來，俄羅斯的有識之士就不斷在思考俄羅斯的發展道路，這其中逐漸演變為「西化派」以及「斯拉夫派」的辯論，並在十九世紀達到高峰，形成了各自的理論脈絡。但是，「西化派」和「斯拉夫派」在俄羅斯

³⁶ Новак М., Пер. с англ. Ерхова, О Боге и человеке // Васильевская О.Б., *Солженицын: мыслитель, историк, художник*.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10, сс. 352-363.

³⁷ 這個傳統也曾經反映於俄羅斯文學當中，例如托爾斯泰等俄羅斯知識分子在其個人遭遇以及創作裡都獲得體現。

³⁸ 索忍尼辛曾在演說中提到：「…我個人就曾被吞噬過，曾經一度吞在那惡龍的腹中。可是那惡龍卻不能將我消化，於是又把我吐了出來。…」—引自〈索忍尼辛在紐約市演說全文〉，《索忍尼辛的震撼》。台北：先知文庫，1976，頁 115。

³⁹ 《俄羅斯文化十五講》，頁 370。

應該要走什麼樣的道路這樣的議題各持己見，沒有達成共識，成了懸而未決的問題。從那時起，這個議題持續為俄國知識份子所思考和探索。

索忍尼辛繼承了十九世紀斯拉夫派的思想，成為二十世紀俄羅斯思想文化界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在猛烈批判蘇聯之餘，仍積極擘劃著他理想中的俄羅斯；他對於二十世紀末俄羅斯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之思索、對國族的思考以及俄羅斯重建的若干思維等，在〈我們如何安置俄羅斯〉(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 1990)、⁴⁰〈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ека, 1995)⁴¹和〈分崩離析的俄羅斯〉(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1998)⁴²這三部合稱為「政論三部曲」的作品中得到體現，作品當中呈現了他的國族想像與權力觀。在他的主張當中，不難看出他對於斯拉夫派思想傳統的若干承繼。

傳統上，斯拉夫派認為不應該走上西歐的道路，應該有一個與其它民族，特別是與西方民族不同的方向。在這一點上，索忍尼辛認為，俄羅斯要振興和發展，就應該走向民族化的發展道路，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失卻俄羅斯文化中的傳統：民族傳統、民族文化、民族的自治體制等。他大聲疾呼俄羅斯不要脫離自己民族的土壤與基礎，不要丟掉本身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而應該有自信地走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發展路線。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索忍尼辛在流亡海外的過程中受到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若干庇護與支持，但是他依舊認為俄羅斯應該警惕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並且憂心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在政治、文化和道德上的衝擊，將會弱化俄羅斯的角色，使她在世界中成為西方文化的附庸。雖然索忍尼辛對於西方政治體制的成就感到驚艷，認為其仍有值得稱羨和借鏡之處，但是他憂心西方文明因為長期以來的安逸，而失去了某種精神上的力度，會造成對進步的危害，對於脫離蘇聯體制之後仍然敏感而脆弱的俄羅斯而言，將造成難以預測的影響。

⁴⁰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 СПб: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⁴¹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ека*. М.: Голос, 1995.

⁴²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1998.

在〈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中，索忍尼辛通過對於羅曼諾夫王朝沙皇之歷史功過的評說，闡發自己的歷史觀。從索忍尼辛對於沙皇的態度和評價可以看出，他對於具有西化傾向的沙皇不表認同，但推崇致力於發揚斯拉夫文化的君王。這符合斯拉夫派的批判路線：推崇彼得一世改革前的俄羅斯，並認為彼得改革破壞了俄羅斯的固有傳統。相同地，索忍尼辛對於彼得一世及其改革之評價同樣不高，認為彼得一世徹底毀壞了俄羅斯傳統的政制，破壞社會的和諧。與此相對，他對於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米哈伊爾及其國家體制極為稱道，認為這樣的體制具有俄羅斯特色，不是在西方的影響下所建立。由此可知，凡是醉心西方文明，銳意朝向西化改革的沙皇，都受到索忍尼辛嚴厲的批判，但對於堅持俄羅斯民族傳統，思想傾向於保守的沙皇則獲得他的推崇和好評。

索忍尼辛對於俄羅斯有著濃厚、難以割捨的情感，因此他對於俄羅斯也有著一種新的國家定位想像。在〈我們如何安置俄羅斯〉中他指出，俄羅斯不僅僅包含俄羅斯，而應當是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合組的俄羅斯聯盟。他所持的理由是，這三個國家具有統一的種族起源、同樣的東正教信仰，也都繼承了斯拉夫文化的傳統。因此他將這三國的分裂視為斯拉夫民族的一大悲劇。

在〈分崩離析的俄羅斯〉中，則是就〈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和〈我們如何安置俄羅斯〉所提出的問題繼續加以探討。索忍尼辛在當中用一系列的數據資料揭示出俄羅斯國家在工業生產、農村經濟、道德風氣、民族問題、人民生活、文化發展等方面所面臨的危機，指出這種狀態的始作俑者正是二十世紀的蘇聯政權，及其意識形態下的遺毒所導致；他同時批判時任國家領導人的戈巴契夫以及葉爾欽的種種舉措，將俄羅斯推向了掙扎的邊緣。

綜觀索忍尼辛在這三部曲當中所體現的新斯拉夫主義，不難看出其中的清晰脈絡：他對於人民自我統治的倡導，以及對俄羅斯民族特性的強調。在對於民族自我統治的倡導當中，他強調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與民主，這是他政治主張的核心。他認為，俄羅斯的希望與能量，積澱在民族靈魂的深處，唯有從人民最基本的利益出發，呼應人民深層的渴望，俄羅斯的復

興才是能夠期待的。文本當中呈現出他對於後蘇聯的國族想像和國家圖景，體現其一貫的權力觀。



第七節 西方暨俄國相關權力理論評述

揆諸歷來各思想家關於權力的種種思考，不難看出過往權力理論多是在探討權力與個體互動的過程，思想家們多將權力視為是一個宰制的來源，他們探討驅策這個權力的動力源頭，或者觀照在這個體系下的個體。可以說，思想家們多認為權力的運作就是一個宰制、壓制的過程，這是一個帶有規律之強制意義的權力架構。例如，俄國哲學當中的權力觀，多是以君主、宗教的觀點出發進行思考的政治架構論述，在這樣的傳統之下，從個體角度出發的權力理論較為罕見。下文中將列舉部分西方與俄國思想家關於權力較具特色的思索與研究，凸顯過往權力理論中強調權力力量源的特色，以作為對照。

壹、西方相關權力理論研究

一、馬克思的權力理論

馬克思權力理論的中心思想，是要使異化（或作「疏遠化」）的、無意義的勞動變成生產的、自由的勞動，而不僅僅是從勞動的私有（資本主義）或從抽象的國家資本主義那裡獲得報酬而已。他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分析人們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下，所受到的宰制與支配，繼而出現一種喪失本質——「異化」的過程，並嘗試就這個現象進行詮釋與突破。

就馬克思的觀點而言，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發展同時又不斷異化的歷史，為了解決這樣的現象，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在他社會主義的概念中，就是要將人從異化中解放出來，使人回到自身，能自我實現。在馬克思的詮釋中，「異化」意味著人在他觀照世界的時候，並沒有感到自己是產生作用的發動者，而是覺得世界（自然、他人和自己）對他來說是全然陌生的。於是，任何東西都能夠變成商品，人變得十分孤獨，不再被視作一個實在的人。

為解決這個問題，馬克思提出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模式。在他的理想中，人是以一種聯合而非競爭的方式來進行生產。既然人是以合理的，非異化的方式生產，這意味著他使生產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使生產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馬克思期望透過這樣一種非異化的社會形式，將人轉變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將真正成為他本身生活的主人和創造者，因而他能夠開始讓「生活」本身成為他的主要活動，而不是以「謀生」作為其生命存在的全部意義。在馬克思看來，「當人不僅從經濟貧困的鎖鏈中解放出來，而且從異化造成的精神貧困中解放出來時，人才能在歷史的進程中創造一種自由發展自我的文化。」⁴³

可以說，馬克思是從經濟分配的角度就權力的運作進行詮釋，他認為資本主義中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導致事物都成為被經濟權力宰制的個體。對經濟與資源的支配力，構成馬克思權力論述的中心。但是他在理論中過度強調經濟的支配能力，似乎把人類活動的發軔限縮到一個狹隘的層次；其次，其論點中對於人類階級鬥爭之歷史的詮釋，直接影響俄共的論據，為蘇聯扭曲的意識形態所造成的災難創造了空間。

二、羅素的權力觀

羅素將權力的本質以及其類型做了區分。他把權力解釋為一種力量，一種「產出意志效果的力量。」⁴⁴他將權力的形式區分為支配人類之權力以及支配無生物質，乃至人類之外之萬物的力量。

不同於以生存和繁殖為滿足的動物，人類則更希望擴展，其擴展是以想像力為範圍，事實上，在羅素看來，如果可能，「人人皆願為上帝，甚至有少數人不願承認這種不可能性。」⁴⁵為了達成這種想像之中的疆域，於是競爭由此而生，因為這些人想模仿上帝以支配他人。羅素指出，人類有無數的欲望，但是當中最主要的就是權力欲望與榮譽欲望，此兩者極為相近但卻不是一回事，要取得榮譽的方便途徑就是取得權力。正統的經濟學

⁴³ 弗洛姆著，徐紀亮等譯，《馬克斯關於人的概念》。台北：南方，1987，頁 68。

⁴⁴ 羅素著，譯者不詳，《權力的慾望》。台北：水牛，1988，頁 23。

⁴⁵ 《權力的慾望》，頁 3。

家往往以「經濟上的自利」(economic self-interest)作為社會科學的基本動機論，但羅素對此不表認同。他認為，物品與權力或者榮譽等欲望無關，對於這些事物的追求上，人的一般欲望其實有其限度，一般的能力就可以獲得滿足，但是真正的大欲望，並非是物質安適的嗜好所驅使的，而是對於權力的追逐；當普通程度的物質條件獲得滿足的時候，「人們或者尋求財富以作為取得權力之工具，或者為增進權力而捨棄財富。」⁴⁶因此在羅素看來，權力才是社會條件當中的基本動機。

對於權力的好求，使得人們往往會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冒犯了的理法，做出不恰當的行動而產生不利於眾人的後果，但羅素依然肯定權力欲望的正面成分，只是需要有好的規範加以引導。因此，羅素主張，應該以較為嚴苛的法律，來節制人們追求權力過程中出現的濫權傾向。⁴⁷

羅素認為，掌有權力的人，應當以增進社會與組織合作為其終極目的，而不是一個團體內聚眾以對抗其它團體；這種團體間的鬥爭與對抗主要是受到敵對意識的催化以及渴望出頭的動機所趨使，但無益於眾人的福祉，甚且往往會造成個人的災難。大凡歷史上對文明具有貢獻的偉人，都是以眾人之事或者心靈上福祉為前提在行事，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以解放眾人之困厄為旨，而不是追求奴役眾人的權力。在羅素看來，儘管人類對於權力的欲求是其基本的欲望，但在此追求之中，是對於眾人福祉的追尋，還是以支配眾人為目的，仍然決定了權力欲望的高下。是以，權力或可解釋為人類一切行動的動機，羅素肯定權力的有力／利之處，但主張謹慎對權力進行引導。

貳、俄國相關權力理論研究

一、費多洛夫的權力觀

費多洛夫（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Федоров, 1829-1903）在他關於權力

⁴⁶ 《權力的慾望》，頁 4。

⁴⁷ 《權力的慾望》，頁 214。

的思考中，寄託了對於專制的期望。一方面，他認為現代國家是不友愛之關係的體現，但另一方面，他認為，人民有義務為國家效力。只是，此處的國家具有另外的意涵：它不是一種政權組織，而是調節自然與彰顯先人之共同事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國家成為一個集中人民力量的媒介。⁴⁸由於國家是人民和自然進行鬥爭之共同意志與目的的體現者，因此人民對國家「必須履行的義務」將會伴隨著逐步擺脫強制性之經濟法律的規律，而變成是「自願履行的義務」。⁴⁹

費多洛夫的專制不歸屬於歷史上任何的專制形式，而是專制的一種理想方案。在這個專制體制當中，專制君主應當是「共同事業」(общее дело)的首領，是國家一家族體制下的族長。這個君主為自然之君王，他「將與人民一道成為盲目自然力量的專制者、主宰者和管理者。」⁵⁰費多洛夫更進一步指出，君主「不是一位靈魂的牧者，如同神父一般，而是物質的支配者，外部物質世界的支配者；他同時也是使人們脫離經濟法律規律的解放者。」⁵¹

在費多洛夫的設想中，專制之所以合理的原因，是因為它符合社會的原初型態，「專制在原初意義上是一種出於對危險的反應所引起的專權，只是這個危險不是來自於個人本身，而是來自不知名的神秘力量，和威脅一切人的死亡。」⁵²類似的觀點在權力理論的研究中不絕於史，在探討獨裁制的起源時，都會將其源頭訴諸於古代氏族領袖在自然力量上的宰制力，即該領袖對於氣候和災害的掌控能力，直接形塑其本身的權威；類似的領袖被眾人認為具有魔力與術數，對於帶給人們不幸和死亡的周遭世界能有效操制，以帶領自己的部族消災解厄並且獲得豐收與其它福祉。費多洛夫理想中的專制君主就具有這樣的超凡力量，他認為君主應在這個前提之上，依據現實條件對國家進行統治。

費多洛夫嚮往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理想的實現，這個社會理想的基

⁴⁸ 徐鳳林，《費多洛夫》。台北：東大，1998，頁 151。

⁴⁹ Федоров Н. Ф.,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щего дела*. М., 1987, с. 377.

⁵⁰ Федоров Н. Ф., с. 364.

⁵¹ Федоров Н. Ф., с. 365.

⁵² Федоров Н. Ф., с. 375.

礎就是普遍性的「親」(родственность)，但這種「親」不等同於原始氏族中以血統維繫的關係，而是經過改造，使其昇華為一種以共同目標為導向的、具有自覺的「親」。

儘管在實際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血親聯盟被各種強制性的律法所取代。但費多洛夫認為，應該重新追溯原始的親與手足之愛，繼而發掘出將所有生者與死者相連結的內在自然律，以促成一個嶄新的社會組織形式。他稱此社會組織為「心理政權」(психократия)。⁵³在這個權力主體的架構下，人類是一個由共同祖先和命運所緊密連結的大家庭，而不是所謂的公民社會。這個社會與外在法治社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從人內在心理出發而建立的社會，它促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以加強彼此的連繫為目的，在這個過程當中，人們的一切與自己現下的生命、周遭的人以及死去的人們互相連結，他們將表現出真正的自我，而不是裝扮成某種角色。

依據這樣的立論特色，費多洛夫在烏托邦主義或理想主義學說當中占據一席之地。其理想國度當中的權力植基在一個對某種理想社會制度，繼而是自然界和整個宇宙之秩序的追尋，他大膽地冀求一種超脫死亡、直指生命本源的精神國度，是俄國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大突破。儘管在費多洛夫的學說當中，存在某些消極與謬誤的成分，例如他對於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抹煞，對宗法制存在許多幻想，且對於以西方為首的工業文明存在不少偏見，但他的思想仍影響俄國人的心靈，提供人們對於權力的想像以一個不同的角度。

二、索洛維約夫的權力觀

索洛維約夫(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вьёв, 1853-1900)是一個具有真正意義的俄國思想家，他熟習世界哲學思想，但仍與俄國文化維持著密切的關係。在他的作品中，探討俄國課題時遵循著「積極走進世界並改善它」的原則。索洛維約夫認為，俄羅斯思想的本源，與旨在改善生活的基督教根本上是相通的。

⁵³ 《費多洛夫》，頁 154。

索洛維約夫自青年時代起便矢志通過改造基督教，進而改造整個現實社會的生活。他企圖以現代知識和哲學來修正基督教不合時宜的部分，將基督教的內容賦以新的理性內涵。也因此，儘管他本人對基督教深富熱情並且篤信基督教教義，但他的哲學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基督教哲學，在他的論述中不乏與基督教原理互相違背的成分。

索洛維約夫的基督教觀與其人道思想相互聯繫，他延續了人道主義的傳統，試圖賦予人道主義以宗教意義。他對於傳統宗教和當時社會的狀況感到不滿，認為當時的宗教在日常生活和哲學內涵上過於貧弱。理想中，他認為基督教應當在人的認識和行為當中具有絕對性；其次，宗教應當跳脫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與作為政治工具的角色，而實現涵括東正教會、天主教會與其它基督教會於一體的普世教會所具備的普遍性。⁵⁴他將人道主義思想融入基督教，創造了「神人學說」(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о)，這是他學說當中最具創見的成分。在神人學說這樣一個體系當中，耶穌基督是神在人身上的體現，是世界歷史的中心，基督就是神人，在他個人身上，實現了神與人性的完美結合。索洛維約夫指出，「人的個性之所以能與神的原理自由結合，是因為人在一定意義上具有神性，確切地說，人是神的一部分。個人——不是抽象概念的個人，而是現實的、活生生的個人——具有神的意義。」⁵⁵順著這樣的理路，教會成為神人類的有機體，它實現了神與人的自由結合，把世界統一於神人類之中。人們應當在這個世界當中，從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裡跳脫，進入到高尚的精神世界內，在人間建立神的王國，進而將人的積極性解放出來。

索洛維約夫以神人學說為基礎，建立了一個普世神權政治或教會烏托邦的藍圖。他不僅僅滿足將基督教作為個人的內心信仰，而是試圖將它實現於歷史進程與人類社會之中，使其成為一個社會制度的基礎。按照他的構想，未來社會將成為宗教、國家和地方自治會的統一，此三者各有其權力和功能：宗教保證了對社會在道德層面的領導，國家保證政治面的領導，地方自治會則擔當經濟上的領導。⁵⁶在這個架構之下，宗教應在道德領域

⁵⁴ 徐鳳林，《索洛維約夫》。台北：東大，1995，頁148。

⁵⁵ Соловьёв В. С.,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90, сс. 19-20.

⁵⁶ 《索洛維約夫》，頁151。

占據決定性的位置，因而在意義上它高於國家和地方自治會之上。宗教的社會組織實體是教會。實際上，在這種社會理想中，教會是一個普遍的國家教會組織，是普世教會和世上君主制國家的綜合體，其中展現了國家權力（君主或皇帝）、宗教權力（最高主教）和先知權力（自由預言家）的總合，由於這種聯合而形成了神人的聯盟，其中所凸出的權力，不是政治權力，而是基督教的博愛、和平和正義。⁵⁷

在評論索洛維約夫的權力觀時，別爾加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 Бердяев, 1874-1948）指出，對索洛維約夫而言國家具有高於個人的價值。索洛維約夫或可被稱為右翼的西方主義者，他承認帝國，但希望它是有文化且具有政治上自由元素的⁵⁸。在索洛維約夫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其中的矛盾：他擁護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因此對東正教會表現不滿並對世俗權力抱持否定的態度；他也認為，人類與神的結合、神人的實現應當是自由的，不應強制、也不應被認定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走向神人類的歷程對他來說似乎又是必然的演化過程。這裡，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被索洛維約夫忽略了：在人類歷史上，自由有可能成為實現社會理想的對立面和犧牲品，亦有可能被曲解，這是因為自由本身存在著論證的空間，它極易遭受歷史的影響而斷裂，甚至產生質變。但是索洛維約夫的論述當中似乎將自由的這種不安定性忽略了。儘管如此，他的學說仍極富價值，見諸俄羅斯與西方思想家都前所未見，可以說是俄羅斯思想遺產中的獨特成果。在他所構築的這個政治理想當中，它克服人的自立自足性，並且確立了人的積極、尊嚴和屬神的高貴性。他把基督教理解為神人的宗教，這是和傳統基督教中，在神人之間盛行的審判觀互相對立的觀點，將人上升到一個可以與神性並駕齊驅的位置。

三、別爾加耶夫的權力觀

別爾加耶夫是 20 世紀俄國最著名的僑民哲學家之一，是一位具有世界性聲望的學者，其思想深受康德、馬克思、尼采，以及俄羅斯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索洛維約夫等人影響。在別爾加耶夫的論著中，特別關注俄羅斯

⁵⁷ 《索洛維約夫》，頁 152。

⁵⁸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с.147

和俄羅斯思想方面的問題。他批判社會主義道路，反對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改造俄羅斯；同時，他也是一位愛國者與傳播者，向西方介紹俄國哲學史，促使西方重視俄國文化當中具有的普世價值。

別爾加耶夫對於俄國人的權力觀有著精闢的見解，他曾提到，「俄羅斯人不喜歡國家，也不傾向視它為自己所有，要不就反叛它，要不就卑躬屈膝地承受其桎梏」，⁵⁹俄羅斯人傳統上對於權力的態度是極端的，但無論是對權力採取屈服抑或是抵抗，俄羅斯人並不把權力視為自己所有，甚且，他們對於權力的觀感是厭惡的：「俄羅斯人對於各種權力的罪惡感尤甚於西方人」。⁶⁰在探討俄羅斯人心靈本質的文章〈俄國魂〉(Душа России)當中，別爾加耶夫探討該民族這種對於權力的厭惡本源，係來自於其「總是等待外來的陽剛因素，而沒能從俄羅斯民族自身之中挖掘出自己的因素。」⁶¹這樣柔弱的心靈素質，導致俄羅斯總在等待一個舶來者，因此外國的精神導師如馬克思、康德等，往往能得到俄羅斯人在精神上的認同，因為「俄國在自己的自由存在中，似乎無力處理自己的事情，無力造就自己的個性，因此俄國人在向自己的土地民族天性回歸時，很容易被人奴役，變得無動於衷。」⁶²顯然，正是這樣的土壤，造就了共產主義得以宰制俄羅斯民族的歷史契機。

別爾加耶夫指出，「俄羅斯知識分子自十八世紀末期以來在專制國家權力的窒悶下，屢屢追尋自由及社會生活的真理，整個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與帝國對抗，闡揚無國家，無政府的理想，意欲創造無政府意識形態的極端形式。」⁶³俄羅斯知識分子在對於整個現實社會表達關心時，經常會徬徨於各種道路，如果戈里、杜斯妥也夫斯基、索洛維耶夫，和所謂的革命知識分子，某種形式上都類似古俄羅斯文明中，追尋上帝之城的「雲遊派人士」(странник)：⁶⁴他們承認上帝的權力，追尋上帝的王國，以逃脫世俗國家，具有逃避專制體制的意涵。相對於索忍尼辛積極建構國家想

⁵⁹ Бердяев Н. А., с.145.

⁶⁰ Бердяев Н. А., с.146.

⁶¹ 別爾加耶夫著，賈澤林等譯，〈俄國魂〉，《俄羅斯思想》。浙江：浙江人民，2000年，頁273。

⁶² 同上註，頁273。

⁶³ Бердяев Н. А., с.146

⁶⁴ 〈俄國魂〉，《俄羅斯思想》，頁199。

像的態度，他們顯得有些避世而消極。

此外，別爾加耶夫亦關注個體在權力體制下的性質。他關於反抗客體化世界的思想，是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基礎上開展的，他以對客體化世界的闡述表達出對異化更進一步的詮釋。別爾加耶夫繼承了馬克思在物質主宰權力上的創見，認為物質化的過程會將人置於一個客體化的向下過程，但與馬克思不同的是，馬克思讚揚由人的意志所創造的一切，認為人的異化只存在於對於其精神與創造力的壓抑；但別爾加耶夫更進一步審視人類文明創造物之於人的影響，而提出技術文明對於人的客體化的過程，⁶⁵可以說，人類的智慧文明不一定是使其不受到客體化的保證，相反的，技術文明透由人們對於它的依賴，而構成了權力場域，使其能夠完成對於人的支配，達到對人的客體化之目的。

四、費多托夫的「史達林權力學」(Сталинокра́тия)

費多托夫 (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Федотов, 1886-1951)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重要哲學家，他與別爾加耶夫、索洛維耶夫皆為俄羅斯宗教哲學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身為僑民哲學家，他廣為西方所知的著作有《俄羅斯宗教意識》(Russian Religious Mind)、《古俄羅斯聖徒》(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等。其著作為現代俄羅斯重建精神文化思想、恢復歷史記憶的重要代表元素。

費多托夫指出，史達林權力學被稱呼為民族社會主義，甚至，他刻意標榜自己的哲學是更不富有法西斯色彩的。費多托夫對此完全不表認同，他認為，史達林在貫徹自己的權力意志之歷程中，已經將自己的權力意志帶有法西斯的影子。他分析指出，法西斯主義的幾項要素：領袖、具有積極性的遴選以及具有革命色彩的群眾激情等特色在史達林的路線中都可以顯著的察覺，因此史達林的權力架構裡，已然具有法西斯式的色彩。同時，他更指出，史達林與其黨徒許多時候，其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於史達林是否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甚表懷疑，而認為史達林只是

⁶⁵ 郭麗雙著，《對客體化世界的反抗——別爾加耶夫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科學院，2008，頁 210。

研讀列寧學說，但這不過是政策與策略的指南，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意涵，換言之，史達林真正在乎的，是革命的手段與權力鬥爭的範示，影響所及，他與他的黨徒及追隨者都奉行這樣的觀點，因此他們的行動中帶有深刻的鬥爭與暴力色彩。⁶⁶



⁶⁶ Федотов Г.П., «Федотов». М.: 1998. сс. 83-87.

第二章 《癌症病房》的規訓權力探討

過去蘇聯集中營文學的研究者，往往將權力的存在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力量源，個體在當中被支配、壓迫，權力與個體的關係呈現上下相對的型態。這種關於權力的思維傳統，也同樣見諸上文所提及的馬克思、羅素乃至俄羅斯的思想家，使歷來對於權力的思索，都認為權力是剝削、壓榨的，是強弱對比的力量場。但是這樣的思考模式，對權力的描述往往失之簡化，也無法更為細膩地對權力的運作進行爬梳與分析。

傅柯的權力理論在有關權力的研究中獨樹一格，他強調從權力實施的細微之處分析權力，對於權力形態的分析方法具有功能上的意義。觀照《癌症病房》，其文本中的權力形式無所不在，對於個體的規訓更是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在下文中，首先將介紹傅柯權力理論的特點，接著將就文本中的兩種規訓權力⁶⁷形態——封閉之醫院中的「醫院規訓權力」與普遍存在於當時社會中的「社會規訓權力」進行分析，此二種型態，正好符合傅柯筆下的兩種規訓意象，⁶⁸它們具備相似的手段，但是卻代表著規訓權力從封閉的空間逸散到整個社會之過程中的兩種原型，而它們也各自成為權力場，深刻影響著包括主人翁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內的小說人物。

⁶⁷ 本論文將以「規訓權力」(discipline)作為文本中權力現象的簡稱。

⁶⁸ 「於是，我們看到兩種規訓意象。在一端是規訓一封鎖，建立在社會邊緣的封閉體制，趨向於內向的消極功能：制止災難，中斷交流，凍結時間。在另一端是全景敞視的規訓一機制：一種通過使權力運作得更為輕便、迅速、有效來改善權力運作的功能機制。」——引自米歇爾·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2003，頁235。以下註解按其英文縮寫，註為DP及頁數在引文後，不另行作註。

第一節 傅柯權力理論概述

壹、傅柯其人與其研究的主要範疇

米歇爾·傅柯是二次大戰之後法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的學說影響極廣，從哲學領域，逐漸擴散到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精神病學、醫學、心理學、刑事學、語言學、教育學甚至是建築學等領域，對於文學藝術也有著重大的影響。他思想當中的活力，主要來自於其在多方面對西方文明所進行的分析中，所展現出之無比的洞察力與創造力。他在學術領域中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思考方式，為人類的文明開創不同的視野。

在傅柯廣為人知的幾部著作：《古典時代的瘋癲史》、《詞與物》、《規訓與懲罰》、《性意識史》中，不同的主題間，其實可以看到一個相同的歷史縱深，那就是近代以來日漸清晰的人的形象與人的主體的顯現。⁶⁹如傅柯所自謂的，他「研究的中心主題不是權力，而是主體」。⁷⁰傅柯著述當中的中心主題，就是探討主體是如何形成，有多少模式在塑造主體，有哪些技術塑造出今日的主體等，因此他的作品中劃分出瘋子與正常人、病人與健康的人、罪犯與好人等範疇，但不變的，就是他對於歷史中各種塑造主體的權力與知識模式的考究。

貳、傅柯的權力理論

傅柯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對權力進行詮釋。首先，傅柯對於權力研究所

⁶⁹ 汪民安，〈如何塑造主體〉，《福柯讀本》。北京：北京大學，2010，頁3。

⁷⁰ 米歇爾·傅柯著，錢俊譯，〈主體與權力〉，《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台北：桂冠，1992，頁268。

提出的問題意識是：「權力如何被運作？」「權力運作的效果是什麼？」而非「權力為何？由何而生？」這是他與其他學人極大的分野。過去的學者認為，權力是一種利益的代名詞，一種力量的表徵，甚且，具有某種獨佔與獨具的特質，但是在傅柯看來，權力並非一種階級的特權，而是為了達致某種知識上目的的策略。因此，權力的宰制效果並非對主體的剝削，而是操演、策動等。換言之，權力並非加諸「無權力者」之上的義務或禁制。由此，權力就可以從其施行的細微之處加以探討，而不再從「壓迫」的角度去詮釋。

在傅柯看來，「壓迫」的觀點不足以涵蓋對於現代權力研究的所有面向，因為在「宰制—壓迫」的架構當中化約了權力的其它正面性特質——這樣的取向容易著重在權力的負面因素，並壓抑權力的生產性。傅柯指出，「權力，不是某個制度或某個結構，也不是少數人擁有的某個勢力，而是人們賦予一個社會中之複雜的戰略形式的名稱。」⁷¹以傅柯的角度，權力並非是一種制度的架構，也不僅表現出一種結構關係，「用權力的概念研究權力不應該將國家主權、法律形式或統治的同一性設定為原始論據；確切地說，它們不過是權力的最終形式。」⁷²他認為，權力是「眾多的力的關係」⁷³，要分析權力，「我們不應該透過某一中心最初形式，或透過輻射各種上升和遞減形式的唯一最高權力點，去尋找產生權力的必要條件。」⁷⁴相反的，應該從細微處去對權力進行分析，因為「權力無所不在，並不是因為它包含一切，而是因為它來自一切方面。」⁷⁵因此，從權力實施的細微處進行研究與分析，就是傅柯權力研究方法上的特點。

傅柯為了說明權力背後的關係，整理出數項方法學上有關權力的形式、層次、效果、方向等。首先，傅柯認為，權力關係的分析應著重的，並非權力的集中化與合法化形式，而是已經落實在地方性、區域性、物質性制度的技術。⁷⁶對於權力的研究角度，應該從中央下放到下方的層次，不再強調權力集中的強制性、壓迫性特質，而是訴諸從權力實施的下方、

⁷¹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79。

⁷²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80。

⁷³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79。

⁷⁴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80。

⁷⁵ 同上註。

⁷⁶ 史馬特著，蔡采秀譯，《傅柯》。台北：巨流，1998，頁 143。

下位作為切入的角度，甚且，從權力實施的確實手段與技術作為研究考察的對象，從微視的觀點對權力進行分析。

其次，他認為，對於權力研究所應關懷者，應在於關懷權力的運作或實踐，以及權力運用領域或影響，⁷⁷因此，分析方向應定在主體被客體化權力所影響的各個複雜過程與程序，而非特定團體、階級或個體運作宰制的動機或利益。在這裡，他強調權力施展時的過程與方式，並且將權力研究的方向從權力行使的動機當中解放，而側重在權力之行使的本身。

其三，傅柯認為，權力非商品，也非單一個體、團體或階級的所有物，它是透過社會體（social body）以鍊結的形式在運作、透過一個將所有人都涵蓋進來、如網一般的組織在運行。這是將權力研究從中心賦予、中心集中的傳統加以轉移的延伸說法，傅柯拒絕將權力的研究置放在單一個體抑或團體的框架下進行檢視，也否認權力具有集中在某一個特定階級乃至個體與團體的手中，跳脫這樣的框架，從微觀與權力施展的細微之處進行考察才能成為可能。

傅柯權力理論當中，還有一項特點，就是其中所隱含的空間隱喻。這個特性影響了他的「全景敞視理論」以及「異質空間」理論，後者將在後文中詳述。空間之於傅柯而言的意義是非凡的，他曾在許多言說當中透露出自己對於空間的著迷，⁷⁸傅柯以空間的圖式詮釋權力的顯著例子，就是他的「全景敞視理論」。在這個空間當中，權力對個體進行規訓與監視，規訓是一種技藝，而不是一種制度，它以這樣的方式運作，以使它可以在某些機構當中得到大量地、幾乎是完全地運用，或者在其它機構中被用於確定的目的。規訓並非僅僅代替社會中的其它權力形式，相反，它處於它們之上，繼而加深加廣它們的效力，傅柯曾指出，「權力的運作至為廣遠，透過更為細微的管道，而且更為曖昧——因為每個人都掌握了某種程度的權

⁷⁷ 同上註。

⁷⁸ 傅柯曾說，「很多人指責我對空間的著迷，而空間也的確曾令我入迷。但是我藉由這些觀念來思索，也確實找到了我基本上要尋找的東西：權力和知識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見米歇爾·傅柯著，夏鑄九等編譯，〈地理學問題〉，《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1993，頁 391。

力，而且正因為如此，每個人都可以擔任傳遞更廣闊權力的承載者。」⁷⁹

依照傅柯的理論，「空間的控制是這一技術的重要組成成分。監督通過對個體在空間中的組織而進行，因而它需要具體圍定的場域。」⁸⁰這樣的圍定設定隨著規訓技術的逐漸溢出界線而日益模糊，但是基本上這樣的假設依舊是存在的。例如在醫院、軍隊、學校等地，它們都因著一個圍定的空間使得規訓技術得以適當的施展。一旦這樣的框架建立起來，它便能將個體劃定在一定區域，而能有效進行監督。



⁷⁹ 〈地理學問題〉，《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393。

⁸⁰ 《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頁 201。

第二節 醫院規訓權力探討

壹、醫院規訓權力的特性

醫院的「封閉」符合有關規訓場所的定義，如傅柯所言，紀律「需要封閉的空間，規定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封閉的場所。這是貫徹紀律的保護區。」(DP, 160) 在這個意義上，癌症病房做為一個封閉的規訓場域，醫院的禁閉可謂滴水不漏。同時，傅柯又提到，「『封閉』原則在規訓機制中既不是永恆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能滿足需要，這種機制是以更靈活、更細緻的方式來利用空間。」(DP, 162) 例如病房中的病床分配以及男病人女病人分屬上下樓層就屬於這種概念的落實，因為未經分類的病房將會導致疾病在病人間的不當擴散或者增加治療上的難度，對於病患管理的難度也將提高。正如傅柯所說，「某些特殊空間被規定為不僅可以用於滿足監督和割斷有害聯繫的需要，而且也可用於製造一個有益的空間。」(DP, 163) 這種封閉的、被割裂的空間中，個體處處都受到監視。在這一空間中，每個人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位置，權力根據一種連續的體制統一地運作著，每個人都被不斷地探找、檢查和分類，劃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範疇，體現出醫院規訓的特徵。下文中將深入分析病房中所存在的規訓權力形式，以及它們對於個體的影響。

貳、醫院中的層級監視

在對規訓權力之結構的敘述中，傅柯強調規訓權力呈現的是層級化分佈的事實：這是一種由上到下的金字塔型式。傅柯指出，規訓權力是需要中繼站的，而金字塔型的權力形式能夠有效地滿足兩個需求，「一是能夠完整地形成一個不間斷的網絡，從而能夠增加層次，並把各層次散布在需要監視的整個平面上；二是結構合理，不會把一種惰性力量壓在需要規訓的活動上，成為這種活動的制動器或阻礙。」(DP, 197)

文本當中，醫院的權力分布就符合這樣的原則，首先，醫院院長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Низамутдин Бахрамович）具有極大的權力，但他是一個被權欲薰心的人，這從作者對於他的諷刺性描述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在與醫師例行性的五分鐘醫務會報當中，院長為了展現自己的權威，往往要開到半個小時；而在這些例行性的會議裡，

尼扎穆特丁莊重地（為了顯示自己）走進來，莊重地（為了顯示自己）同大家打招呼，接著就和顏悅色地（為了顯示自己）、不慌不忙地主持會議。他顯然在留神聽自己的聲音，從旁觀者的角度中在每一個手勢中和頭部的轉動中看到自己是多麼儀表堂堂、聰慧睿智，多麼有學問、有威信（《癌》，387）。

在這段文字當中，作者以三次括號重複「為了顯示自己」，以強調院長重視虛矯與注重排場，他不把自己的職務理解為需要堅持不懈、專心致志、付出極大精力的一項工作（《癌》，387），而是理解為能夠出風頭、領獎賞和獲取種種特權的一種機會（《癌》，387）。他對於自己在知識上的特權，或者可以理解為霸權的權力寸土不讓，

他的頭銜是院長，因而相信自己有了這個頭銜便是一院之長，是首席醫師；相信自己比這裡其餘的醫生懂得更多，儘管不一定包括所有細節；相信自己完全了解他屬下醫生如何進行治療，而且只有在他的指點和領導下他們才得以避免各種錯誤（《癌》，387）。

同時，他對於自己在人事上的權力，亦是罔顧醫護人員基本的專業原則，除了少數人員具有紮實專業背景，他執著濫用自己的裙帶權力，因此在進用人員時往往內舉不避親地任用具有關係的人士。

如同傅柯指出的，層級化監視「無所不在、無時不警醒著……它無時不監視著負有監督任務的人員。」（DP，200）所以尼扎穆特丁也將他的權威落實在轄下的醫護人員身上，他經常要求醫護人員讓沒有好轉希望的病人盡速出院，加快床位的周轉。在對醫院的管理上，他也力求帳面數字的「好看」，而不甚在意醫院實際的治癒率，所以他竭力主張不要讓瀕臨死亡

的病人待在醫院裡，應當盡可能讓他們死在院外，這也能提高床位周轉率……統計數字也會顯得好看一些，因為他們離開醫院不是由於死亡，而只是由於「病情惡化」（《癌》，67）。可以說，他完全把病人當作一個個體、一組資料在處理，他的職責所在並不是懸壺濟世，而是盡可能地施展他的權威。

正如傅柯所闡釋的，這種「分層的、持續的、切實的監督」，使規訓權力變成一種內在體系（DP，200），影響所及，就是整個體系對於這種規訓權力的服膺。文本當中，可以看到許多醫師對於本身治病權力的一種信仰式的執著，例如，放射科主治大夫東佐娃（Людмила Афанасьевна Донцова）就經常強調自己治病的權力，特別是在面對病患的質疑時：「正是醫生有這個權力！首先是醫生有！」東佐娃深信不疑地大聲說道，……「要是沒有這個權力，那就沒有任何醫學可言！」（《癌》，88）她對於治病權力的執著，讓她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具有醫學上無可挑戰的權威，進而否定一切懷疑的可能：如果對每一種今天在科學上得到認可的療法都總是懷疑，擔心它將來會不會被否定或推翻，那麼，鬼才知道這會導致什麼結果！……要是那樣的話，就根本沒法治病！根本無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傷（《癌》，100）。但同樣的，她也受限於病房當中大小事物的纏繞，層級化的監督，使她無法在規訓的體系中置身事外，作者用許多篇幅，以流水帳式的方式描述她繁忙瑣碎的醫院庶務；而長期使用 X 射線管治療的結果，她每天進行診斷的時間超過容許的限度，使她自身所接受的射線量比那些最能忍耐的重病人還要多，種下了她罹患胃癌的遠因。這裡符合傅柯所指出的，「規訓權力控制整體，它完全覆蓋整體，並從監督者和不斷被監督者當中獲取權力效益。」（DP，200）在對於個體進行監視的整套體系中，規訓權力由上而下地落實在當中的規訓者以及被規訓者身上，這裡的權力，不是一個被占有的物或一個可轉讓的財產。它是作為機制的一部分起作用。

參、增加可見性的規訓——檢查和巡房

在傅柯的權力研究方法學當中，他特別強調權力之「可見性」在歷史上的轉變。在君權時代，君王的權力是昭然若揭的，「傳統中，權力是可見、

可展示之物」(DP, 211), 君權把自己的狀態調升到一個正大光明的地位, 讓臣民清晰可見, 以彰顯自己的權威, 並且謀求眾人對自己的屈服, 換言之, 「它是在調動自己力量的運動中發現自己力量的本源, 受權力支配的人則是留在它的陰影之中。」(DP, 211) 與此相對, 規訓權力與這種大鳴大放的權力不同, 它所顯現的是一種較為晦暗不明的形式, 與傳統君主式的權力有別, 主要是「透過自己的不可見性來施展的」, (DP, 211) 但同時, 「它將可見的原則施加給它的對象」。(DP, 211) 在規訓權力的運作原則當中, 特別強調這種個體的可見性, 「完美的規訓機構應能使一切一目瞭然」(DP, 197), 因著這種可見性, 規訓權力可以察覺個體一絲一毫的異動, 可以明析個體任何的動態, 也就是傅柯所說的, 個體的可見「確保了權力對他們的統治」, (DP, 211) 這是因為, 「被規訓的人經常被看見和能夠隨時被看見這一事實, 使他們總是處於受支配地位。」(DP, 211)

在達成個體可見性過程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檢查。在傅柯的定義中, 檢查「是一種追求規範化的目光, 一種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監視, 它確立了個人的能見度, 由此, 規訓權力方可區分、判斷個人。」(DP, 208) 它首先追求的是對於個體的齊一性與普遍共性, 並依據這個標準對人進行分類, 以確認個體是否符合自己的標準, 這整個過程, 正反映了權力細緻的操演, 所以傅柯說, 「檢查把可見狀態轉換為權力的行使。」(DP, 211)

為了達成檢查的目的以及對於個體的懾服, 在檢查的過程當中往往會強調某種儀式化的作為。在往昔的君主權力中, 也會強調儀式化的成分, 「君主的莊嚴出場總是帶有獻祭、加冕和凱旋的某種因素。」(DP, 211) 這是一種對於權勢的炫耀, 一種誇大並帶有符號化性質的宣傳。在規訓權力的執行中也有儀式化的形式, 只是這種儀式是以檢視個體作為主要的型態, 「在這種儀式中, 受檢閱者作為『客體對象』而呈現, 供權力的凝視來觀看。」(DP, 211) 傅柯特別強調巡診在醫院規訓權力當中的作用, 他指出, 「巡診儀式是最明顯的形式……巡診變得更有規律, 更嚴格, 特別是範圍更大了。它變成醫院功能中一個愈益重要的部分。」(DP, 209) 巡診中的儀式化, 往往造成個體直接的震懾, 這在文本中得到了體現: 幾個穿白大褂的人一齊進來, 總是會引起一陣緊張、恐懼和希望的浪潮。來者的長衫

和帽子越白，表情越嚴肅，病號的那三種感受就越強烈（《癌》，51）。甚至巡診之儀式化的樣態，亦透過對協同巡診的護士之描述生動地顯現出來：其中表現最嚴肅、最莊重的是護士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Олимпиада Владиславовна），對她來說，巡診就跟祈禱儀式之於助祭一樣（《癌》，51）。她對於醫師權威的服從，反映了與病人相同的心理：她是這樣一位護士，認為醫生高於普通人，認為醫生什麼都懂，從來不犯錯誤，其囑咐也無不正確。所以，任何醫囑她都懷著一種近乎幸福的感覺記在自己的記事本裡（《癌》，51）。檢查過程當中的儀式化造成個體戒慎恐懼的心理，使得規訓權力的權威以及有效性大大提升。

檢查顯示了被視為客體之對象的被征服，以及個人的「對象化」。由此，人就被導入了客體化的範疇，進而成為可以被描述、被研究的對象。在檢查的過程當中，個體被當作一個客體來進行檢視，醫師將他們的身體當作一個供作使喚的對象役使，人的身體被視為一部份與一部分的總和：

他必須把「起床」這一意志傳給六普特重的肉體，強迫自己從床上起來——叫胳膊、腿和腰一齊使勁，強迫裹著肉的骨頭從陷入麻痺的狀態中甦醒起來，活動它們的關節，讓沉重的軀體豎立起來，變成一根柱子，給它穿上衣服，再移動這根柱子經過走廊和樓梯去受無謂之苦（《癌》，226）。

又如，在醫師的要求下，科斯托格洛托夫以習慣的動作（最近一個月裡，他的腫瘤被好幾所醫院裡的許多醫師、甚至實習生摸過，還叫鄰近診室的醫生來摸，大家都十分驚訝）把腿擱到床上，屈起兩膝，不枕枕頭仰面躺下，並使腹部袒露（《癌》，59）。病患的肉體成了被精細劃分的標的，以提供醫師檢查及診斷，人已經不再被視為人，而是部位的總和，個體的客體化於焉產生。

對於檢查的使用，甚至已經成為醫師們的習慣，他們習慣以檢查的手段去增加病患的可見性，從而確立自己的權威。例如在常規的診療之外，院長還訂有檢查病房的規矩，在檢查病房的過程當中，他特別注意床頭櫃，不許裡面有糕點碎屑和過多的食品……他還檢查衛生，連細心的女人都想

不到的地方他也能挑出毛病來（《癌》，247）。就連下班以後的時間，這種習慣也深深影響他們對待陌生人的態度。如東佐娃在下班之後走在院區內的林蔭道上，她一路眉頭緊皺，銳利地注視著所有這些人，彷彿是在給這些人身上今天還感覺不到，但明天就會出現的腫瘤定位（《癌》，209）。傅柯指出，「常規性的觀察，使病人處於一種幾無休止的受檢查狀態。」（DP，209）這樣幾無休止的檢查，往往使個體產生莫大的恐懼，他們往往因為重複的檢查而陷入焦慮或者恐懼的情緒當中，進而大大增強了檢查的有效性，這就是為什麼在規訓的各種機制中檢查被高度儀式化的原因（DP，208）。透過檢查，提高了個體的可見性，個體無所遁形，輕易被規訓權力所俘獲，並且增加規訓權力的效能。



第三節、社會規訓權力探討

《癌症病房》文本的背景雖然主要是病房，但是細讀文本，依舊可以在人物的描繪及記憶中，看到蘇聯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權力蹤影。在傅柯的詮釋裡，規訓權力從封閉的地點，逐漸逸散到空闊的社會領域之中，⁸¹這些權力的實施更為深刻而更為無所不在，它們根深柢固地存在於人心，對人們進行監視，以形塑一個符合某種意指的社會型態，深刻影響著人們。文本中普遍存在的社會規訓權力，也深刻影響著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塑造其自我想像與認同具有關鍵性的作用，下文將分析文本中社會規訓權力的特徵與形態。

壹、規範化裁決的作用

規訓權力當中具有某種處罰機制，有法律、罪行以及審判形式。在文本中，蘇聯體制下的社會，這種規訓的手段運用得十分透徹，對於小說主人翁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深刻影響，自不待言。用傅柯的話說，規訓權力「規定和壓制著重大懲罰制度不那麼關心而抬手放過的許多行為」(DP, 201)，但是在蘇聯體制下的規訓社會當中，所存在的尖銳而嚴苛的刑罰制度，卻使重大懲罰深入到這些應當被「抬手放過」的行為之中，而造成許多悲劇。

在傅柯的詮釋中，這種由規訓懲罰所維持的秩序具有複雜的性質，它是一種「人為的秩序，是由法律、計劃、條例所明確規定的。(DP, 202)」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下獄，正是依據這個法律條文所確立，但卻帶有那個時空所具有的荒謬性質：一幫一年級的男女大學生，因為在像姑娘們獻殷勤、跟她們跳舞的時候談談政治、也談論過「那個人」(史達林)，就以重刑集體下獄了。傅柯指出，在刑罰時，「人們使用了一系列微妙的做法，從光線

⁸¹ 「規訓體制網絡開始覆蓋越來越大的社會表面，尤其佔據了越來越不是社會邊緣的位置。」(DP, 235)

的物質懲罰到輕微剝奪和羞辱。(DP, 202)」其目的是為了「使最微小的行為不端受到懲罰。(DP, 202)」但是蘇聯治下的判決，往往失之偏衡，不符比例，因此科斯托格洛托夫與他的同窗被判處七年徒刑，照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話講，凡是被判八年以下的，都意味著罪行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癌》，181）。因為他們是一群男男女女，所以被認定為一個集團，一個「幫」(шайка)，就有集體犯罪、集團性活動的可能，所以就得天南地北地永久流放（《癌》，181）。對於「集體犯罪」的顧忌，不只此一端。科斯托格洛托夫在流放地結識的卡德明夫婦(Кадмины)，因為自己母親在衛國戰爭時收留了逃兵，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無辜獲罪，他們服了十年刑期，卻還是回不了家，理由與科斯托格洛托夫被流放的原因相同：因為他們不是單獨行動，而是一個集團，一個組織——丈夫和妻子！所以必須永久流放（《癌》，296）。科斯托格洛托夫與他們命運相似，他們都等待過大赦的到來，但是因為被認定是「集體犯罪」，是國家的敵人，所以竊賊、騙子、逃兵都獲得赦免了，但他們仍然被監禁。

尤有甚者，他們被定罪到判決確定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判決書，是用跟發貨單差不多的通知單告知被永久流放的。永久流放的意義值得深入探討，文本中提及：如果是終身流放，那麼至少說，死後可以從那裡把棺材運出來，而永久流放，想必連棺材也不得運出來。即使太陽熄滅也不得返回，因為永久這個時間概念意味著比太陽時間還長（《癌》，108）。這是一種對於犯人在身分上永久的鏤刻，因為他們不符規範、偏離準則，所以他們的牢籠是永久的，就算被釋放出來，曾經在集中營的經歷也會讓他們生活處處不便，如科斯托格洛托夫說的，領到帶有「第39條」⁸²汗點的身分證的那些人，他們必須不停地奔波，設法安身，尋找工作，可是又到處碰壁，老是為每一個細節的失檢而責備自己（《癌》，291）。在這裡，規訓權力處心積慮，塑造出「不規範個體」與「規範個體」之間的差異，藉由這種「馴化」的過程，使個體存有忌憚之心，進而牢牢地歸附於規訓權力的體制之中，以達成對於個體的規範作用。

這正如傅柯所說的，「規訓機構排列出『好的』與『壞的』對象的等級秩序，由此，一種無休止的微觀管理造成了分殊化。」(DP, 204)就是

⁸² 指曾在集中營待過的際遇。

這個分殊化，將「規範」與「不規範」的界限嚴格劃定出來，這種規範將一種認同與意識強加於個體之上，使個體學會馴順、服從，遵守紀律，使他們變得大同小異，相差無幾，並使不規範者深刻銘記本身與規範的「正常人」之間的差異。這種銘刻在科斯托格托夫身上的鑿痕十分明顯，他多次提到自己與「自由人」——正常人——之間的對比：多少年來，自由人都被禁止與他這樣的人平等交談，甚至不能把他們當作人來認真商量事情……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遞來的信……（《癌》，156）；在與病友們宣傳新的治療法時，他也本能地意識到這樣的差異，自忖「為什麼竟要他這樣一個多年被剝奪一切的人來教這些自由人如何躲開傾壓下來的巨石？」（《癌》，161）規訓權力將一個認同的意識、一種區分異同的知覺灌輸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心中，這種身份深刻地影響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自己的認同，種下了他最終對於自身價值之否定的因素。

貳、規訓手段——引入文件領域

傅柯指出，在研究權力時，應該探究種種書寫以及登記的程序等機制，因為規訓權力「總是同時伴有一個集中登記和文件匯集的制度。」（DP，212）在規訓權力的建構中，「一種書寫權力作為規訓機制的一個重要部分建立起來。」（DP，213）可以說，規訓權力將個體引入到文件領域之中，「一種新的支配肉體的權力於焉構成。」（DP，214）規訓權力在從封閉的空間逸散到開放的社會裡，藉由書寫及文件所建構的效力也極大地得到體現。在文本中，這種由文件所建構的權力更是被運用得淋漓盡致。關於「文件—表格」，有一段非常生動的描述：

在人生途中，每個人都填過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當數量的問題。一個人對一份表格上一個問題的回答就是一條線，這條線永遠從那人身上通到當地的人事檔案中心。從每一個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幾百條線，合在一起就有千百萬條。如果讓這些線都能為世人所見，那麼整個天空就會被蛛網遮蔽；如果這些線變得像富有彈性的橡皮筋那樣，公共汽車、電車和路人便都無法行動，報紙的殘片或是秋天的落葉也不會被風吹得沿街飄動。它們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人們時刻感覺到它們的存在（《癌》，209）。

病人魯薩諾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Русанов）正是管理人事檔案的機構官員，專司人員的管理與監督，他的權威，就是因為他的這項職務性質而得到確立：由於經常感到這些看不見的線的存在，人們對牽動這些線的人，對管理極其複雜的人事檔案的人，自然會產生敬意。這些人便有了權威。（《癌》，209）他可以藉由對檔案的掌握，主掌任何一位組織內人員的生殺大權，如果仔細分析的話，對每一個活人，檔案裡總能寫點什麼反面的或懷疑的意見，因為每個人都曾做過什麼錯事或隱瞞了什麼（《癌》，209）。就是這些檔案中的矛盾，使魯薩諾夫得以從中去拼湊關於一個人的生活細節，以及其可能的「問題」等，以施加監視與掌控，形成傅柯所說的，規訓權力「使人們陷入一大批文件中，這些文件俘獲了人們、限定了人們。」（DP，212）

在這個規訓權力所覆蓋的社會裡，可以看到由文件、檔案所形塑的權力網絡，在牢牢規訓著個體。如同傅柯所說，「檢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頭、按時間匯集的詳細檔案。檢查使人匯入監視領域，也使人置於書寫的網絡中。」（DP，212）在文本當中，魯薩諾夫更進一步把文件—檔案當作是一種權力的工具。他把自己權力的操作比喻為一架木琴的鍵盤，其權力賦予他按照自己的願望和選擇，在他認為有必要的時候敲擊鍵盤上的任何一個鍵（《癌》，209），在他擺弄聲音語調、借助表情停頓，以及打招呼時的收放之間，甚至是一個故作姿態的面會邀約，往往都能讓對方心中七上八下、惴惴不安。這些技藝當中，最為凌遲人的，非填寫表格莫屬。他會囑咐員工，上級主管要求該人填寫一份表格，按照魯薩諾夫的話，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魯薩諾夫櫃子裡的一切表格中最詳細、最令人不快的一種，例如，接觸秘密文件之前所要填寫的那一種（《癌》，211）。也許不一定真有接觸機密的情事，但員工往往不會去追問上級是否真有其事，心裡卻已是誠惶誠恐，此時，魯薩諾夫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因為如果他對檔案中心隱瞞了什麼，心裡早就七上八下了。因為在這份表格上什麼也沒法隱瞞（《癌》，211）。表格讓人們的一切都無所遁形，而且其明辨洞察直到細微之處，使得人們無論是否隱瞞都難以安適，如此一來，規訓權力的恫嚇力量就達成了，所以魯薩諾夫說：這是首屈一指的表格。這是一切表格中再好不過的表格（《癌》，211）。

這種表格除了聲張規訓權力的威勢之外，對於個體的規訓也是極其有效。借助這樣的表格，魯薩諾夫得以迫使許多婦女與自己被監禁的丈夫離婚，表格是如此明察秋毫，甚至築起了森嚴的柵欄，讓置身其中的個體無所遁逃：這些女人無論怎樣消滅痕跡，例如不用自己的名義寄郵包，或者根本沒有寄過，都逃不出這表格上那極其陰森的「問題柵欄」，要繼續撒謊是不太可能的（《癌》，211）。最後，這個表格彷彿法外開恩般，替這些婦女指出一條出路，就是依照法律與其丈夫脫離夫妻關係，這正是魯薩諾夫所要達成的社會控制的目的。目的達成之後，表格本身已不具任何用處；諷刺的是，這些文件對於執行規訓的幹部而言，也「無非是當作笑料」（《癌》，211）來處理，在那背後，卻是一對對被拆散的夫妻以及破碎的家庭。文件作為一種規訓的手段，其具有十分高的效力，不論是對於個體的掌控乃至作為一種對付個體的手段等，皆在文本中都得到了顯現。

參、全景敞視的規訓社會

在傅柯權力理論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他的「全景敞式理論」，這個論述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生動刻劃了權力運作時無所不至、極為幽暗深微的可怖。這是一個內化了權力之眼的社會，如傅柯在「全景敞視理論」中所描繪的，「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生作用。」（DP，226）蘇聯體制下的社會可以說是傅柯這種權力圖像絕佳的寫照。

傅柯指出，「這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因為它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於肉體、表面、光線、視覺的某種統一分配上。」（DP，227）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人都成為一個規訓的單位，無時無刻不對周遭的人進行監視，遇到稍有嫌疑的話語出現時，便以密告的方式致人於罪，塑造出一個人人盡皆噤聲的社會情景，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被一種關係所制約，從而「一種虛構的關係自動地產生出某種真實的征服。」（DP，227）這種恐怖社會，在小說中描繪的社會權力當中，正是體現了傅柯所擘畫的這個充滿監視與恐懼的世界。

科斯托格洛托夫本身就是無端被誣陷入獄的受害者，而他不過是這個體制下的一個縮影。他是在一個輕鬆的場合無預警地被密告，接著就被審問入獄，因為當時的蘇聯社會存在著秘密機構，無時無刻不對人民進行監視。文本中的魯薩諾夫，就是以這種密告方式剷除異己、鞏固權位的代表人物。

魯薩諾夫為了不同理由都可以出賣自己的近人，甚至為了趕走共用自己住所的鄰居，他也可以羅織罪名致人入獄。事實上，魯薩諾夫那種陰暗、秘密從事社會監視與控制的工作性質，在他頗為自得的辦公空間中獲得了體現：

魯薩諾夫辦公的地方也布置得與他的工作性質相稱。這永遠是個單獨的房間，〈…〉後來，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多，還在門口增設了一個起防護作用的門斗，像只黑洞洞的箱子。這個門斗似乎是一種普通的發明，一點也沒什麼了不起：深度不超過一米，來者只不過在關上第一道門和尚未推開第二道門的時候多耽擱一兩秒鐘的功夫。〈…〉來者彷彿遭到一次短暫的監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氣又不流通，他會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見的那個人面前實在是渺小得可憐（《癌》，212）。

可以說，魯薩諾夫已藉由他的辦公空間宣示自己在職掌中，那種高深莫測的權力。依據著這種協助政府監視人民的工作，魯薩諾夫獲得職務上的升遷，因而越來越氣燄囂張、理直氣壯，…他越來越大膽、越來越公開地幫助當局確定他們的罪狀，甚至兩次出面對質，當場提高了嗓門進行揭發（《癌》，208）。在「魯薩諾夫們」的「努力」之下，所有的撒謊者、誹謗者、過分勇於自我批評或過分賣弄理論玄虛的臭知識分子，統統不知去向和銷聲匿跡了（《癌》，208）。在這個社會中，人們變得噤若寒蟬，他們唯恐動輒得咎，擔心一不小心就禍從口出；這個社會，有如傅柯所說的，「它具備一種持久的、洞察一切的、無所不在的監視手段，這種手段能使一切隱而不現的事物變得昭然若揭。它必須像一種無面孔的目光，把整個社會機體變成一個感知領域；有上千隻眼睛分布在各處，流動的注意力總是保持著警覺，有一個龐大的等級網絡」（DP，240） 文本當中引用的普希金的詩句，是對這種規訓社會之描述的生動寫照：

В наш гнусный век...

На всех стихиях человек-

Тиран, предатель или узник.

(在我們這醜惡的世紀，

無論在哪一種領域裡，

人都無非是暴君、叛徒或囚犯。)(《癌》，471)

規訓權力約制下的社會，身處其中的人無可避免地必須成為這三種身分的其中之一；只是暴君幻化成一個「無面孔的目光」，它雖然成為一種權力的機制在運作著，但它的效力比之暴君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驅策著人們在當中成為糾舉他人的叛徒，或者無端受難的囚犯。無形之中，規訓權力的效力就內化在人們的心裡，全景敞視理論所揭示的規訓權力，是一種監視權力的內化，這種內化導致人們無時無刻不在檢視著內心與自己的一言一行，深怕稍有不慎，就會落入規訓權力的羅網之中，如傅柯所說的，「社會不是一個公開場面的社會，而是一個監視社會，個人被按照一種完整的關於力量與肉體的技術小心地編織在社會秩序中」(DP, 243)

文本當中的舒盧賓(Алексей Филиппыч Шулубин)，正是這個規訓權力中的一部份，他為了在體制內謀得生存，而選擇對一切都噤聲不語，甚至也跟著成為規訓的幫兇，跟著密告、指認其他人，他自沉，

在這樣的天空下我生活了二十五年，全靠彎著腰幹活和沉默不語才保全了自己。……有時是為了妻子而沉默，有時是為了孩子而沉默，有時是為了自己這罪孽深重的肉體而沉默(《癌》，473)。

他從自己的知識與良知當中全面退守，從一介莫斯科的大學教授，因為不斷順應權力的政治正確而退守到遙遠的中亞當圖書館管理員。他雖然委曲求全，但是迎接他的卻是兒女與他公開決裂的不堪。我們可以看到，舒盧賓以及蘇聯體制下的人們都被規訓馴化成為「一個人」(Один человек)

——沒有個性、沒有自我，只知道向著政治正確看齊，以求自保：全體蘇聯人民了解到這些無比卑劣的罪行，無不義憤填膺，就像一個人一樣……意味著所有我們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間，「就像一個人一樣」了（《癌》，469）！

權力的運作成為一種自動的精細形式，讓身處其中的人們自動自我監視並且監視他人，在無形中接受社會教條的制約，而逐步陷入馴化的陷阱。事實上，身處在規訓權力裡，無論能否執掌權力的執行，個人都無法自外其中，也沒有辦法真正掌握權力，「隸屬於這個領域並且意識到這一點的人承擔起實施權力壓制的責任，成為征服自己的本源。」（DP，227）。因此在規訓權力當中的個體，沒有人能夠真正掌握權力，因為「通過這一機制的運用，監視者同樣也受到了規訓。那些在圓形監獄中佔據主要地位的人也完全捲入對其行為的定域和秩序化之中。」⁸³這個趨勢在文本主要體現在監視者——魯薩諾夫以及舒盧賓往往終日生活在未知的惴惴不安上，他們或受良心不安的譴責，或者擔心昔日被密告者來進行報復，因此在病中都惶惶不可終日。可以說，他們雖然都曾經一度影響了其他個體的命運，但是卻同樣無法自外於這個無所不在的權力場，在規訓權力的領域之中，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而都是沒有差別地被劃入規訓權力的範圍。

⁸³ 《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頁 243。



第三章 《癌症病房》中的抵抗形式與意義探討

觀照文本，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不斷出現的事實，那就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抵抗與反叛作為，充斥在他所遭遇的醫療行為裡。甚至，可以發現他經常在思想上對他人進行挑戰。令人費解的是，對於主人翁這樣一位曾經因癌症而瀕臨死亡的人而言，對於任何醫療行為應該是毫不遲疑地接受，甚至他在接受治療之後的十二天已奇蹟似地控制病情，他更沒有對於任何一項治療抱持抵制，甚至抵抗態度的理由。在他這種抵抗與反叛的思考背後所存在的動機，值得加以深入探討。

在上一章當中，已就文本中所存在的規訓權力進行論述，說明權力是以如何的手段對書中的個體加以規訓，質言之，乃是以規訓權力的角度來探討文本當中的權力。但是，在傅柯的權力理論中有一項極為不同的特色，就是他在研究權力時對於「抵抗」的強調。本章將以抵抗在權力互動場域當中所具有的意義切入，分析科斯托格洛托夫抵抗行為背後的意涵。文章首先將介紹傅柯權力理論中對於抵抗的詮釋；接著將以傅柯「異質空間」及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說明「癌症病房」作為抵抗場域的背景。在正文的部分，將就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醫療的抵抗，及文本中個體之性意識在抵抗中所具備的意義進行論述。

第一節 「抵抗」在傅柯權力理論中的意義

傅柯的權力理論當中，有一個很特殊的要點，就是對於抵抗的關注，亦即，他主張從權力的另一面——抵抗的角度來對權力關係進行研究。傅柯的前提是，先不要把權力關係當作分析的起點，而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對抵抗的研究，也就是說，透過反抗和對抗爭的分析來了解權力關係。在他看來，這樣的研究方法「更具經驗意味，更直接地與我們的現狀有關，它也意味著更多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繫。包括把對各種權力的反抗形式作為出發點。」⁸⁴傅柯將權力關係中的抵抗視作一種催化劑，以便「揭示權力關係，找到它們的位置，其它應用特點以及所使用的方法」。⁸⁵可以說，他認為與其從權力的內在角度去分析權力關係，不如跳脫這樣的框架，通過「策略的對抗性」(antagonism of strategies)去分析權力。傅柯打了比方，要知道合法是什麼意思，先得問一下非法指的是什麼，因此，「要想了解何為權力關係，也許我們應該拷問反抗權力的形式，以及旨在分解這些關係的意圖。」⁸⁶在傅柯看來，權力只有依據眾多的抵抗點才能存在。⁸⁷

儘管傅柯認定，抵抗只存在於權力關係的戰略範圍之內，但是他極為看中抵抗的積極特質，因為「有權力，就有抵抗」⁸⁸，權力存在的基礎和不變的條件是，它和自由之間挑釁和鬥爭的關係。因此，權力關係在沒有不服從或沒有逃避手段的地方就不會存在。然而，抵抗並不是處處受到打壓，「並不意味著反抗僅僅是對權力關係的反擊或反動，最終只能形成被權力統治、永遠處於被動地位、註定要不斷失敗的對立面。」⁸⁹相反，在權力關係中，抵抗是權力的另一面，「是權力關係不可消除的對立面」⁹⁰。它有時明確地喚起一些團體或個人，激起某些人生命中的某些時刻及類型的行為，因此，它在本質上是與行動深刻相關的，「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並不

⁸⁴ 〈主體與權力〉，《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頁 270。

⁸⁵ 同上註。

⁸⁶ 同上註。

⁸⁷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82。

⁸⁸ 同上註。

⁸⁹ 同上註。

⁹⁰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83。

是在於攻擊這樣或那樣的某個權力機構、或某個組織、精英集團或某個階級，而是反對某種權力的技術、權力的形式。」⁹¹

以本論文研究策略來說，從抵抗的角度來分析文本當中的權力關係有其必要性。受限於當時的時空環境，索忍尼辛在書寫時為了躲避檢查，以免動輒得咎，所以儘管作品的批判動機十分強烈，但也不免要使用較為隱晦的、迂迴的方式，才得以對體制的不公提出批判。借助傅柯的權力研究方法，從反方向以抵抗的角度來研究權力，探究文本中個體所抵抗的對應體，才能撥雲見日，看到隱藏在索忍尼辛迂迴寫作策略下的批判脈絡。

作為一個規訓權力施展權力技術的場域之外，癌症病房同時也是一個抵抗的場域。要證明癌症病房為一個抵抗的場域，以下首先將以傅柯理論架構中具有反抗意涵的「異質空間」理論為主軸，說明癌症病房所具備的「異質性」以及它如何作為一個抵抗場域。



⁹¹ 〈主體與權力〉，《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頁 272。

第二節 作為抵抗場域的癌症病房

癌症病房的功能與角色，毋寧是複雜的。如上一章所探討，癌症病房是一個對個體施以規訓的權力空間；但觀照文本當中，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為主的個體，經常對醫院中的規訓採取抵制乃至抵抗的行動可以發現，癌症病房又具有「抵制—抵抗」的特質。

壹、異質空間角度的詮釋

「異質空間」理論，是傅柯晚期思想中關於空間理論的重要學說。他以異質空間來詮釋這個時代所代表的新紀元。他認為，我們關於空間的想像已經跨入了一個新的面貌，空間在同一個時空當中星羅棋布地並陳，代表著相異的向度，甚至具有不同的功能；空間之間並產生著對話與互動，形塑了我們的心靈面貌與生命基調。癌症病房具有若干特性，致使它可以用異質空間的定義加以詮釋，以下將分述之。

醫院作為一個醫治病人、介於生死範疇之間的場域，它是一個危機地點，如傅柯所說，「保留給某些相對於他們範圍之社會或人類環境而言，處在一種危機狀態（a state of crisis）的個體。」⁹²由於生死範疇的時間狀態短暫，並不屬於常規空間下的時間慣性，所以癌症病房符合傅柯對異質空間在時間上的認定，癌症病房與「時間的片刻性」相關，它與「最瞬間的、轉換的、不定的時間對應，是一種以節慶的方式與時間關連的異質空間。這些異質空間，不是指向永恆，反而是絕對瞬時的（chroniques）。」⁹³

這種由生病的危機狀態所編織出來的某種虛空、空茫的感受，使癌症病房在生死的邊界遊走——非生即死的挑戰讓身在其中的個體感受到一切都顯得虛無了起來。由於當時的醫藥技術不如今日發達，個人一旦患了癌

⁹²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04。

⁹³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06。

症幾乎就如同被判死刑一般，誠如蘇珊·桑塔格所說，「儘管在治療癌症上已有相當進展，許多人仍贊同：癌等於死。」⁹⁴所以對於身在其中的病人而言，處在癌症病房的狀態無異與生活的一切產生了徹底的區隔，如同傅柯所說，「異質空間通常預設一個開關系統，以隔離或使它變成可以進入」⁹⁵。這個開關，是依據某種儀式化的過程，經過某種身分的確認，才能決定個人是否得以進入，無疑地，具有癌症病體身分的病人才能進入這個空間，正常人則被阻絕在外。作者在描述魯薩諾夫初入院時，就不斷提到這種阻絕性：自從從樓梯底下換好了衣服，告別了親人，上樓走進這個病房，先前的生活就彷彿碰地關上了大門（《癌》，13）；或如，然而，這一切，〈…〉在幾天之內就與他分隔開來，留在腫瘤世界的彼岸了（《癌》，19）。空間的阻隔，將病人與正常人世界的一切都劃分了開來，這種殊異性使得癌症病房得以與規訓權力的社會有所區隔，進而成為一個抵抗的場域。

與象徵完美與美好，但實際上卻不存在的烏托邦相比，傅柯強調異質空間的真實性，它並不是一個虛無的空間；相反地，它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最重要的是，它對於我們的世界具有某種功能性，是一種對照，或者襯出我們世界是更不真實，或是有缺陷的，如汪行福所言，「異質空間的焦點不是在於空間的異質性，而是空間的他者性。異質空間指向的是對現實和自我的超越。」⁹⁶要對現實進行超越，首先必須認識到現實空間的不足之處，並試圖超越，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癌症病房做為一個異質空間，它就被賦予了抵抗的意義，「任何社會結構即使再嚴密，依舊存在著空隙和裂縫，使個體得以逃逸的他者空間。因此，異質空間的功能性當中有一個重要意涵，就是它存在著抵抗的深層隱喻。」⁹⁷癌症病房存在某種間隙，因此到這裡的人能夠暫時獲得喘息；同時，這又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地點，在這裡，病人彷彿因著病體而得到某種「特權」，他們能夠以死亡作為自己與規訓權力之下，被監視的個體作區隔，獲得一個截然不同的身分，這也使得抵抗在癌症病房中得到了空間。

⁹⁴ 《疾病的隱喻》，頁 25。

⁹⁵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07。

⁹⁶ 汪行福，〈空間哲學與空間政治——福柯異托邦理論的闡釋與批判〉，《天津社會科學》，第 3 期，2009，頁 14。

⁹⁷ 〈空間哲學與空間政治——福柯異托邦理論的闡釋與批判〉，頁 15。

貳、癌症病房的狂歡化意涵

癌症病房具有廣場性。在巴赫金的學說當中，廣場與「狂歡節」、「狂歡化」等概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狂歡化「代表著文化的離心力量和眾聲喧嘩，與一元統一的中心話語向心力量抗衡。」⁹⁸在當中，往往充滿著對個體的「脫冕」和「加冕」以及各種形式的「上下倒錯」傾向等，這些特點在癌症病房當中都得到了體現。癌症的病痛所帶來的死亡威脅，抹平了一切的階級差異，癌症病房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失序空間，而成為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歡節廣場，那裡充滿著加冕、脫冕與上下倒錯的景像，顛倒了官方意識型態的政治等級，讚美生命力，生命的創造、讚揚性欲，阻咒一切妨礙生命力的僵化與保守力量。

一、《癌症病房》中的脫冕與加冕

狂歡節的「脫冕」與「加冕」形像當中，具有新舊權力交替的隱喻意涵。任何舊權力、舊真理都是人們所欲除卸的對象，因為它們往往「表現出追求絕對性和超越時間的重要意義之妄想。」⁹⁹這種絕對性和超時性往往會對進步造成阻礙，也阻滯了生命的自由奔放。癌症病房作為一個由疾病重新定義個體的場域，在文本當中也具有個體之脫冕與加冕的現象。

首先是官僚魯薩諾夫。在前文述及，魯薩諾夫因為掌管人事檔案的職務，因此在社會中不可一世，操持著許多人的生殺大權。但是來到了癌症病房之後，他的地位也在罹病的事實之中崩解，才住院不久，魯薩諾夫就已經感受到自己的凋零，不過幾個小時的工夫，魯薩諾夫就似乎失去了自己的整個地位、功績和未來藍圖，變成了只不過是七十公斤重的白淨而溫熱的肉體，連明天自己會怎樣都不知道（《癌》，14）。他嘗試藉由想念家人和思考國家大事來讓自己回歸到入院前那不可一世的身分，但卻徒勞無功。他也習慣性地嘗試動用自己的特權，以使自己能在院中獲得特殊的待

⁹⁸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金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1995，頁267。

⁹⁹ 巴赫金著，白春仁譯，《巴赫金全集》（卷六）。石家莊：河北教育，1998，頁243。

遇，但也是枉然。他一切的努力，都被腫瘤給阻卻，那腫瘤不斷「把整個世界封閉了起來」。魯薩諾夫權力被卸除的關鍵場景，莫過於他在向主治醫師發難時的滑稽經過。

為了抱怨自己所受到的待遇，他……考慮，選擇一種什麼樣的姿勢與醫生相見最合適，最後決定半臥在床上，認為這樣會收到更大的效果（《癌》，54）。但是他的抱怨在東佐娃冷靜而不可挑戰的權威中被化解於無形，他在社會中管用的威脅、脅迫等手段，在東佐娃面前都無法發生作用，最後只得屈服。可以說，魯薩諾夫的權力在醫院中被消解，他經歷了一個「脫冕」的過程。

此外，病體的衰弱讓他對於過往被自己密告下獄而可望平反歸來的人加倍恐懼，值得注意的是，魯薩諾夫擔心的，竟是害怕被他們飽以老拳：……說不定那人明天早晨就會衝破護士和護理員的一道道阻攔，闖進這裡來揍他。魯薩諾夫所怕的，不是受到審判，不是輿論的譴責，也不是出醜，而是挨揍（《癌》，205）。儘管已經過了若干年，那人在集中營當中也已經不復往昔強壯，但是在魯薩諾夫的設想中，正是這個健壯的人揮舞著拳頭闖進病房裡來。而他卻無法擺脫這個虛幻的形象（《癌》，206）。這個現象所具有的隱喻，可以從巴赫金狂歡化理論加以詮釋。事實上，廣場中，毆打具有脫冕的意涵，「辱罵和脫冕，作為關於舊權力、關於垂死世界的真理，跟狂歡化的毆打結合起來。」¹⁰⁰毆打當中具有脫冕的意義，是對於魯薩諾夫權勢地位的一種消解，因為病房這個場域是屬於病體的，魯薩諾夫是病體、是虛弱的，也是不具有力量的，他的力量被疾病所取消。這種脫冕具有多重層次：「所有的毆打都具有廣義象徵和雙重的意義：毆打同時既是殺害的（極端言之），又是贈與新生命的；既是結束舊事物的，又是開始新事物的。」¹⁰¹因此，魯薩諾夫的深層恐懼，是自己權力的喪失與自身地位的淪落，因為在規訓權力所建構的領域中，魯薩諾夫被安然地保護著，是病體導致了他力量的喪失，以及權力的被剝奪。因此我們可以說，癌症病房中，由著疾病對個體的重新定義，消解了階級與權力，這正是一個「脫冕」的過程。

¹⁰⁰ 《巴赫金全集》（卷六），頁 226。

¹⁰¹ 《巴赫金全集》（卷六），頁 235。

「脫冕」的現象，同時也發生在主治大夫東佐娃身上。在罹患胃癌之前，東佐娃因為掌握疾病知識，因此在醫院當中握有決定病患生死的大權，但是在罹病之後，她因著知識權力所帶來的優越感也隨之消亡。曾經令她感到無比熟悉的病理，在降臨自己身上之後，也顯得陌生了起來：東佐娃怎樣也料想不到，自己熟悉到這等程度的事情，竟會如此倒轉過來，變成完全新奇和陌生的事情（《癌》，482）。過往，她生活在一個安穩的體系，在這個體系當中，她疏離而冷靜地評斷著病人的生死大事，對她來說，生命取決於正常與不正常，正常的以及偏離正常的一切，都可以從權威的著作中得到合理的解釋（《癌》，482）。可以說，她生活在一個醫師知識權力所建構的安全體系中。她患病、感到醫師權力之被剝奪，來得猝不及防，幾乎是在一瞬之間的變化，忽然，在僅僅幾天的時間裡，她自己的身體竟從這個協調的系統中跌了出來，掉在堅硬的地上，變成一個沒有任何防衛能力的口袋，裡面裝滿了隨時都有可能疼得叫喊起來的器官（《癌》，482）。在罹病的歷程之中，東佐娃感受到了自己的權力被疾病剝奪的感受，這是病體對於東佐娃的一種「脫冕」。

與此相對，作為一個意義上的「廣場」，癌症病房當中也存在著對於個體的「加冕」現象。這主要是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為代表。在奇蹟般獲得痊癒之後，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受到自己因為健康的軀體，而帶來的自我權力感上升，

瞧，奧烈格這次坐在護士辦公桌旁，似乎在社會地位和世界對他的看法都提高了一步。那個已無法挽救的「他」，那個不應再佔床位的「他」，已與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無關，他不屬於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彷彿他是不可能死的，彷彿他是完全可以治癒的（《癌》，177）。

軀體的健康賦予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自我想像當中的騰升，由此為發軔，他開始在自信的基礎之上產生積極的自覺，繼而在醫院當中進行抵制的行動。在醫院當中，科斯托格洛托夫可以和所謂的自由人自在地交談，這在他過往的生命經驗中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因為病友們迫切希望由他這裡知道治療癌症的偏方，因此他又感受到另一次自身意義上的騰升，坐在

他面前的這些虔誠的自由人，正等待他這個無拘無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賜給他們以希望的支柱（《癌》，156）。窗台上的他宛若接受崇拜一般受到仰望，是知識賦予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冠冕，使流放犯在癌症病人中間，能以平等的姿態甚至較高的地位與他們交談，所以，健康在這裡之於科斯托格洛托夫，具有「加冕」的意涵。

癌症病房消解了規訓權力的常態，並且賦予人以新的地位與價值。如同作者在文中所敘述，癌症病房是一個「審判」的地點，在這裡，無論是官員魯薩諾夫，亦或是流放犯科斯托格洛托夫，都無一例外地將受到審判，這個審判無疑是嚴酷且赤裸裸的，是對於良心的拷問，在這種審判面前，過去的靠山和功績，都為他辯護不了（《癌》，216）。而在這個審判面前，高下立判的對比，在魯薩諾夫和科斯托格洛托夫之間極為明顯，被密告下獄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因為在良心上的純淨，因此儘管他際遇坎坷，但他卻是被舒盧賓所欣羨的，因為他很少說假話，……至少不那麼卑躬屈膝（《癌》，469）。與他相對，魯薩諾夫卻因為良心受到譴責而惴惴不安，擔心受到昔日被陷害者的報復，在他怪誕的夢境當中，他過往迫害他人的經驗揉合成一個驚悚的體驗，他在面對這些怨懟者交織而成的夢境時，依然振振有詞的宣稱，判決、審問都與他無關，他偵查的目的只是為了查清事實，履行普通公民的職責；但是這一切都無法掩蓋他心虛與驚愕的心境。由此，科斯托格洛托夫與魯薩諾夫由於在良心上的差異，因此顯現出不同的高度，在癌症病房的審視當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歷經了在心靈上的「加冕」，魯薩諾夫則是呈現出道德良心上的「脫冕」。以上所述都呈現了癌症病房中「加冕」、「脫冕」中所顯現的狂歡化特質。

二、《癌症病房》中的對話與離心內涵

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中，特別強調人們在廣場上自由自在、毫無拘束的對話。在他看來，這種對話具有生命力，且具有反動的力量，是對於僵化的官方語言的挑戰與衝擊，具有「離心」的意涵。由於狂歡節並不屬於一個常軌下的時空範疇，它是一種反常的、節慶式的特殊時空，因此在其中的對話往往顯得特別真實而有力。癌症病房作為一個暫時性的地點，藉由疾病將病房之內與病房之外劃分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使得病人們得

以暫時逸出由規訓權力所構築的網絡，在病房內暢所欲言；其性質，就仿若巴赫金筆下的廣場般自由，巴赫金指出，「在狂歡節的廣場上，在暫時取消了人們之間的一切等級差別和隔閡，取消了日常生活，即非狂歡節生活中的某些規範和禁令的條件下，形成了在平時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種特殊的既理想又現實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這時人們之間沒有任何距離，不拘形跡地在廣場上自由接觸。」¹⁰²

如同小說人物舒盧賓所證實的，他與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中的若干對話，也是由於在病房中、以及自己即將上手術台的命運，才讓他敢於暢所欲言（《癌》，474）。由此可知，癌症病房做為一個「危機地點」，它使不同的聲音得以交錯其中，呈現出一種有別於規訓空間之靜默、僵硬的普遍現象。在巴赫金的詮釋中，狂歡節以自己的語言，特別是以笑語來作為自己的聲音，以自己的笑話來「建立自己的世界以反對官方的世界」¹⁰³。這種笑是對官方語言的嘲諷，以積極建構屬於自己的話語權力與想像；換言之，它成為一種相對於官方色彩的批判語言，以揭露官方世界中的虛偽與不良。在癌症病房當中，這種話語成為一種批判的形式，站到蘇聯體制的另一面，對它進行反詰。

小說當中對於這種話語解禁的使用顯得最為明顯的，就是主人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將自身的批判意識與對於社會的針砭，寄託在與不同人物的對話之中，呈現出一種有別於蘇聯體制之集體噤聲的現象。在與護士卓亞(Зоя)的對話當中，他批判了蘇聯在德國對列寧格勒圍城戰當中的失策，未預先估計到列寧格勒的突出地位和防禦意義，致使無數人民在圍城過程中受困而死（《癌》，36）；在東佐娃大夫問診的過程中，他花了很多心神向東佐娃描述流放地對他一系列荒謬的醫療舉措，以揭露流放地種種不人道的對待措施（《癌》，79-84）；除了對蘇聯體制進行批判，他也在與曾同為集中營囚犯的護士的對話中，批判了人民對於發生在同胞身上的慘禍視若無睹時的冷漠，最終導致了1935年列寧格勒四分之一人口被放逐的慘事，他說道：「為什麼在災難還沒有臨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身上時，我們就無動於衷？人的本性怎麼是這樣的？」（《癌》，522）

¹⁰² 《巴赫金全集》（卷六），頁19。

¹⁰³ 《巴赫金全集》（卷六），頁88。

在科斯托格洛托夫與魯薩諾夫的爭辯中，彷彿是規訓體制之下受苦個體，對規訓權力進行批判的縮影。例如，當魯薩諾夫在批評托爾斯泰的著作中存在太多極端的宗教迷信與道德上的嘮叨時，科斯托格洛托夫毫不保留地批判他：「為什麼談道德上的自我修養會引起您發這麼大的脾氣？這個問題會刺痛誰呢？只會刺痛那些道德上的敗類！」（《癌》，152）他直接將魯薩諾夫指責為道德上的敗類，可以說是對於這個人所屬的規訓權力的全面批判。蘇聯治下的社會往往會對人們的閱讀進行檢查，對於人們的思想加以鉗制，對此，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是毫不留情地批評：「為什麼要妨礙別人思考呢？歸根結底，我們的生活哲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癌》，154）文本當中的種種對話，都呈現出對規訓權力離心的特性，使癌症病房成為一個抵抗的空間。

在瀕臨死亡的威脅卻又奇蹟康復之後，經歷了軍隊、集中營、永久流放等規訓權力無所不在監視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終於得以獲得短暫的逃脫，以健康的身軀在癌症病房中重新意識到自己的自主性，在醫院這個異質空間進行反動、抵抗。以下將就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癌症病房中抵抗治療、抵抗激素治療所造成的性能力喪失，乃至他對於體制的種種批判，其背後所具有的意義進行論述。

第三節 個體對醫療的抵制形式及意義探討

雖然，醫院的治療讓科斯托格洛托夫痊癒，原本在瀕死邊緣的他在短短十二天的治療之下起死回生，甚至逐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還是在兩星期以前他就認為自己同生活已經完全絕了緣分，而現在生活卻又突然回到他的身邊——這種感覺占據了他的心靈（《癌》，167）。這在那個普遍將癌症視為絕症的年代，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既然如此，科斯托格洛托夫為何仍如此堅決地要提早出院，不只一次質疑醫院的治療，抵抗種種醫療措施，甚至提到自己會從醫院中逃出去的意圖？

同樣的疑問，放射科主治醫師東佐娃也曾經提出，她不解，為何科斯托格洛托夫抱怨在集中營和流放地沒有給他治病，但在癌症病房時又認為給他的治療太多。對此，科斯托格洛托夫拒絕治療的原因是，他想以這樣的身體狀態過上幾天正常的生活，我不願現在就付出太大的代價以換取未來什麼時候能過正常生活的期望。我寄希望於自身機體的抵抗力。（《癌》，61），自己雖然初到病院時與一具屍體無異，但是他並非不惜一切代價只求活命，因為世上沒有任何東西會使我願意不惜任何代價去換取！（《癌》，86）這在東佐娃眼中自然是個謬論，怎麼會有人願意與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甚至不惜抵制醫療行為；但若從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角度觀之則不難理解，他將醫院的醫療視為是規訓權力的延伸，是規訓權力對於個體進行監視進而馴化的同義詞，因此他決定起而抵抗，好過上幾天「正常的生活」，也就是相對自由的、不被監視、支配的生活。

為此，他首先質疑醫師治病的權力，……為什麼你們總是認為自己有權力為別人做出決定？要知道，這可是一種可怕的權力啊，很少導致好的結果。你們真的要當心！即使是醫生也沒有這個權力（《癌》，88）。以此相對，他堅持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我只是想提醒您，我有權支配自己的生命。人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不對嗎？您是否承認我有這樣的權力？（《癌》，84）依據這樣的思考主軸，科斯托格洛托夫進行了一連串抵制醫療的行動，接下來本文將就這些抵抗行為進行分析。

壹、科斯托格洛托夫作為抵抗者的外在形象與精神特點

文本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抵抗形象頗為特出。他是一個有自覺的抵抗者。這首先表現在他的外型上，作者不斷透過旁人強調他的形象，是剛強而堅毅的，例如在護士卓亞眼中，他的臉不怎麼和善但剛毅堅強（《癌》，41），他的臉古板而執拗（《癌》，184），在集中營鬥毆時於臉上留下的傷疤很明顯，從接近嘴角的地方開始，沿著左頰的底部幾乎一直拐到頸脖，以及他那生硬而粗暴的表情，使得鄰床的魯薩諾夫苛刻地做出結論，說他長著一付強盜的嘴臉（《癌》，15）。但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外形之下，小說中與他有曖昧情愫的女子都為他陽剛堅強的氣質所吸引，卓亞認為他「堅強和剛毅」（《癌》，186），薇拉認為他帶給人安全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男人」，她們都認同他這種經過考驗、經過種種磨難而依然不屈的剛強。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在科斯托格洛托夫這個姓氏上凸顯了他桀傲不遜、勇於挑戰且略帶侵略性的特點：Костоглов 在俄文中是由「吞食」（глотать）以及「骨頭」（кость）這兩個詞所構成的，官僚魯薩諾夫在還不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姓名之前，就已在心中稱呼他為「啃骨者」（Оглоед），在在都顯示出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個剛強不屈、帶有反抗性格的人物。

主人翁的自覺展現在他對於自己病情掌握的堅持上，為達到這個目的，他不顧禁令，向還在醫學院就讀高年級的護士卓亞，借了專門的腫瘤解剖書籍來研讀，以確保自己不會被治過了頭（《癌》，89）；同時，作為一個病人他對自己的疾患做了精心的研究，研讀醫學書籍時的各種問題都設法從主治大夫那裡旁敲側擊出解釋，儼然是一個生病專家，因為，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弄明白治療的原理並相信其正確性之前，是無法毫無保留地接受治療的（《癌》，76）。事實上，科斯托格洛托夫這樣追根究柢的態度其來有自，當他尚在集中營監禁的時候，就已經留心那些同在集中營中的知識分子，以及任何具有知識之人所傳遞的智慧。他奉行祖父的口頭禪「傻瓜

好為人師，而聰明的人甘當學生」¹⁰⁴（《癌》，131），因此他雖然隨時隨地都惡言惡語地嘲笑知識，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卻從不放過一點一滴的見聞（《癌》，131），在集中營的漫長歲月中他吸收了不少寶貴的知識，包括原子物理、西方建築、養蜂學等，甚至還有拉丁文，所以他能夠毫無困難地解讀病友被以拉丁文寫成的出院診斷，判斷出他的出院並不是由於康復，而是因為病人膏肓。對此，科斯托格洛托夫特別強調這種自覺的重要性：他認為向主治大夫爭取了解一切病灶的權力，只適用於像他這樣「見過世面（видалый）的人」（《癌》，132），所謂「世面」，就是知識；而掌握知識的關鍵，就是一種自覺，一種勇於挑戰、不願任人擺布的自覺。這是科斯托格洛托夫與其他病人、乃至小說中其他個體一個重要的分野。

相同地，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自己的自覺也傾注了相當大的決心。當他與病友們分享恰加（чага）這種樺樹增生物¹⁰⁵的抗癌秘方時，那些可以在國內自由移動的病患們，卻只看到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眼中顯得枝微末節的阻礙，較之受制於流放者身分、不能自由行走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他所具有的「為了一個主要目標，不惜犧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諸腦後」（《癌》，162）之氣魄，自有極大不同。這樣的自覺與決心，正是促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對醫療行為進行抵抗的精神基礎。

貳、對注射之醫療的抵抗及其意涵

出於對一切規訓權力無所不在的監視之厭倦與不信任，科斯托格洛托夫將一切的醫療行為都視作規訓的一部份，因此他竭力抵抗。他排斥不自然、人為的醫療行為。他拒絕抽血，把血液視作自己身體的重要成分，是個體機體不可侵犯的象徵。他所說的，「我的血已經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給了」（《癌》，73），具有深層的隱喻意涵。自然，在入院前期由於瀕死過程當中的治療使他被抽去了不少血液，但這也是其對於一連串規訓行為下一種心靈的自況，而這種表露，身為規訓者的醫護人員是無法體會的。主人翁不解為何要抽血、驗血，醫護人員回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對他進行輸

¹⁰⁴ 原文為：дурак любит учить, а умный любит учиться。

¹⁰⁵ 又稱為「樺樹癌」（рак берёзы）。

血，他對於輸血的態度卻是極為排斥。在醫護人員眼中，病人「都擺出那種架式，彷彿他是伯爵血統，生怕被別人的血搞混。」（《癌》，356）除卻對於醫療行為的不信任，這顯示出某種對於自身主體性的堅持與保衛。如傅柯所說，「血，很長時間一直是權力機制及其形式與儀式的重要組成成分。」血是一種身分的象徵，一種主體的識別，人們藉由血液辨別異同、親疏，確認自身的個性與存在。一直以來，權力都透過血在發言，無論是戰爭、執刑、剝削，血都是這些形式當中最直接的觸媒與符號，對於權力而言，「血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現實」。因此，對個體而言，「血是基本價值觀之一」。實際上，血液的重要性在於它的多重意義：「它所具有的工具作用（能夠灑血）、它的符號功能（具有某種血統，同一血統，用血冒險）」，個體透過當中的犧牲意涵與識別性作為與權力抗衡的籌碼，以確認自身的不可侵犯。但是傅柯還提到血液的不穩定性，說血液「易流淌、易乾涸、極易混合、極易變質」，¹⁰⁶這種不穩定性容易導致主體性錯亂，造成價值的偏移，自身認同的混淆，而引起個體憂慮。對於亟欲在規訓權力的監視下，尋求自我定位與突破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而言，「抽血」與「輸血」正引發他的這種深層焦慮：一方面是自身主體性的透支與流失，一方面則是價值意義上的混淆，所以，對他來說，自己的血，縱使遭到 X 光的破壞變成滯緩的病血，也畢竟比補充進來的病血更寶貴（《癌》，356）。他堅持，別人的血不要，自己的血不給！（《癌》，355）

這樣的思維所及，因此他將侵入血管的治療，都視為是一種侵犯，他同樣也排斥葡萄糖的注射。他說，每一種藥何必都打針呢？自然界能見到這種現象嗎？……再過一百年，後人將把我們當作野蠻人嘲笑（《癌》，87）。半個世紀後的當下再來看這段文字，當然顯得偏執而不合時宜，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把葡萄糖和每一種藥的注射都視為是一種侵入，一種對血液的汙染，就這個角度來詮釋，就不難理解他為何抵抗這種醫療行為。

¹⁰⁶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125。

參、對射線治療（ рентгеновские лечения ）的抵抗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垂死邊緣入院治療之後，院方將他從死神手中拉回的關鍵作為是射線治療。射線治療的療癒功能卓著，自入院始在經過十二次的照射之後科斯托格洛托夫復原神速，他重新有了生的願望和生活的樂趣，吃飯也有了胃口，甚至恢復了愉快的情緒（《癌》，86）。既然如此，科斯托格洛托夫為何要抗拒射線治療？現代人已知之甚詳，過度的射線治療往往會引发病變後遺症——「遲發性射線病病變」（поздние луче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但在當時卻是嶄新的醫學發現，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僅僅是因為隱隱感到不妥與不適才拒絕接受這類治療。在筆者看來，在當時的語境下射線治療與射線病本身具有隱喻意涵。先看以下描述：

無堅不摧的 X 光束，人的頭腦無法想像的、顫動著的電磁場向量，或者用比較易懂的說法叫做原子砲彈，開始傾瀉下來，透過留出來需要照射的一塊腹部皮膚組織，爾後再透過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稱的間層和器官……然後透過硬榻的板面、四厘米厚的地板，透過格柵，透過填料，繼續深入堅硬的地基或地下，所到之處都被撕裂、射穿（《癌》，76）。

這裡可以看到軍事語言的應用，如桑塔格所言，「在癌敘述中取得優勢的隱喻，不是得自經濟學而是得自戰爭語言。」¹⁰⁷癌治療具有軍事意味，「放射療法使用空戰隱喻：病人受放射線轟擊，化學療法是使用毒物的化學戰。」¹⁰⁸因為癌被視為敵人，被視為大患，必須加以轟擊，給予迎頭痛擊並剷除。在蘇聯的語境中，為了實現某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國度，往往會訴諸浪漫而非理性的手段來實現這種目的，但是這種意義上的「浪漫」卻經常會帶來毀滅式的災難，這種災難就是對於個體無條件的壓迫與侵害。卡爾·巴柏（Karl Popper）就針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做出警告，他引用柏拉圖的話指出，「激進主義者將城邦和人民的性格當作畫布，第一步

¹⁰⁷ 《疾病的隱喻》，頁 75。

¹⁰⁸ 《疾病的隱喻》，頁 76。

工作就是要把畫布弄乾淨」，¹⁰⁹所謂「清潔畫布」，就是「根除各種現存的制度與傳統，必須以整肅、下放、驅逐、殺戮來進行『清除』」¹¹⁰。激進主義者將亟待淨化的個體視作腫瘤、癌，將其投到集中營以及流放地中，以達成社會這個畫布的淨化。社會上的異己似乎減少，整個社會似乎趨於安定與一致，適合推展烏托邦的建設工程，但實情卻遠非如此。任何採取非自然、甚至是暴力手段所進行的改造，必定會引發反撲與後座力，其發展過程就如同小說中射線治療的衰變歷程一樣：…還不曾有「射線病」（лечевая болезнь）這一名稱的時候，X光照射被認為是最見效的、極為可靠的治療方式，……當時只擔心組織和骨頭的早期嚴重損傷，但那時當即掌握了如何避免這種損傷的措施。於是也就照個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對良性腫瘤也照。對小孩也是如此（《癌》，99）。在這個治療的隱喻中，射線治療被視為是烏托邦社會中那種社會淨化之意圖的投射，它冀求的是對變異分子的剷除，這種手段雖然可以造成一時的和諧與方便，但長期而言卻是對於社會機體極大的斷傷，造成社會的扭曲與不正常化。為了確保小說在蘇聯境內的順利出版，索忍尼辛宣稱《癌症病房》所講的，明明確確就是癌；見諸文本，索忍尼辛的確小心翼翼謹守這項寫作策略，沒有直接將癌症與蘇聯社會進行附會，但是他仍透過隱喻式的語言對蘇聯的種種畸形進行批判。如同桑塔格所說，「病向來被用作隱喻以作為對社會腐敗或不公的控訴」¹¹¹，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這裡所抵抗的射線治療，其潛文本乃是索忍尼辛對蘇聯境內的集中營與流放地深沉的控訴，此處，射線治療也可以視為一種蘇聯體制之規訓手段的隱喻。

肆、自我治療中的抵抗意識

在抵抗醫院的醫療行為之外，科斯托格洛托夫並且積極地尋求自我痊癒的途徑。他引用笛卡兒的話，認為可以懷疑一切，認定病人們不應該像家兔一樣聽任醫生擺布（《癌》，150），這裡的自療意象具有隱喻的意涵。科斯托格洛托夫首先從自己研讀的病理解剖學當中得到結論，認定自行痊

¹⁰⁹ 卡爾·巴柏著，莊文瑞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台北：桂冠，1995，頁386。

¹¹⁰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頁387。

¹¹¹ 《疾病的隱喻》，頁82。

癒的例子是有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引用了樂觀主義生理學（физиология оптимизма）的理論，認為情緒良好、精神飽滿的人就不易生病，反之，人就容易患病身亡，這當中的關鍵，就在於人的道德。科斯托格洛托夫接著提出了具有道德預言意義的話語，他說，如果再過那麼一百年，我們的機體在問心無愧時會分離出一種鉍鹽來，而在問心有愧時則分離不出來（《癌》，152）。在這裡，作者將癌症的隱喻與「報應」的思考互相結合，暗示罹患癌症與某種罪惡感的連結性，癌症是在規訓權力作用，個體受到壓抑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個體必須透過對於規訓權力的認清與抵制，才能逃脫其共業，否則將受到疾厄的糾纏。如同桑塔格所說，「癌被想像成壓抑的報應」¹¹²。因此在這裡，科斯托格洛托夫將罹患癌症視為是一種在精神道德上不夠潔淨的象徵，積極借用癌症與報應的連結，號召病友進行自身的反省，並強化自己對醫療行為之抵抗的道德正當性，也具有狂歡化的離心意涵。

在科斯托格洛托夫訴諸自我治療的行為中，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邏輯，那就是他強烈的唯心傾向；亦即，在看似成理的科學敘述當中，寄託以宗教迷信的神祕色彩，在筆者看來，這毋寧是一種策略，以作為對抗規訓權力所標舉的科學知識權威之反動。在當時的語境中，人們對於自癌症當中痊癒幾乎無望的現實，使這種渲染顯得特別明顯。這首先表現在他們對於神怪迷信之事的恐懼上：即使在我們的智慧可以揭示奧秘的今天，日常生活中已沒有妖魔鬼怪的容身之地，卻也說不定會有神怪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說：我在這兒！不要忘記！（《癌》，158）出於這種深層的、原始的恐懼，於是他們開始相信奇蹟的降臨：無論我們在身強體壯、幸福順遂的時候會怎樣嘲笑奇蹟，可是一旦生活把我們逼得走投無路，只有奇蹟才能拯救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會重視這種獨特的和罕見的奇蹟（《癌》，157）。他們願意相信任何一種科學治療以外的途徑，因為在科學面前，自己是被死刑覆上陰影的囚徒。於是，當科斯托格洛托夫向病友們宣傳恰加這種偏方時，在癌症病房中引起了普遍而高昂的興趣。相傳莫斯科近郊的農民由於煮恰加當茶喝，因此極少罹癌。但當病人們發覺橫在眼前的地理上的巨大阻隔與龐大的經濟負擔之後，都紛紛打消了念頭。而儘管受限於永久流

¹¹² 《疾病的隱喻》，頁 31。

放的身分不能自由移動，但科斯托格洛托夫仍幻想將恰加視為救命仙丹、脫逃的依據，使他能像條狗似的〈…〉一連幾個月在森林裡遊逛，一心把身體養好，別的什麼也不去想（《癌》，162）。恰加滿足了病人們對於奇蹟的幻想，並暫時抵禦了病人對於癌所連結的迷信意象所帶來的恐懼；對於科斯托格洛托夫而言，則是他對於規訓權力的自覺與抵抗意識另一次實踐的著例。

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祕密用藥「伊塞克湖草根」（Иссык-кульский корень）的隱喻色彩則更為明顯。這是一種劇毒，不能嗅也不能沾到皮膚，當然更不能食用，否則就會斃命。科斯托格洛托夫取得「伊塞克湖草根」的過程頗為曲折且冒險，他不惜偷偷冒著「擅自離開流放地」的二十年集中營重罪，拖著病體到流放地以外一百五十公里的深山裡求醫。而它的研製者也具有術士的神祕色彩，鬍鬚像巴甫洛夫院士。……是個不折不扣的土醫生！……他在所住的村裡也被人取笑，在自己的故土更是談不上權威，不過，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都有人到他那裡求醫（《癌》，251）。科斯托格洛托夫甚至相信自己疼痛的消失不僅是由於照了X光，可能也由於草根的功效。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私藥在醫院嚴格的檢查中很快就被發現了，但是他對「伊塞克湖草根」的詮釋，可以從反面看出其對於醫院規訓的理解：用劇毒治病似乎包含著一種浩然正氣，因為毒物不用佯裝成無害的藥物，它就那麼直言不諱：「我是毒藥！請您當心！要麼別用，要麼您就冒險！」這樣，我們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麼（《癌》，325）。在這裡，伊塞克湖草根之劇毒的明明白白與規訓權力無所不在卻又隱晦的形象形成了對比，使用它，科斯托格洛托夫反倒覺得安心，反倒感到坦然，沒有被欺瞞的感受。同時，使用草根治病也可以視為民間療法對官方醫療方式的反動，具有狂歡化的色彩。

伍、拒絕做為知識輸出之個體的意涵

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治療進行的抵制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動機，就是他不希望成為一個醫學知識下的「個案」。文本中他自況，我一生的特點就是不喜歡當長尾猴子給人做實驗。我在這裡治病，可是什麼也不向我解釋。

(《癌》，37) 他反對將個體知識化的那些作為：他想抵制醫療過程中那些多餘的純醫學研究方面的東西(《癌》，79)。為此，他質疑放射科主治大夫東佐娃治病的權力，因為在醫師強調自己治病權力的同時，也正壓迫了病人主宰自身命運的權力，這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所無法接受的。他說，您一開始就基於錯誤的論點：既然病人進了你們的醫院，下一步就是你們代他考慮。…就這樣，我又是一粒沙子，同在營裡一樣，我又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癌》，85)。透過沙子的意象，科斯托格洛托夫將自己比擬為一個沒有個性、沒有自我任由權力規訓的個體，他不能為自己主張，只能聽人擺布，而這是他所不願意的。

在一連串的醫治以及檢查等治療行為中圍繞科斯托格洛托夫形成了大量的文書資料，這些文書資料將科斯托格洛托夫組合成了一個個案。傅柯指出，這些個案「同時既成為一門知識的對象，又成為一種權力的支點」(DP, 214)，規訓權力把人當作一個「可描述、可分析的對象」，(DP, 214)最終卻是將人視為一個知識產出的案例，人的意義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物品，一則數據，不再具有靈魂與差異；而是「作為『客體對象』呈現，供權力的凝視來觀看」。(DP, 211) 在高舉著「治病權力」的大旗之下，東佐娃不過是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例成為她的另一篇「關於射線病的報告」；「科斯托格洛托夫們」在東佐娃漫長的行醫歲月中不斷出現，他們的尊嚴與存在意義一再被東佐娃所忽視，直到其中一個科斯托格洛托夫發生異樣了，才引起東佐娃特別的關注，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說，您二十年前就給某個這樣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過，那人曾竭力拒絕，害怕這種治療，而您一再讓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為當時您還不知道有射線病(《癌》，88)。對於東佐娃來說，每一個病患，每一個「科斯托格洛托夫」都沒有不同，不過就是自己行醫生涯的一個個案，一個可以佐證自己完成副博士論文答辯的案例。這種將個人下降到物體的意念，正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要極力對抗的。

第四節 對性意識之捍衛的形式及其意涵

在科斯托格洛托夫所抵抗的醫療行為中，讓他反應最為激烈、態度最為抗拒的，無非是院方對於他所施加的「激素治療」，這是一種抑制腫瘤的療法，作法是在病患身上注射與其性別相反的性激素，其療效不明，但是副作用卻是會造成患者性功能喪失，也不再具有對於性的欲望。要探討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激素治療的抵抗，首先要關注他在奇蹟康復過程中，感受到的性欲回歸帶給他本身生命力上升的歷程。

在此之前，漫長的軍旅、集中營生涯乃至被流放的過程當中，作為一個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卑下的身分以及受限於環境因素，使他無以施展、宣洩情欲，作為一個男人，他無法感受到身為一個男人的原始欲望。被捕下獄之後，未婚妻在集中營中被姦淫的事實造成他內心的創傷，也重傷了他身為男性的尊嚴。

及至罹患癌症之後的歲月裡，病魔則是剝奪了他的元氣，讓他失卻了對於性的本能。可以說，進入集中營之後的漫長歲月中，科斯托格洛托夫都是以某一種被閹割的狀態在生活著，他失去了宣洩性欲的種種可能，連帶也失卻了作為人的自尊與價值。所以，當他發覺自己在久病初癒之後，他的康復，首先帶給他的是一種前所未有、宛若新生的感受：經過這十二天，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僅僅是回到了生活中來——恢復了食慾、活動能力和愉快的心情，他還重新恢復了對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¹¹³的感覺（《癌》，78）。他會有如此強烈的感受，來自巨大的反差。因為這種感覺在幾個月癌症的痛楚中本已完全喪失。同時，他對於女性開始有了熱切的渴望，這樣的轉變，甚至連他自己都感到驚訝：過去，他從沒那樣去想也沒那樣去看女人的腿，認為那是庸俗。他從沒從這個女人想到那個女人（《癌》，259）。因為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年輕的時候，在他漫長的被規訓的生涯當中，他把一切都耽誤了，所以，現在，正像秋天的草木急於汲取土地裡的最後汁水，以免白白後悔放過了夏天一樣，〈…〉他急於看到女人，把女人「吸收」

¹¹³ 此指性欲。

(вбирать) 到自己體內——包括不便於對她們明說那種意義上的「吸收」(《癌》，259)。

這種對於性欲的深切渴望，與科斯托格洛托夫所感受到的生命力回復有著直接關連，他發覺，種種放蕩、紛亂、低俗的凡人欲望又回到他的身上，在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顛沛流離、被剝奪一切而始終不屈的生活之後(《癌》，187)。他又有了能與正常女性在身體上較量的能耐，根據某些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跡象可以感覺得到卓亞身上有一種力，……奧列格很高興，因為他覺得自己能夠接受這一挑戰，能夠跟她較量(《癌》，188)。他在心中吶喊著：生活的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回復到漸漸康復的軀體上了！一切都已復歸！(《癌》，188)身體的康復直接讓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受到生命力的回歸，同時也使他體會與癌症病房中的人有所不同，這造就他發覺自己自尊的上升，以及自我價值的騰升。

如蘇珊·桑塔格對於癌隱喻的說法，「癌被視為減低生命力的」¹¹⁴，且「癌被視作減損性欲的」¹¹⁵，癌症病房是一個沒有生命力，不具任何性感、性別意味的場所，文本中的癌症病房，也反映出這樣了無生意的特質，例如在描寫癌症病房中的女病患們時，

不僅僅是她們那註定要挨手術刀的命運，而且還有這些灰色的、穿舊了的、即使在相當乾淨的時候看起來也不整潔的絨布病號長衫，使這些女人與女人的本分和女性的魅力絕了緣。長衫談不上什麼款式，它們都是那麼肥肥大大，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來，袖子也是毫無樣式的胖筒子。……受到疾病折磨的這種女人，身穿如此寒酸的長衫，是不會喚起任何人的愉快眼神的，這她們自己也知道(《癌》，48)。

又如，

醫院裡女人很多，可以說多得很多，但焦姆卡(Дёмка)是不願意

¹¹⁴ 《疾病的隱喻》，頁 19。

¹¹⁵ 同上註。

跨進她們那喧鬧的大病房的。如果湊在那邊的是健康的女人，經過門口時順便往裡面看一下會挺有意思，說不定能看到點什麼。但在這麼一大窩子女病人面前他不敢正視，唯恐看到什麼。她們的病是一道比尋常的羞恥心更強的禁幕。……她們頹喪得連病號長衫也不好好繫，焦姆卡甚至可以看到她們胸前或腰下的內衣。然而這種情形在他心裡總是引起痛苦的感覺（《癌》，136）。

同時，作者也以健康女性的自況，映襯出這樣的一個事實。例如，護士卓亞在給病人發藥的時候，作者寫道：

這裡，她的周圍充斥著疾患和病痛，而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卓亞感到自己從頭到腳乃至每一個細胞都是那麼乾淨和健全。她懷著異常喜悅的心情意識到自己的一對乳房既勻稱又富有彈性；在病床旁邊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時候，她感覺到它們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時候，它們又是怎麼樣地顫動（《癌》，178）。

可以說，由痊癒而帶來的性欲恢復，不只賦予科斯托格洛托夫存在的實在感與自我意識的上升，也是他與這個了無生氣的空間之間的區別。

在獲得了這種意義上的提升之後，科斯托格洛托夫亟欲以性欲所帶來的生命力——生育能力——為基礎，藉由成家來達成個人價值的確立，他想，趁著自己還沒完全變成一個廢物，設法從這 X 光療法、激素療法的虎口中逃出去。要設法保留里比多，這樣人在那邊還會有用！……回到烏什——捷列克（Уш-Терек）去。再也不打光棍了！結婚！（《癌》，302）他這樣的動機，深深吸引著與他有著曖昧情愫的兩位醫護人員——醫師薇拉以及身為醫學生的護士卓亞。薇拉與科斯托格洛托夫年齡相仿，在戰前曾經有一位未婚夫，但是卻在衛國戰爭當中犧牲了，從此薇拉孑然一身，因為那些在戰場上僥倖未死的人都不會選擇自己的同齡人而是挑選年輕的，但是薇拉依然堅持著自己心中的理想，堅持著某種忠貞，直到遇見了科斯托格洛托夫，這位在偶然中發現的青梅竹馬，她的堅持獲得了肯定與安慰。

卓亞從小生長在戰爭的顛沛流離之中，生活的重擔以及在醫院中看到

的生離死別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重大負擔，所以她將與同齡小夥子的性愛作為是自己在苦悶生活中的一種調劑，一種「苦海中的甜液」，但這樣的行為中缺少那種生活穩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礎，缺少某種具有本質意義的連續性（《癌》，171），所以卓亞仍然沒有放棄對於安定的幸福之追尋。在科斯托格洛托夫身上，她們都看到了某種堅定的安穩，薇拉感受到溫柔體貼與安全感，所以同他在一起，有如有了擋箭牌、避風港（《癌》，375）；而在卓亞眼中，科斯托格洛托夫這種經過考驗的剛毅，她在自己所結識的男青年當中還沒有遇到過（《癌》，186）。她們眼中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所以具有這般堅定剛毅的氣質，是因為在漫長的規訓歲月當中他依舊凜然不屈的精神力量所致。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以性欲所伴隨的生命力，以及成家的本能作為驅策，以實現一種自我肯定的意義，和對於無所不在的規訓權力的一種反動。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這種動機，必須從權力對性的規訓之動機加以理解。

在傅柯看來，權力對於性的攫取向來是不遺餘力的。權力對性進行「各種細微的監督、隨時的檢查、極小心的空間安排、不固定的醫療和心理檢查」，以造成「權力對身體的微觀控制」¹¹⁶，對於規訓權力而言，「性，既是通向個體生命的途徑，也是通向人類生命的途徑」¹¹⁷，最重要的是，性是「重要的懷疑對象」，它成為「不以我們意願轉移的、滲透在我們的行為及存在中普遍的、令人不安的觀念；成為我們的弱點……；成為我們每個人都有的陰暗的一面。性具有普遍的意義，它是所有人的秘密，無所不在的動機和永恆的恐懼。」¹¹⁸也由於「性欲是件個人的事情：它關涉到內在的私人快樂、危險的身體極度興奮、秘密的幻想等；它逐漸被認為是每個人的本性和個性的核心。」¹¹⁹因此，權力無所不用其極就是為了要抓取它，以便將它規訓。也因此，雖然醫院所代表的權力主體，僅僅將激素治療視為是治療行為的一部分，但是對於以性欲作為自身主體性之象徵標誌的個體——科斯托格洛托夫而言，這卻是一種非同小可的舉措。他將這種措施視為是一種監視與控制的表徵，一種無所不在的規訓權力的延伸。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性欲本體的捍衛這個行動本身，就具有積極的抵抗意

¹¹⁶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124。

¹¹⁷ 同上註。

¹¹⁸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61。

¹¹⁹ 《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頁 220。

涵。

若放到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的架構下，以性欲為基地作為標誌自身價值的詮釋中，也可以佐證這種抵抗的寓意。在當時的時代語境中蘇聯的主流思潮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在這種思潮的文化邏輯下，人的肉體是受排斥的，一切與肉體有關的感官慾望，都是「自然主義」的，不是一點也不允許在文藝作品中出現，就是被革命的崇高理想所昇華。¹²⁰在文本中，也呼應了這種思潮。例如文中的青年地質學家瓦季姆（Вадим），就批判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的《巨人傳》（Gargantua and Pantagruel）通篇都是下流話，閱讀後白白浪費了時間，又說把話印在書上不是為了刺激情欲。春藥可以到藥房裡去買（《癌》，316），即為明證。因此「狂歡節」對性的強調，顯然是讓「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尷尬的策略。¹²¹此外，性也可以視為是一種離心的力量，它具有反叛的意涵。在狂歡化的詮釋當中，吃喝、排泄、交媾、強調肉體形象等，是狂歡節當中的活動核心，在這種對於低下行為的強調當中，蘊含著拉平雅俗、官民之一切階級的意義。至此，性意識成為個人抵抗的一種策源，一種確認自身價值，並據之對權力進行抵抗的根據。可以說，性成為一種自尊與自主的標誌，更是擴展生命疆域的原動力。對於科斯托格洛托夫這樣一位飽受規訓權力之苦的個體而言，性意識之於他的重要性自是非同小可。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當科斯托格洛托夫知道自己將被施以逆激素治療時，他的反應會是如此絕望：先是剝奪我的個人生活，現在還要剝奪我…這種傳種的權力。那我活著還有什麼用，誰還需要我？……豈不是廢物中的廢物！（《癌》，365）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經將本身的性欲視為是自尊的一部份，這甚至是他賴以生活的全部意義，否則就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與腦細胞活動的生命（《癌》，326），成為一具活動的標本（《癌》，326）。他不願意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只為了換回一具不再具有生機的軀體。

除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外，文本中另一個因為被除去性徵而消沉的顯著例子是金髮少女阿霞（Ася）。她是一個都市來的十七歲中學女生，原先

¹²⁰ 《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頁 272。

¹²¹ 同上註。

以為來到癌症病房只是三天例行性的檢查，但實情是她罹患乳癌，乳房最後遭到切除。

這個青春洋溢的女孩，她的調性自然不屬於這個死氣沉沉的癌症病房，作者特意描述她的青春魅力：她雖然也穿著洗得變成了灰色的病號長衫，卻像電影裡的人物：她那黃顏色的頭髮在現實生活裡是沒有的，況且這一頭黃髮還梳成一種顛巍巍的式樣（《癌》，140）。又說她，……即使她穿著病號長衫，也與眾不同，一下子就能認出來。她那黃色的髮朵一聳一聳地抖動（《癌》，140）。

還不知道自己乳癌病情嚴重性的她，是那麼地樂在生活、享受人生，她聽音樂，在想像中跳舞（《癌》，142）。她和女孩同儕們只要覺得悶得慌，就唱歌（《癌》，142）。她有著極為活躍的生命力，體力正在青春的巔峰，她盡力享受青春的態度，使得與她年齡相仿的罹癌少年焦姆卡感到自嘆不如，覺得在她面前，自己是個多麼無能的人。瞧，人家會為自己創造多麼輕鬆的生活氣氛（《癌》，142）！

她的青春魅力在作者的渲染下具有某種感染力，使得焦姆卡雖然感覺到自卑，卻不自覺地被她的活力所吸引。她對於生命的理解極為簡單，就是為了愛情而生活，我們這種年齡一切都是甜蜜的，還要等到什麼時候？除了愛情，生活中還會有甚麼？（《癌》，147）她有自覺地將自己的青春視為是一種反抗權威的武器。規訓權力無所不在，早已將監視的眼睛深入校園，檢查他們的思想。作為一個受到學校權威體制規訓的學生，對於在作文內容中強加威權意識給學生的老師，她十分稚嫩但卻理直氣壯地加以粗魯撻伐，這個女老師我們管她叫蛤蟆……這也不難理解，她是個老處女嘛，個人生活不如意，就把怨氣往我們身上出。她尤其不喜歡俏麗的女生（《癌》，146）。

她的話語雖然顯得淺碟單純，但卻透顯出一種生猛的力道，這主要表现在她的性魅力上，但是她的性魅力並不淫邪，反而透顯出一種正面的意義，若非那些來來去去的閒雜人等，那麼，哪怕是在此時此地，就在這個角落裡，在他們最美妙的青春期，她也準備幫助他了解人們賴以生存的是

什麼（《癌》，147）。更重要的是，阿霞身上所透顯出的正向的性魅力，具有療癒心靈的作用，讓焦姆卡從人盡可夫的母親所帶給他的不堪回憶中解脫，讓他第一次覺得無須愧對任何世人，一點也不骯髒，甚至超越出人間的一切醜惡範圍（《癌》，148）。仗恃著青春，阿霞彷彿可以與全世界對抗，而作者似乎也要強調她這樣富有對抗性的色彩。當她在說著這些難以見容於蘇聯世界的話語時，在他們身旁的史達林雕像反復被提及：鋪著紅布的那張桌子被史達林半身銅像占去了一半，那銅像的頭和肩頭都比普通人大些（《癌》，140）；以及女護理員，像一座雕像，還是那麼站在桌旁，與史達林並排，直著腰板往報紙上吐葵花子殼（《癌》，144）。像是一種嘲諷，一種對於威權的抗議。

因此，當她明白自己即將遭受切除右邊乳房的命運時，她的錐心哭喊、形容枯槁所為的，並非只是那些美麗的泳裝，或者從此與她過去多采多姿的生活一刀兩斷，而是她整個存活意義上的抽離——活著毫無意思，青春與性魅力所賦予她的那種充滿熱力的生命意義已經喪失，她找不到作為一個獨立的、在某種意義上之自由所賴以建立的根據。在手術前，作者安排了一個戲劇化的情節：阿霞找到了與她年齡相仿的焦姆卡，請他在自己的乳房消失前，做為最後一位見證者親吻它，像是一種回應，她曾經無意間清洗了焦姆卡對性的恥辱感，焦姆卡則為她生命力的逝去提供了救贖。在這裡，這個「奇寶」（чудо）被賦予了異樣的神采：這真是直接送到這裡來的一顆太陽，光芒四射！整個病房頓時燦爛輝煌！嫩紅色的乳頭（比焦姆卡想像的大些！）浮現在他眼前，眼睛簡直頂不住這嫩紅色的衝擊！（《癌》，443）

值得注意的是，似是作者刻意安排，為她主持操刀的，是徐娘半老的外科醫師葉夫根尼亞·烏斯季諾夫娜（Евгения Устиновна），她的背影看上去比她的面容年輕許多，經常有人看到她的背影稱呼她「姑娘」，但轉過來卻滿面是舒展不開的皺紋，眼窩下面浮現出小小的膿包，她經常塗鮮豔的口紅抵銷這種老相（《癌》，120），提到她的時候總不免強調她的倦容，以及她對工作的倦怠，在同手術刀打了三十五年交道的工作中，她已經習慣於人們的痛苦了，常常沒好聲好氣，常常疲憊不堪，〈…〉越來越看不到手術的獨特之點，更多看到的是它們那流水作業式的單調（《癌》，122）。

她曾說，要是把她所切除的乳房統統收集在一起，那就能堆起小山丘（《癌》，121）。與絕望的年輕阿霞相對照，淡漠而年華逝去的烏斯季諾夫娜更像是一視同仁的規訓權力之象徵，毫不留情且麻木地割除她所憑藉的生命力，故而小說寫道今天是奇寶，可明天就會被扔進垃圾堆裡（《癌》，434），相形之下顯得諷刺無比。

但在小說中，性欲並不是一個無往不利的存在。它是弱勢個體的生命策略，也是無處可躲的、受規訓的個體在面對無所不在的規訓權力下，一個確認自身存在的標誌與抵抗的憑藉。對於不負責任的縱欲，則是不被允許的。例如書中罹患舌癌的葉夫列姆·波杜耶夫（Ефрем Поддубев），他是一個行走蘇聯各地的工人，作為一個規訓者，他曾經在雪地裡役使飢寒交迫的集中營囚犯達成不人道的工程要求。在旅居蘇聯大地工作的過程中，他到處風流，誘人妻女，始亂終棄，在他心裡，她們每個人的面貌、習性和有關的經過，全都混淆在一起了（《癌》，114），在他看來，把一個娘們搞上手很容易，他內心裡從來沒把女人當做完全的人。（《癌》，115）他罹患的是舌癌，應驗了一位「短期」丈母娘詛咒他的，「哼，就該讓你爛掉舌頭！（《癌》，107）」由此可知，對於不是確認自身主體性、反而傷害他人的性欲，在小說中仍是受到譴責的。

最終，科斯托格洛托夫由於寄望於與薇拉能有共同幸福的歸宿，而認同薇拉對他的鼓勵，願意接受激素治療。獲得康復而得以出院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理應享有一段光明的新人生，但是，是什麼原因導致科斯托格洛托夫最後寧願捨棄薇拉對他的殷切期盼，而選擇逃離一切，獨自回到自己的流放地生活？這將在下一章進行分析。

第四章 《癌症病房》的異質空間探討

科斯托格洛托夫因為懷著與醫師薇拉共組家庭的希望而慨然接受激素治療，但是在做為男性尊嚴之象徵的性能力失去之後，其實已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理上產生了微妙的變化。他開始感受到自己某種下降的過程。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這種轉變，已是他到小說最後屈服、卑順之表現的前兆。這可以從個體與規訓權力的互動中加以解釋。個體與規訓權力的抵抗之來源，在於個體擁有元氣與原動力與權力進行抗衡，但有其侷限，亦即，「由權力運作施加的個體被削弱到無能」¹²²。在這種情況下，征服或削弱一個個體的不服從和自主的可能，就等於結束了權力關係。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例子當中可以看出，當他的個體自尊、主體性在被激素治療而喪失之後，他已經從本質上失去了抵抗的力量與基礎。他無法透過藉由性意識的自主與性權力的發動來確認自身存在的座標，也無從藉由性所標誌的生育功能來開創自己的未來，一種空茫的感受席捲了他的內心，使他所賴以生存的信念崩解了，因此最後他選擇逃遁，其反抗及反抗中所欲強調的個體性在此時幾已蕩然無存，所以逃遁到流放地就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但是主人翁的這種崩解，是在他可以出院之後的一天當中，於一個個空間的移轉中所逐漸產生的，這些空間，包括市集中的國營百貨商店、動物園、醫師薇拉的家。這些空間，在喻示科斯托格洛托夫內心情境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若拉長時間的縱深，則科斯托格洛托夫曾經流放一年的流放地，在反映其地位與心境上的意義亦相當重要，在本章節中，將以傅柯的異質空間理論，探討這些空間所具備的異質性，深入分析這些空間所具有的意義。

¹²² 史馬特著，蔡采秀譯，《傅柯》，頁 229。

第一節 流放地

在上一章當中，已初步借助異質空間理論，解釋癌症病房做為一個異質空間為抵抗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個抵抗的場域。但綜觀小說，文本當中所存在的異質空間尚不止此。從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信件與記憶，乃至出院後他的行蹤，還可以看到流放地、國營百貨商店、動物園、醫師薇拉的住所。若仔細觀照這些空間，可以發現當中存在一個脈絡，就是不同空間對於某一個空間具有一種對照性。這種對照性，用傅柯的詮釋，是異質空間「對於其它所有空間有一個功能」¹²³，它們具有兩種不同的極端：一、它們的角色，是創造一個幻想空間，以揭露所有的真實空間是更具幻覺的；二、與此相反，是創造一個不同的完美空間，以顯現我們的空間是有缺陷的，具有某種補償性的作用。文本中，不同的空間，皆具有這種對於另一個空間的對照性，或者具有某種意涵，在揭示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境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入院接受治療的過程當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曾不只一次提到他想從癌症病房逃出去，例如，在一開始他向護士卓亞商借醫學書籍時就提及，我說不定會設法逃出去，良藥有時也縮短人的壽命（《癌》，39）或者，他在寄給流放地的摯友卡德明（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Кадмин）的信中，亦提到，我非常後悔，當時沒堅決要求出院。在對我的治療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結束了，現在開始的只會有害（《癌》，322）。他在抵制治療的過程中，也多次向主治大夫東佐娃提到這樣的想法。如上一章所論述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醫療行為的抵制之動機，來自於他將醫療視作過往規訓的延伸，一種對於個體之規訓的權力操演，所以他處處多疑，對醫療行為挺身抵制。在這樣的思維之下，自然有一個能夠讓他逃遁的基地，這個基地，就是他在集中營服刑期滿之後被派往的地點——流放地烏什—捷列克。

必須注意的是，流放地烏什—捷列克反映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作為一

¹²³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07。

個抵抗之個體的心境轉折：它起先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積極維護個體自主性象徵的基地，但之後伴隨著主人翁在文本中的異質空間移動時產生的心境沉淪，流放地又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其意涵將在後文中將以探討。

流放地，顧名思義，其實是一種對個體的遠放，是對於刑滿的集中營囚犯的一種較為溫和的監禁，因此這類地點往往生活條件惡劣，如文本當中所提到的，流放地烏什—捷列克的環境：令人高興的事情不多。沒有自來水。熨斗得用木炭燒。點的是煤油燈。雨水到處泥濘不堪，地皮一乾就塵土飛揚。好的衣裳永遠沒有機會穿（《癌》，179）。又如同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自謂的，

……這裡在灌溉季節也會為爭水而舞動農具進行械鬥，有時還砍腳。〈…〉要往下扎根可不那麼容易，要讓莖部吸收養分也不那麼容易。還得左閃右閃，不讓監督處把你打發到一百五十公里的沙漠腹地裡去。還得找一個茅屋棲身，付點錢給女房東，可實際上找不出什麼東西來支付（《癌》，290）。

由上文的描述不難得知，在流放地的生活無疑是艱困的，身處其中，個人的身分依舊是犯人，而且他們並沒有自由移動在祖國大地的權利，既然如此，科斯托格洛托夫為何依舊對流放地充滿眷念？這顯然是一種空間對照下的結果，是一種由比較所得的美好。換言之，流放地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心中，之於集中營和癌症病房，是一個對照性的存在，是一個「不同的完美空間，以顯現我們的空間是有缺陷的」之空間。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對照了集中營的境遇之後，而對流放地產生認同，產生一種歸屬感。

我們先從科斯托格洛托夫確定徙移至流放地的那天回溯。那並不是一個完全獲得自由的日子，而不過是取得流放犯之半自由身分的第一天，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內心已感到欣喜若狂，而把流放地這個地方比擬為家鄉，他對於聽到允許自由行動這一天所發生的事，記憶猶新，儘管他仍受到監督處的監視，不能夠進到村子去，但對於自己被允許能夠自由地睡到乾草棚下方，而不是睡在營房之中，仍感到異常歡悅，他在院子當中踱來

踱去，興奮得睡不著，似乎明天不是要去一個不毛之地的村子，而是要進一個凱歌高奏的廣闊世界（《癌》，289）。對於一個久經囚禁的流放犯科斯托格洛托夫而言，這種「半自由」，是一種久旱逢甘霖的狂喜。

對他來說，流放地是美好的應許之地。因為身為一個集中營的犯人，科斯托格洛托夫曾經感受到多次被假釋的美夢幻滅，幾度失望乃至絕望之後，他轉而對流放地有著難以言喻的情感，

嘗夠了幻想破滅的滋味，做夠了獲釋回家的美夢，最後，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愛的烏什—捷列克！是的，那是他心愛的地方！……正是從這醫院裡，從這個大城市，從這個奧列格覺得適應不了、而且恐怕永遠也不想去適應的結構複雜的世界，遙想他那一角流放之地，著實感到十分親切（《癌》，288）。

流放地對於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意義，首先來自他在其中找到身分認同。如文本中所述，集中營犯人都被宣判永久剝奪自由之身，他們不能自由移動，同時身為囚犯的身分亦使他們終身都倍感屈辱，處處受人歧視，因為對於這些領到帶有「第 39 條汗點身分證」的人們而言，生活就是不停的奔波，設法安身，尋找工作處處碰壁，並且時時生活在對於任何一個細節都必須關照的緊張狀態裡，但是來到流放地，一切都變得不同，囚犯反而覺得名正言順，因為不是他心血來潮要到這裡，所以誰也不能把他趕走！當局已為他做了安排，他已不再擔心會失去某個好位置，不再為謀求更好的待遇而忙碌（《癌》，291）。他知道，他只有這唯一的一條路可走，這使得他精神振奮，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自謂，……流放地不是只有使人心情壓抑的一面——這一點即使根據文學作品，人人也會知道……，而且還有使人感到解脫的一面——從懷疑中、從對自己負責的約束中解脫出來（《癌》，291）。

流放地對於科斯托格洛托夫而言的另一層重要意義，就是他與身處其中的難友，那一份相濡以沫的患難情感，這種情感讓他對於這個地方產生了深層的歸屬認同。在寫給卡德明夫婦的信件當中，他以「流入沙漠的河」（река, впадающая в пески），來比喻流放地難友間那種患難與共的真情，

我們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這條河在沙漠中結束生命！一條河，不匯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動力就那麼一路分送給萍水相逢的朋友們——這豈不是我們囚犯生活的寫照！我們注定什麼也幹不成，注定只能背著惡名從這個世界悄然消失，但我們所有最好的東西，猶如我們還沒有乾涸的一片水面，我們所留下的全部紀念就是通過見面、交談、幫助這類方式互相捧給對方一掬水（《癌》，325）。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與難友所建立的真情當中，構築了他在心靈上的支柱，使他在流放地當中有所歸屬，流放地對他來說成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此外，對於動物發自內心的喜愛，也構成流放地對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心靈上的撫慰作用。文本當中，作者以數頁的篇幅敘述科斯托格洛托夫與卡德明夫婦所畜養的兩隻家犬——茹克（Жук）、托比克（Тобик）相處的點滴，文本中寫道：我們現在把人們喜歡動物看得一文不值，甚至別人愛貓也必然遭到我們取笑。但我們一開始討厭動物，以後會不會必然發展到對人也討厭呢？（《癌》，299）綜觀文本，在索忍尼辛的寫作手法上，他常以動物，特別是狗的出現，來象徵安適恬靜的環境與心境。因此，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回想起這兩隻家犬時，甚至對於生命升起了滿足的意念：深深為之感動的奧列格，對自己的命運十分滿意，對於自己被流放也完全認了命，他只求上天賜給他健康，並不祈求更多的奇蹟（《癌》，302）。綜上所述，就可以明白，流放地何以對科斯托格洛托夫如此重要，因為這是他在癌症病房中接受治療時的心靈寄託與脫遁的目的地。

異質空間本身，具有一種逃脫的意涵。這是一種從封閉空間的逃脫，也是對於章法、法律之桎梏的逃脫；相對而言，流放地較為蠻荒，人為矯飾不多，個體在其中可以獲得一種大自然的滋養。作為一個現實中的理想之地，流放地正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在集中營對照下，流放地的一切都可以一笑置之，就連本該受到諷刺作家鞭撻的事情，在奧列格看來也不過是笑料而已（《癌》，293），科斯托格洛托夫又自謂，在集中營裡待過之後，這裡的什麼事情不像笑話？什麼事情不使你覺得像休息？（《癌》，294）順

著這樣的思維，將醫院視為是規訓權力之延伸的主人翁，也就將醫院視為是暫時的、不能久留的地方，甚至不惜冒著無法痊癒的風險也必須逃脫的所在：那個平淡無奇的世界對他來說是更為可貴的，因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他自己的，永遠是他自己的世界，而這裡卻是臨時的、暫住的（《癌》，292）。這個地方成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心靈的原鄉，甚至已經取代了故土在他心目中的意義，於是，他這個「同俄羅斯小片叢林、小塊田地，在感情上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俄羅斯人」（《癌》，292），反倒對流放地感到深刻的眷戀，甚至愛上它的缺陷，把無風的陰天當作休息日，雨天則視若過節，而且對老死在這裡似乎也俯首聽命（《癌》，292）。對他來說，俄羅斯反倒成了「域外」，流放地取代了俄羅斯大地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心中的原初意涵，成為一個他在心靈上得到寄託的空間。

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做為一個不願被馴服的個體時，流放地是具有正面意義的。他是主角進行抵抗的一個依靠，一個依據，給予他心靈上的支持，讓他在對規訓進行抵制的時候，知道自己有一個地點可以停靠，有一個目的地可以逃遁。換言之，對於在醫院進行治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來說，流放地具有一種積極的正面意涵，支持他確認自身的自主性，並據以對於規訓權力的種種手段進行質疑甚至抵制。但是，當他在歷經出院後第一天的若干地點，而在心境當中產生一種失重與淪落的感受之後，此時流放地之於他的意義，已不是一種積極的支持，而是消極的逃避地點。

第二節 國營百貨商店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得到出院許可這個期間的心情是非常光明的。但是，獲得出院許可後在外行走的這一天當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所經過的場域，卻對他的心境產生非常大的衝擊，他對自己產生棄絕的心態，對於自我的美好想像產生破滅，他不再視自己為一個勇於衝撞、勇敢開創的個體；在這些空間流轉的歷程，最後導致他放棄在癌症病房所在的城市停留，甚至寧願放棄與薇拉進一步發展家庭的可能，落魄而倉皇地回到流放地烏什—捷列克。可以說，這些空間對於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境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筆者發現，這些空間對於現實空間都具有某一種功能，具有某一種對照的作用；它們映照出現實，也映照出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內心，符合傅柯對於異質空間的敘述，適合放在異質空間的理論架構下加以審視。在下文中，筆者將順著情節發展的脈絡，分析這些空間。首先是大街上和國營百貨商店。

從文本中我們得知，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出院的第一天，他的內心是興奮且充滿期待的。這是他對於長久以來施加在身上之桎梏的首次掙脫，是他首度掙脫軍隊、集中營、醫院之規訓的第一天：

……上士科斯托格洛托夫，或者說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按照人們對他的要求，服滿了兵役期和刑期，又被疾病驅使而吃盡了苦頭，已經在一月份死去了。而現在，從醫院裡踉踉蹌蹌走出來的是某個新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不過，不是走出來去度過完整的一生，而是去度過生命的一個零頭（《癌》，531）。

雖然這是一個殘缺的餘生，但對於主角來說，一切依然是充滿光明，仍是值得慶賀的，所以文本以「創世的第一天」（первый день творения）（《癌》，526）來詮釋這樣的日子，這天的早晨格外具有意義，這是創世日

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創造，僅僅是為了迎接奧列格歸來：往前走吧！活下去！（《癌》，527）對於科斯托格洛托夫而言，離開病院大門，無異於走出牢門；正是帶著漸漸痊癒的身體，科斯托格洛托夫才真正感受到自己是自由之身，是一個自由的個人，一切對他來說都是新鮮、充滿光明與希望的。

但是在這樣的光明之晨當中，卻也帶有某種不安的色調，例如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時仍會想起自己已經失去性功能的事實，他看到沒有婦女涉足其中的茶館，想著：男人們聚在一起，是不是想藉此表明，他們生活的主要部分無須女人參與？（《癌》，531），又如，他在經過照相館的時候，久久地端詳櫥窗裡那些年輕姑娘的照片，為了補償逝去的歲月，為了補償他所不能活著看到的一切，也為了補償如今他被剝奪的一切。（《癌》，537）可以說，他對於自己已失去性功能的事實充滿疑慮，這件事造成他的陰影，對他在這個出院後的第一天、乃至他的餘生都投下了變數。此外，在行筆間，作者也將科斯托格洛托夫與世界的格格不入預設了伏筆，他為賣報的婦人是否會被民警驅趕而憂心，但對自己形於外的突兀卻渾然不覺，作者寫道：他沒有照見自己，忘記自己是什麼模樣了。要是民警將他們兩人審視一番，那就必定會先檢查他的證件，而不是先檢查那個賣報婦人的（《癌》，536）。帶有一種深沉的悲哀與預言式的色彩；行人誰也沒有因看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而高興，可是他看到所有的人都感到高興（《癌》，536），似已預告科斯托格洛托夫之後的落差與沉淪。

這個嶄新的世界中，一切對科斯托格洛托夫來說都是新奇的：經過藥房的時候，他帶著「怯生生的野人似的目光」（《癌》，537），端詳著各種鍍鎳的、玻璃的和塑料的藥盒、藥瓶，僅僅一個藥局，就給奧列格打開了一個可供觀察與思考的大千世界（《癌》，537）。可悲的是，適足以剝奪他性能力的人工雌酚，其價格高昂，能夠讓科斯托格洛托夫過上一個月，主角往後能否自費購買這種藥物繼續治療，成為一個大問題，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此渾然不察，沉浸在創世喜悅之中的他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

他對傳真電報這個在入獄前還屬幻想小說情節的事物，卻能落實在真實生活中，產生了莫名的新奇感受。在文本中間或出現的「今天，還會有

許多值得高興的事情等待著他」(《癌》，538、539)如同一個制式的提醒般，催促著科斯托格洛托夫移往下一個地點，接受更多的新奇，但也隱隱含著不安。

對於主人翁這樣一個久經規訓的囚犯來說，這「創世的第一天」當中的嶄新世界似乎不屬於他。它的一切終將衝擊科斯洛格洛托夫，使他感受到與這個世界深深的不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第一次衝擊，來自他順著人群，魚貫進入國營百貨商店時，被一個男人一句再平常不過的詢問所震懾，男人向店員詢問像這種五十號的襯衫你們有三十七號領口的嗎？(《癌》，541)這句話讓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不平與震驚，受震驚的程度宛如被別人用銼刀從左右兩旁銼了一下(《癌》，541)。對照自己的境遇，曾身為一個囚犯與軍人的他不解，為什麼有人的屍體在戰壕裡發臭，有人被隨便埋入北極凍土之中，或者被投入集中營當中勞苦受罪，但何以這個面容白淨、穿著體面的男士能夠這樣詢問衣服的尺碼，而奧烈格自己對於承載這個衣服的世界卻一無所知，甚至感到極為陌生。受到衝擊的他，感受到一種深深的絕望：

就是這所謂的領口尺碼把奧列格徹底擊潰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領子還有單獨的尺碼！……竟還有這種尺碼！為什麼要有這麼講究的生活？返回這樣的生活中去又是為了什麼？如果要記住領口的尺碼，那就得忘掉別的東西！那可能是更重要的東西！(《癌》，542)

在一連串的規訓空間當中，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經失去了對真實世界那種脈動的感受，這自然是規訓權力所積極擘畫的目的：它要將個體完全納入自己的監視體制之下，消除個體的個性，以滿足自己得以對其進行施展的意圖。長期受到規訓的結果，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經失去了在人群當中的座標。這個傾向，特別是在他對鏡自照時，顯得尤為明顯。

長期生活在規訓空間之中，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自己的外型沒有自覺，事實上，他甚至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攬鏡自照，……這樣的大鏡子在整個烏什—捷列克也找不到。況且，他已有十年的光景沒有在這樣的鏡子裡見過自己(《癌》，543)。一照鏡子之後，他感到十分意外；完全沒有想

到自己竟會變成這副模樣，

他自以為是個軍人的樣子，哪知已沒有一點軍人的氣概了。只有這件大衣和這雙靴子還有那麼一點士兵大衣和靴子的影子。……而不戴帽子，不束皮帶，他實在不像一個士兵，倒是像一個逃亡的囚犯或到城裡來買東西的鄉下人。而至少要有一股子剽悍勁兒，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看上去懶懶散散，邋邋遢遢，且疲憊不堪（《癌》，543）。

這樣的外型，與他的設想產生了巨大的落差，他原以為自己是一個強悍、有氣概的軍人，對於任何困難都可以衝撞並且克服，如同自己的想像一樣。憑藉著對自我良好的感覺，他產生一種無畏的自信，讓他對規訓權力挑戰，對自身產生自覺，並且深深相信自己可以支持下去，甚至支持一個家庭的重荷。

但在這裡，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身處的異質空間——國營百貨商場，被具象、集中到一面鏡子之上，如傅柯所說，異質空間「可作為一面鏡子，〈…〉在此鏡面中，我看到了不存在於其中的自我，處在那打開表層的、不真實的虛像空間中；我就在那，那兒卻又非我之所在。」¹²⁴最重要的是，傅柯指出，「從這個凝視起，就如它朝我而來，從一個虛像空間的狀態，亦即從鏡面之彼端，我因之回到自我本身；我再度地凝視我自己，並且在我所在之處重構自我。」¹²⁵國營百貨商場的這面鏡子，是科斯托格洛托夫角色歷程建構當中的關鍵場景，從一個被軍隊、集中營規訓，乃至進入醫院醫療繼而反抗的過程中，科斯托格洛托夫都從未「看到」過真正的自己：他的自己是想像的、虛幻的，是自我建構的，他在自我的想像中建構了自身的主體，並且想像出自我的形象，是強悍、不屈服的靈魂，這個認知讓他得以武裝自我，去對抗規訓權力對他所施行的操演與對待。

直到他看到了這一面鏡子，才發現這一切強悍的形象，只不過出自他自己的想像，實際上的他其實是孱弱、邋遢、虛弱而狼狽的，他的自尊在此處再次受到了深刻的撕裂，在與那位買襯衫的體面男士偶遇之後，他所

¹²⁴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03。

¹²⁵ 同上註。

積極構築的自我世界與外在世界再度產生落差。作為一個映照個體內心、但具有消極力量的異質空間——國營百貨商店，具體地呈現在一面鏡子當中，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心中的落差一覽無遺。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想道，

他還是不看自己的好。在沒看到自己的模樣之前，他還以為自己像個勇猛的戰士，瞧行人居高臨下，看女人也平起平坐。可現在，背著這個相當寒酸的、早已不是士兵所用而更像討飯袋的行李袋，他要是在街頭上伸出手，肯定有人丟錢給他（《癌》，543）。

這個差距直接影響他生出一種自卑的心理，他不知道如何面對薇拉；看到女人的禮品，他也感到頭暈目眩，他不知道怎樣的禮物送給薇拉才合宜，甚至產生一種空茫的感受：

這個世界的全部複雜性似乎都凝集在他的眼前：又得了解女人的時尚，又得擅於選購女人的飾物，得使自己在鏡子面前看上去體面，還得要記住自己領子的尺碼……而薇拉正是生活在這個世界裡，這一切她都知道，並且自我感覺良好（《癌》，544）。

用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話講，國營百貨商店這座「可詛咒」的「市場偶像的神廟」，將他與薇拉之間劃上了一道深刻的鴻溝，

他感受到一種困窘和沮喪的情緒。如果要到薇拉那裡去的話，那麼現在就是時候，此刻就得去！

可是他不能。他失去了那股衝動的激情。他害怕了。

是百貨商店將他們分隔開來（《癌》，545）。

究其原因，百貨商店是促成他這種淪落的觸媒，但不容否認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之前在規訓空間中度過的漫長生涯，直接導致了他與外界的隔絕，致使他與現實的世界脫節；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規訓空間在不知不覺當中將他的自尊下降到一個馴化的層次，這樣的心理轉折，在下一個空間——動物園當中反應得特別明顯。

第三節 動物園

在國營百貨商店歷經心靈的沉重打擊之後，科斯托格洛托夫開始感到對於真實世界的疏離之感，早晨出發時那種清新的感受已漸漸遠離。他感受到的，不再是那有如創世般充滿光明的早晨，反倒是在真實世界中的挫折，有如擊木遊戲中的木棒，驚扭的感覺接二連三地將他擊倒。但此時，他並沒有放棄希望，他冀求能在動物園當中得到內心的平靜，抓取一些平衡的感覺，如他自謂：似乎還是動物世界更容易理解，更接近於自己的程度（《癌》，545）。如前文所提及，在作者的寫作手法當中，動物的出現常象徵著內心的安適，科斯托格洛托夫渴望從動物園當中得到這種安慰與共鳴。儘管這個經驗，最後是將科斯托格洛托夫推向另一個淪落的谷底。

如同傅柯對於異質空間的評述，異質空間「可在一單獨地點中，並列數個彼此矛盾的空間和基地。」¹²⁶動物園當中不同動物，依據不同的劃分坐落其中，在當中，肉食動物、草食動物、爬蟲動物，相同棲地的、不同棲地的生物，因為人為的力量，得以聚集在同一個空間當中，成為一個具有異質性質的所在。在傅柯看來，動物園承繼了古代花園的傳統，這個傳統所標誌的，是「世界的最小包裹，並且它也是世界的整體性。從古代起，花園就是一種快樂的、普同化的差異地點。」¹²⁷文本當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所進入的這個動物園，在他的想像中應是一個和平、靜謐的地點，是他亟欲療癒內心創痛的所在，這是他想像中的愉悅的「異質空間」；但實際上，這個異質空間卻成為了真實世界的反映，是傅柯口中的「世界的最小包裹」，呈現出科斯托格洛托夫所不願面對的苦澀的痛苦回憶，主人翁在這裡不但沒有找到期望中的平靜，反而進一步追認自己過往被規訓的慘痛回憶，在這裡，動物園再次成為一個顯現出真實空間之「污穢、病態、混亂」的異質空間。

¹²⁶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05。

¹²⁷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06。

文本當中，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斷以動物園中的動物意象，與自己的集中營經歷進行對照。他先是看到入口處的捻角山羊，這隻捻角山羊的圖像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它一動不動的姿態：那山羊站在那裡已經很久了，酷似一座雕像，成為這岩壁的延伸部分；風一絲也沒有，它的長毛也不飄動，簡直無法證明它是活的山羊而並非是逼真的藝術品（《癌》，546）。對於它的神態，科斯托格洛托夫流露出欽佩的心情，他認為，具備這樣的性格也就能經得起人生的磨難！（《癌》，546）他在這樣一隻文風不動的捻角山羊身上找到認同，認為只有這樣堅忍不拔的性格，才能在困厄的世界，特別是集中營的艱苦世界中生存，他在捻角山羊處得到了安慰，認同自己從集中營歲月中苦熬存活的堅毅不拔。

但是一轉頭，拐到另一條小徑上時，他看到一隻松鼠落在一個轆轤裡，不停地奔跑，但卻是留在原地。他想起了那句俄國諺語——「松鼠落在轆轤裡」（Как белка в колесе），¹²⁸他想，松鼠起先或許是出於好奇，於是便輕輕踩踏了這個轆轤，卻不知道自己正陷入了一個非常殘酷、會越陷越深的設施之中；松鼠把所有的力氣都使上了，大概直到心臟破裂才會停下，但是，顯然地，它一級階梯也沒有爬上，也沒有任何距離上的前進。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松鼠會自己停下這個轆轤，迎向它的結局，就是死亡。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看到這個結果便走開了。小說寫道，這樣，本地的動物園以兩個意味深長的例子——入口處兩邊可能性相等的兩種生命線，迎接自己的一些大小遊覽者（《癌》，547）。可以說，這兩種動物一靜一動的意象，都是人在面對不可避免的困厄時可能採取的應對反應，也反映出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久經磨難後的部分心境。

但是接下去，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境，沒有隨著觀看動物而轉好，相反，益發沉重起來。禽類動物的斑斕色彩安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視覺，他將這些繽紛的顏色與集中營相互對照，經過顏色單調的流放地和醫院生活之後，奧列格的眼睛飽覽了絢麗的色彩（《癌》，547）。但禽類的處境在他心中激起了不舒服的感覺，當他看到坐山雕的時候，那神氣讓科斯托格洛托夫甚至以為它們是老鷹，但它們被安置在最高的地方，然而籠頂與岩

¹²⁸ 此俄國諺語原指「人像松鼠蹬輪似地忙得團團轉、不亦樂乎」，此處則為主人翁聯想下的引伸義——筆者注。

石之間的空間很低，以致這些陰鬱的大鳥痛苦難當，它們頻頻展開翅膀拍打，卻沒有地方可飛（《癌》，548）。它們不自由的處境甚至讓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了自己，望著坐山雕那難受的情狀，奧列格也聳動了一下肩骨，舒展舒展身體。（莫不是由於熨斗壓得直不起腰？）（《癌》，548）答案不言可喻，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對它們不自在的身形產生了同感。

這些動物普遍的不自由深深觸動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籠子上的說明寫著：白鷄很討厭囚居。「道裡倒是明明白白！可還是把它們關起來！」（《癌》，548）它們不自由的狀態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了自己過去的境遇，另一處的說明寫著：「箭豬喜歡夜間活動。」對此我們也不陌生：晚上九點半把人叫去，到早晨四點鐘才放回來。不只是作息上讓他從動物聯想到集中營的囚犯，甚至連形象上亦產生連結：「獾居住在複雜的深穴裡。」嗯，這倒是跟我們的方式差不多！好極了，獾啊，否則有什麼辦法呢？他的嘴臉也是條紋布樣式的，跟苦役犯一個模樣（《癌》，548）。動物園裡的動物沒有給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安慰，相反地，讓他想起過往的集中營歲月，他甚至後悔來到這個地方：對這裡的一切，奧列格都理解其反義，大概不該到這個地方來，就像不該去百貨商店一樣（《癌》，548）。

就是看到了棕熊，也同樣引發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集中營的聯想，他看著在籠中踱步的棕熊，它總是在籠裡跺足，焦躁不安，似乎想在籠內走走，可是只能轉來轉去，因為籠壁之內的距離還不到它三倍的身長（《癌》，548）。這讓他想到集中營當中的隔離室，按熊的尺度來衡量，這不是囚籠，而是隔離室（《癌》，548）。當他看到了猴子的時候，那種同病相憐的意念特別明顯，

猴子的腦袋上談不上甚麼髮型，彷彿個個都推成了平頭。它們神情抑鬱，在板鋪上回憶往昔的悲哀，那模樣使他不禁想起過去的許多熟人，有幾隻甚至讓他聯想到今天還關在什麼地方的人（《癌》，549）。

在某一隻猴子身上，他彷彿看到了癌症病房中的病友舒盧賓，

在一隻孤獨、眼睛浮腫、兩臂垂在兩膝之間陷入沉思的黑猩猩身

上，奧列格似乎看到了舒盧賓的形象——舒盧賓的姿勢常常是這樣（《癌》，549）。

動物受到較好的待遇，甚至引起他不平的感受。例如當他聽聞肉食動物美洲豹每個月要吃一百四十公斤的肉時，他憤恨不平地認為肉食動物是囚徒，它們苦於沒有自由，但是奧列格把它們看作是集中營裡的刑事犯（《癌》，551）。它們是有罪的，因為這樣的肉從來不往集中營裡運，往那裡運的是點肉皮和下水，而且，一個小隊一個月只有一千克（《癌》，551）。集中營裡的人們甚至得扣下馬料才得以存活，這種荒誕的對比讓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無比不平。他甚至在老虎的黃眼睛裡想到一位老政治犯獄友告訴他，那壓迫者¹²⁹的眼睛，不是黑絲絨般的眼睛，而是不折不扣的黃眼睛！（《癌》，551）這種聯想讓主人翁產生了極端的恨意，他甚至懷著滿腔的仇恨望著老虎。

動物園當中的一切，都逼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去面對那不堪的過去，透過他聯想中的意象，集中營的囚犯——包括他自己——都是宛若動物般低下的存在，作者甚至透過科斯托格洛托夫與動物園的對比，呈現他這宛如動物般被馴化的精神體，同時透過第三者的目光，觀看這個「觀看著動物的動物」科斯托格洛托夫，作者寫道，奧列格沒有覺察到孩子們在怎樣仔細地觀察他。其實，他在這裡就是一隻免費展出的動物，只不過自己看不見自己罷了（《癌》，549）。透過將科斯托格洛托夫與這個空間的對照，把讀者的視角從主人翁眼中的動物園抽離，來關照這個在動物園當中行走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再一次凸顯他在現實世界中的格格不入。甚至，科斯托格洛托夫古怪的形象已經與他的心境趨向一致，

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是這樣荒誕地思考著問題。他的頭腦已經被如此扭曲，以致什麼都不能按本來面目和不帶成見地接受下來。現在，他在生活中不論看到什麼，眼前總會浮現灰色的幽靈，耳邊總會響起地府的喻鳴（《癌》，549）。

¹²⁹ 此處暗指史達林。

空間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回憶、在他所處的當下之中流轉，反映了他的際遇，逼著他逼視這個他已感到陌生的真實世界，但也明確地透過隱喻，暗示科斯托格洛托夫已被宛如動物般馴化的事實。文本中他思辨著，

在囚禁野獸的問題上，最錯綜複雜的情況是：即使奧列格站在它們一邊，比方說，他有權力，也仍然不能著手拆毀籠欄放它們出來。因為它們在失去家園的同時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倘若突然把它們放出來，那就只會更可怕（《癌》，549）。

這段話同樣也適用於科斯托格洛托夫本身。可悲的是，那規訓著他的集中營，同樣也是他亟欲掙脫的牢籠，但是與動物園中的動物命運相似，在逃脫了牢籠、在有自由的可能性出現以後，他所面對的問題，不只是對於現實世界的不適應；問題的根源，在於他已被馴化成不具有「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之個體，他渴望反抗的意圖終究是徒勞一場。在動物園這樣一個空間當中，映照出主人翁集中營歲月的過往，他重溫了那段歲月的不堪、痛苦和憤怒，但這裡卻沒有帶給他所期待的安謐，反倒是進一步加深與強化他被規訓權力所馴化的事實——他的抵抗意志與對於自身主體性的堅持已悄悄瓦解，他從國營百貨商店逃脫到動物園，再從動物園逃脫到令他感到近鄉情怯的薇拉家，每一次空間的移動都更加深了自己的悲劇色彩。

第四節 薇拉的住所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城中行走一天，他的最終目的地是要來到醫師薇拉的住所的。薇拉醫師對他提出可以住在自己家中的邀請，她的態度雖然含蓄，但不難看出她對科斯托格洛托夫具有好感。在這出院的第一天，科斯托格洛托夫從初出院時的充滿期待，到路途當中發生的波折，使他幾乎對自己絕望，在動物園幾近崩潰的他，因為一隻羚羊宛如薇拉的雙目而驚覺應該趕緊奔赴薇拉家，畢竟薇拉是他希望之所繫，薇拉——Bepa 正是希望的意思，可以說，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出於對薇拉的情意，而決定接受一切治療，甚至包括會讓他喪失性能力的激素治療的。

帶著在國營百貨商店乃至在動物園的遭遇所受到的挫折，科斯托格洛托夫渴望在薇拉這裡得到彌平，他把自己比喻成一條狗，想像著，要是能像一條挨了打的可憐巴巴的狗那樣去躺在她的腳下，〈…〉這也許是可能設想的一切幸福中最大的幸福（《癌》，553）。懷著這樣最後期待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來到了薇拉的住所，在敘述他的心境時，這樣寫道：離她的家越近，他的神經就越緊張。這是不折不扣的恐懼！然而這種恐懼又使人感到幸福，又使人高興得要死。單憑這種恐懼，他此刻就有一種幸福之感！（《癌》，554）

這樣既恐懼又複雜的心理，來自科斯托格洛托夫漫長的受苦歷程，

他兩條腿拖著沉重的靴子從動物園走來所經過的不只是這個街區！他走的是祖國大地的漫長道路，走了兩個七年！而現在，終於復員了，來到了這扇門前，那裡一個女人默默等了他十四年（《癌》，556）。

可以說，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來到薇拉家的這次造訪，看得無比重要，他把與薇拉的關係，視為是他這漫長苦厄的救贖。薇拉可以視為是他這一段新生命的起點與關鍵。

薇拉的住所，是一處合住公房，文本中描述，經過這處合住公房時，必須先穿過一個院子，在這裡，一條公共的水泥長廊，有頂無牆，欄杆下面的斜柵欄是用樹枝編的。欄杆上曬晾著一些被子、褥墊、枕頭，拉在柱間的一根根繩子上還晾著床單和內衣（《癌》，556）。穿過這些曬著床單和衣物的繩子後方，就是薇拉居住的合住公房的外門，裡面三四戶當中有一戶就是薇拉的住處。

傅柯在論述異質空間理論時指出，異質空間通常預設一個開關系統，以隔離或使它變成可以進入，他進一步提到，「一般來說，異質空間並不像公共地點般可自由進入。」為了進入，「我們必須要有一定的許可，並做出某種姿態。」¹³⁰薇拉的住所就符合這樣的異質特性，它並非那麼容易可以進入，必須要經過某種默許才能遂行，同時，它具備了一個開關系統。在筆者看來，這個開關系統除了合住公房外那道有形的外門之外，也包括院落當中那些曬著的衣物和棉被。那些棉被，在科斯托格洛托夫與一位鄰居女人交涉的過程當中，被極度不安且驚慌的主人翁幻想為碉堡，意外形成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心靈上的阻礙，阻絕了他與薇拉進一步發展的意志。

懷著滿心期待來到這個地點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合住公房的外門處遇見了這位女鄰居，但這位女鄰居將他認定為一個小偷，於是對答當中都不懷好意，直推說薇拉不在家，甚至連代為敲門詢問也不肯就急著打發他離開。面臨這種處境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本可從容地等候抑或是留話，不必直接選擇離開。但是才剛剛從真實世界的驚愕餘波當中遁走，仍有如驚弓之鳥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卻在心理的武裝上完全潰敗，在這裡，女人、一位小夥子的紅色摩托車，還有前文述及的曬著的棉被衣物，在科斯托格洛托夫脆弱的意念中，化為具有軍事意象的符號：女人成了敵軍，紅色摩托車成為機槍，而曬著的棉被衣物則是成為了碉堡。首先，女人衝著科斯托格洛托夫走過來，迫使他後退讓路（《癌》，557）。在讓女人看到自己手上準備送給薇拉的紫羅蘭之後，科斯托格洛托夫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求愛者、一個前來送禮物的人、一個癡情的傻瓜（《癌》，557），這種思想上的軟弱，讓他開始產生退卻之心，於是，在這個面頰有點歪斜的女人的進

¹³⁰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06。

逼下，他退到了長廊上（《癌》，558）。作者繼續使用軍事語言，而對方不僅把他從進攻基地趕走，還跟蹤觀察：這個流浪漢的背袋裡有什麼東西直往外頂，可不能讓他從這裡順手牽羊撈走了什麼（《癌》，558）。不遠處，年輕小夥子發動的摩托車也擾亂著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意志，像機槍向此處射擊，

不帶消音器的摩托車，在院子裡肆無忌憚地發出開槍似的啪啪聲，有時忽然中止，隨後又響起來，接著又停止了。

奧列格不知所措（《癌》，558）。

科斯托格洛托夫漸漸露出了敗退的跡象，連他那縮進軍大衣的手，都讓他像是負傷的士兵，就像手被砍去了似的（《癌》，558）。面對女人步步進逼的詰問，科斯托格洛托夫卻看到這些床上用品所形成的龐大碉堡，奧列格怎麼也想不出對策（《癌》，558）。於是，奧列格從枕頭碉堡那兒後退——從來時的原路被攆得退了下去（《癌》，558）。這些枕頭「碉堡」，之所以構成主人翁心靈上的阻礙，主要是因為它們都提醒他男女間的床第之事，他幻想起薇拉日後曬著衣物的情景，意識到他跟薇拉之間終究必須在一張床褥上共度許多時光，就算你出淤泥而不染，就算你崇高純潔，但夜晚那不可避開的八小時你能躲到哪裡去呢？（《癌》，560）醫院規訓的殘跡——使他失去性能力的事實，讓他在這一點上無法突破，只要看到床單，就總會提醒他自己已經失去性能力的現實，彷彿一種真理制約著他：

然而，枕頭、褥墊、帶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幟似地晾在繩子上的床單，似乎都標誌著一個穩定的、世世代代檢驗過的經驗，此刻要將這種經驗推翻，他是無能為力的。他也沒有權力這麼做（《癌》，559）。

這一道無法跨越的障礙，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即使薇拉回來，他依舊無法跨越這個曬衣服的地方，因為碉堡不會放過他們倆，絕不會讓他們在一起（《癌》，559）。於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徹底潰敗，奧列格離開那個他自知無力攻克的要塞，背著沉甸甸的熨斗，縮著被砍去了似的手，踉蹌蹌地走出大門，枕頭碉堡則得意地對他的背影射擊（《癌》，559）。

在文本裡，軍事語言充斥在科斯托格洛托夫拜訪薇拉住所的這個場域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主人翁對於性能力的喪失這一醫院規訓的痕跡，在軍事語言的渲染下，成為摧毀他內心堡壘的致命一擊。這可以借用榮格的心靈能量觀點加以闡釋：在榮格的詮釋中，里比多（libido）是人的性衝動與性欲望，其「倒退」（regression）與「前進」（progression）決定人的心靈能量的積極抑或消極。「在里比多前進的時候，個人心靈內的極體彼此平衡，並產生向前運動的能量。當心靈的極體分裂時，一種嚴重的無所適從情緒隨之發展，並使當事人為之癱瘓。」¹³¹

從文本不難看出，軍隊規訓同樣深植在他的記憶當中，戰爭的恐怖在他與本能抗衡的對抗上，有如幽靈一般出現在他的思維中，透過空間中的符號隱喻，形塑出他無法逆轉的失敗情緒。傅柯論述的空間異質性當中的「阻隔性」，將科斯托格洛托夫阻絕在與薇拉充滿無限可能之未來的彼岸，他甚至未經嘗試就決定投降。延續科斯托格洛托夫在歷經國營百貨商店以及動物園所受到的內心衝擊，薇拉的住所可以說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最後的堡壘，薇拉所代表的希望意涵，亦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展開新生的盼望所在，但是在軍事語言之空間隱喻下，至此，科斯托格洛托夫作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個體所具有的種種精神力道，已然全盤瓦解。

¹³¹ 穆瑞·史坦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立緒，1999。

第五章 結論

壹、《癌症病房》當中可以看到規訓權力以醫院規訓以及社會規訓的形式在運作，它們散見在文本的情節中以及個體的回憶與生命歷程之中。分別代表著：

- 一、封閉的規訓權力。
- 二、逸散在開放空間之中的規訓權力。

這兩種型態，符合規訓權力從封閉的空間，逸散到全社會這種趨勢當中的兩種規訓樣態，在個體的生活領域裡構築出傅柯所說的「全景敞視」的社會。藉由對這兩種規訓典型的分析，其價值為：

- 一、呈現馴化個體的根源：我們得以勾勒出個體所身受之規訓權力的樣貌，尋得其承受之權力的形態和脈絡，理解造成個體馴化的根源。
- 二、再現蘇聯規訓社會的普遍特性：這些規訓權力所營造的全景敞視主義之監視的社會，是蘇聯中規訓權力全景的一個縮影。我們再現了索忍尼辛在集中營文學當中所批判之客體——蘇聯體制的普遍特徵，這種身處當中的個體生命情態的面貌。
- 三、權力如何透過它無所不在的監視，使個體屈從，繼而馴化：藉由分析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及其他個體所身處的權力體制，我們得以理解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對於醫療等形式進行抵制的對象和背景因素，同時理解最後主人翁被馴化的根源。

貳、 借助傅柯的異質空間和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說明癌症病房作為一個醫院規訓權力施展的場域，同時也是抵抗之空間；接著就文本當中個體對醫療行為的抵制與形式，以及性意識如何做為一種抵抗的形式被個體所展現。

- 一、 癌症病房作為抵抗空間

癌症病房當中的社會階級被抹平，人的差異被疾病所去除，因此規訓權力出現了間隙，這種間隙，使抵制與抵抗的行動具有可能性，因此推斷癌症病房是抵抗空間。

二、對醫療的抵制作為自身主體性的彰顯

由本文分析得知，曾接受軍隊、集中營等規訓權力規訓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其對於醫療的種種抵制行為，係由於他將醫療行為視為規訓權力的延伸；在抵制當中發掘並確認自身的主體性與價值，具有正面意義。

對於醫療的抵抗，具有以下脈絡：

- (一) 形塑個體的抵抗特徵：作者積極透過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徵的描繪，凸顯科斯托格洛托夫具有的抵抗性質，特別是他與周遭其他個體在抵抗意識上所具有的積極性。
- (二) 消解規訓權力所建構的知識霸權。
- (三) 排斥任何對於其主體性混淆的醫療。
- (四) 以自我治療構築個體知識權力加以抗衡。
- (五) 抗拒作為一個知識輸出的個體。

三、在性主體的捍衛中呈現的抵抗內涵

小說中，科斯托格洛托夫對於激素治療的抗拒是堅決的，因為性欲標示著自我的主體性以及意識自由的可能。文本當中性欲所具有的意義多元而富有層次：

- (一) 性欲被視為健康與不健康的分野：具有性欲成為健康正常人與癌症病體的一個分野，是主體性的一個重要標誌。
- (二) 性欲被建構成個體主體性的堡壘：文本當中將性欲與生命力進行結合，是個體主體性的象徵與彰顯，因此它所具備的意涵，就是個體具有精神自由上的隱喻。在這個層面上，性意識具備對權力進行挑戰的意涵。
- (三) 性欲提供個體在繁衍之中確立自我價值的可能：它被視為個體創造命運可能性的載體，個體得以據之對生命的可能性進行開拓，在繁衍後代之中確立自身的主體性與價值。

在性欲所具備的這些功能當中，標誌出個體性的確立以及從規訓權力

無所不在的監視當中逸出與抵制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它確保了個體對於主體性的認同。

參、異質空間

文本當中的異質空間，如傅柯對於異質空間所定義的，都具有一種功能性，一種對照性，對照出身在其中的個體之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互動關係上的一種對應。文本中出現的異質空間：流放地、國營百貨商店、動物園、薇拉的住所，分別具有不同的意義。對於曾經身受軍隊、集中營乃至醫院等機構之權力規訓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而言，它們是為相對於上述那些權力空間的「域外」，它們都標誌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從規訓權力的逸出，但卻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從流放地所具備的積極逃脫意義，乃至其它空間在提示科斯托格洛托夫所受過之規訓的歷程，反映出科斯托格洛托夫終究被馴化的事實。

觀看過往對於癌症病房的研究，多將其視為索忍尼辛集中營文學作品中的一支。往昔，若論及集中營文學，便會直接以集中營當中所存在的不人道與壓迫進行聯想，但對於文本中權力的細膩運作與空間的聯繫之研究較為缺乏。

肆、個體、權力與空間的互動

《癌症病房》文本中權力對於個體的規訓其實具有一個清晰的脈絡，這個規訓權力與個體互動的關係依存著空間施展，權力與空間在文本中積極對話，當中存在著具體規訓權力的範示，也具有個體對於權力之不同角度的抵抗。文本中的空間則是在規訓權力與個體之互動，乃至喻示個體自主性之升沉的功能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論文借助傅柯的權力理論以及異質空間理論，超越民族文學研究框架，昇華《癌症病房》各式各樣「病患」追求人性尊嚴的渴望，闡明權力操演的脈絡、空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個體在其中的升沉，為《癌症病房》乃至集中營文學的研究方向另闢蹊徑。

《癌症病房》不僅是隱喻，它強化索忍尼辛的世界觀與歷史觀，蘇聯

並非神聖俄羅斯的延續，而是俄羅斯的腫瘤、病徵。索忍尼辛反抗蘇聯多少有回復俄羅斯歷史圖像的積極意義，這是可以進一步再探討的課題。關於索忍尼辛的相關權力觀研究，應可為後續俄國文學研究者在探究文學文本當中的權力架構時，提供一個新的視野。



參考書目

原典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М.: Центр «Новый мир», 1991.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1998.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Бодался телёнок с дубом — очер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жизни*. Paris: YMCA-PRESS, 1975.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Абрикосовое варенье*. СПб: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10.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 СПб: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ека*. М.: Голос, 1995.

索爾仁尼琴著，姜明河譯，《癌症樓》。南京：譯林，2009。

壹、中文部分

一、書籍

王兆徽編，《俄國文學論集》。台北：皇冠，1979。

王兆徽譯，《索忍尼辛回憶錄》。台北：中華日報，1976。

王紹陵等，《勇者的證言——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說及反應》。台北：中央日報，1978。

王宏志，《文學與政治之間》。台北：東大，1994。

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台北：淑馨，1993。

方祖燊，《小說結構》。台北：東大，1995。

巴赫金著，白春仁譯，《巴赫金全集》（卷六）。石家莊：河北教育，1998。

卡特琳娜著，語冰譯，《米哈伊爾·巴赫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0。

卡爾·巴柏著，莊文瑞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台北：桂冠，1995

史朗寧著，張伯權譯，《俄羅斯文學史》。台北：自華，1986。

- 巴舍拉著，龔卓軍等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2003。
- 以賽亞·伯林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南京：譯林，2001。
- 尼爾森著，江惠蓮等譯，《索忍尼辛的信仰理念》。台北：橄欖基金會，1985。
- 史馬特著，蔡采秀譯，《傅柯》。台北：巨流，1998。
- 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2007。
- 牟宗三，《從索忍尼辛批評美國說起》。台北：聯合報社，1979。
- 弗洛姆著，徐紀亮等譯，《馬克斯關於人的概念》。台北：南方，1987。
- 米歇爾·傅柯著，汪民安主編，《福柯讀本》。北京：北京大學，2010。
- 米歇爾·傅柯著，尚衡譯，《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桂冠，1990。
- 米歇爾·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2003。
- 米歇爾·傅柯著，劉北成等譯，《瘋癲與文明》。台北：冠桂，1992。
- 佛克馬、蟻布思著，袁鶴翔等譯，《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台北：書林，1987。
- 拉培茲著，張平男等譯，《索忍尼辛創作歷程》。台北：長春，1974。
- 吳豐山等編，《索忍尼辛及其訪華始末》。台北：自立晚報社，1982。
- 阿格諾索夫主編，凌建侯等譯，《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1。
- 洪鏞德，《馬克思》。台北：東大，1997。
- 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
- 徐鳳林，《索洛維約夫》。台北：東大，1995。
- 徐鳳林，《費多洛夫》。台北：東大，1998。
- 索忍尼辛著，郭壽麟譯，《德譯索忍尼辛演講辭及其它》。台北：文橋，1984。
- 索忍尼辛著，斯人等譯，《伊凡·傑尼索維其的一天——索爾仁尼琴中短篇小說集》。南京：譯林，1999。
- 索忍尼辛著，黃導群譯，《悲愴的靈魂》。台北：志文，1971。
- 索忍尼辛著，黃文範譯，《古拉格群島》。台北：遠景，1975。
- 索忍尼辛著，翁廷樞譯，《致俄共領袖書》。台北：地球，1974。

- 索忍尼辛等著，《索忍尼辛與自由中國》。台北：中央日報，1982。
- 索忍尼辛等著，《索忍尼辛的諍言》。台北：文中，1982。
- 索忍尼辛等著，《索忍尼辛的聲音與迴響》。台北：黎明，1982。
- 索忍尼辛著，陳淑賢等譯，《牛犢頂橡樹》。長春：時代，1998。
- 索忍尼辛著，陳克環等譯，《索忍尼辛短篇小說及散文詩集》。台北：道聲，1979。
- 索洛維約夫等著，賈澤林譯，《俄羅斯思想》。浙江：浙江人民，2000。
- 夏鑄九等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1993。
- 梅奎爾著，陳瑞麟譯，《傅柯》。台北：桂冠，1998。
- 莫偉民，《莫偉民講福柯》。北京：北京大學，2005。
- 黃瑞祺主編，《再見傅柯》。台北：松慧文化，2005。
- 郭麗雙，《對客體化世界的反抗——別爾加耶夫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科學院，2008。
- 張杰編，《巴赫金集》。上海：上海遠東，1998。
- 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台北：時報，1995。
- 德雷弗斯、拉比諾著，錢俊譯，《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台北：桂冠，1992。
- 費德希克·格霍著，何乏筆等譯，《傅柯考》。台北：麥田，2006。
- 劉介民，《比較文學方法論》。台北：時報，1990。
- 劉孚坤等編，《索忍尼辛的震撼》。台北：先知，1976。
- 劉亞丁，《蘇聯文學沉思錄》。成都：四川大學，1996。
-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1995。
- 德瑞克·史密斯著，丘為君譯，《俄國人——知識分子與社會良心》。台北：先知，1989。
- 賴俊雄編，《傅柯與文學》。台北：書林，2008。
- 歐茵西，《新編俄國文學史》。台北：書林，1993。
- 穆瑞·史坦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立緒，1999。

羅素著，譯者不詳，《權力的欲望》。台北：水牛，1988。

蘇珊·桑塔格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台北：大田，2000。

二、期刊

汪行福，〈空間哲學與空間政治——福柯異托邦理論的闡釋與批判〉，《天津社會科學》，第3期，2009，頁11-16。

郝旭映，〈癌症樓的隱喻〉，《俄羅斯文藝》，第1期，2009，頁56-60。

陳相因，〈時代的考驗：回顧與評論索忍尼辛〉，《思想》，第10期，2008，頁49-58。

歐茵西譯，奧古斯坦訪問，〈紅色巨輪的悲劇——索忍尼辛的文學觀與歷史觀〉，《聯合文學》，第五卷，第八期，台北：聯合，1989，頁170-181。

賴盈銓，〈挑戰索忍尼辛〉，《世界文學——情慾與禁忌》。台北：麥田，2002，頁11-27。

三、論文

李細梅，《從文學—哲學觀點看索忍尼辛早期作品（*Ранне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спект)*）》。台北：俄語文摘，1998。

貳、西文部分

Русский

Акимов В. М., *Сто ле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б: Лики России, 1995.

Акимов В. М., *От Блока до Солженицына*.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11.

Ахметова Г.Д., *Языков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СПб: Реноме, 2010.

Бахтия 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М.: Худож. лит., 1986.

- Берг М., *Проблема присвоения и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2.
-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 Большев А.О., *Исповедально-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начало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СПб: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 Бушин В.С.,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М.: Алгоритм, 2003.
- Васильев В. Е.,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СПб: Нева, 1998.
- Васильевская О.Б., *Солженицын: мыслитель, историк, художник*.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10.
- Велинков А., *Сталин у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Лондон: Новый колокол, 1972.
- Вилинбахов Г., *Святой Георгий*.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1995.
- Громов Е. С., *Сталин: власть и искусство*.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8.
- Есин А.Б., *Принципы и приемы анализ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 Флинта, 1998.
- Кочетов В.П.,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на краях*. М.: Вагриус, 2000.
- Кременцов Л.П.,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XX веке. Обретения и утраты*. М.: Флинта, 2008.
- Крымский С.Б., *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путь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надежды*. Киев: Кург, 2000.
- Лосев Л.В.,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Бродский как соседи*.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вана Лимбаха, 2010.
- Нагайцевой Т.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СПб: Нева, 1998.
- Немзер А.С.,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Опыт прочтения*. М.: Время, 2011.

- Нива Ж., *Солженицын*. М.: Худож. лит., 1992.
- Парамонов Б., *След: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
- Сандомирский П.А., Савичева О.А., *Путь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большого времени*.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9.
- Сараскина Л.,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 Семенова 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ортреты*. М.: Традиция, 2010.
- Соловьев В. С.,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90.
- Струве Н. А., Москвин В. А., *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1998-2003) : Писатели, критик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ы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Альманах*.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5.
- Урманов 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о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Флинта, 2009.
- Федоров Н. Ф.,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щего дела*. М., 1987.
- Федотов Г.,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90.
- Федотов Г., «Федотов». М., 1998.
- Черняк М. 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б: САГА, 2000.

English

1. Books

- Ericson E. E., *Solzhenitsyn and the Modern World*.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3.
- Fedotov G. P., *Russian Religious Mind*. Ma.: Belmont, 1975.
- 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ume 1*.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9.
- Foucault M., *Power /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0.
- Foucault M.,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83.
- Coates R., *Christianity in Bakhtin: God and the Exiled Author*. Cambridge U. Press, 1998.
- Pomorska K., Baran H., *Jokobsonian Poetics and Slavic Narrativ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ontuso J. F., *Solzhenitsyn's Political Thought*. Virginia: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0.
- Scammell M., *The Solzhenitsyn Files*. Chicago: edition q, 1995.
- Scammell M., *Solzhenitsy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2. Periodicals

- Foucault M., "Texts /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s*, 16 (1) (Spring) : pp. 7-22.
- Foucault M.,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Power*. Ed. James D. Faubion.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p. 349-364.
- Foucault M., "The subject and Power." Afterword.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3. pp. 208-224.



附錄：俄文摘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ЧЖЭНЧЖИ
ФАКУЛЬТЕТ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

Лю Чэн Шань

呂正山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ласти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в
повести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профессор Лай Ин Цюань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ёной степени

магистр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Тайвань, Тайбэй – Июль 2011 г.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темы :

Данная магистерская работа посвящена проблемам власти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является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м "великим писателем" с мировой известностью.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темы объясняется тем, что е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и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устремлённые к правде и свободе,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свободу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человека. Однако, проблема изучения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за прошедшие годы осложняется субъективными и объективным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и. В своё время из-за тонкой миров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т. 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творчество привлекало внимание тайвань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В октябре 1982 г. поездка лауреата на Тайвань с целью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ызвал у жителей острова большую сенсацию и дискуссию. Феномен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в изгнании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при выполнении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рочества» он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выступает точно как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 наследия А. С. Пушкина (если, мы уделяем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пушкинскому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ю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Пророк») .

Как диссидент он в феврале 1945 г. был арестован, лишен звания и отправлен в Москву, в следственную тюрьму на Лубянке. Спустя четыре год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переводят в Казахстан в лагерь дл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где у него обнаружили рак желудка и считали обреченным. Освободившись в марте 1953 г., Солженицын прошел успешную лучевую терапию в ташкентском госпитале, и, чудесным образом излечился. Данные эпизоды жизни писателя нашли отражение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которая впервы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за рубежом,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ла советские власти выдворить писателя-лауреата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27 мая 1994 Солженицын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 Россию. Проехав страну о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до Москвы, он активно включается в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жизнь. Хотя он жёстко осуждал реформы при Ельцине, его жизнь по возвращении проводилась в уединении, отделяясь от власти. Зато «идеология» лауреата пользуется уважением сред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лидеров, на пример, В. Путина и Д. Медведева, которые дали указ «увековечить»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когда писатель в августе 2008 г. ушёл из жизни. Писателю вряд ли нужно себя увековечить, если он сам уже «вошёл в историю» и там назначено неповторяемое место.

О творческом замысле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и истории лечения писателем рака в ссылке, Солженицын говорил, что, услышав недавно новости о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 в марте 1953 г., он узнал, что сам заболел раком. Врач ему даже объявил, что его жизнь продлится не больше 3 недели. Потом сложилось та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что его излечили от рака, и такое выздоровление изменило его взгляд на жизнь. Писатель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свою судьбу как Б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ромысл, 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л себе больше времени, чтобы он написал для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замучены и погибл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

При чтени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не трудно понять, какое внимание писатель обратил на проблему личности персонажей: хотя механизмы власти везде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контролируют и подавляют, 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персонаж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всегда борются против них, чтобы сохранить своё минимальн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совесть и т. п. Такой упорный и никому подчиняемый характер тоже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темы повести обширны. Они проникают душу одного персонажа, который ели прошёл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в армии, концлагере, раковом корпусе. В повести изображается картина борьбы персонажа против всяких подавляющ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показывается его путь к

выживанию. Однако судьба героя и его 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 власти оказались обреченной на неудачу.

Хотя Костоглотов выступает как борец, чей стойкий и муже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 был впечатляющий,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он был приручен. Изучение мотива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ациента Костоглотова в раковом корпус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значимое, и вызывает момент дл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какая жизнь заставила его бороться против лечения? Какие силы приводили пациента к приручению и подчинению? Какие форм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оплощаются в повести?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над подобны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поможет выявить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власти-человека-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как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Ракового корпуса».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данного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вязана с обращением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который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нами как воплощение борьбы писателя против всякой неволи жизни.

Предмет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как гетеротопия, особ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наказания и приручения, от которого и герой пытается избавиться.

Объек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стоящей работы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овесть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и друг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о концлагер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Цел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 1) анализ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властью и людьми, чтобы отметить структуру власти,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в содержании повести, и её роль в приручении персонажей.
- 2) показ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ей гетеротопией и их роли в появлении

- роста и падения субъектности и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персонажей.
- 3) проя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ы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ринципами о теории власти М. Фуко.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х целей, в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установлены следующие две основные **задач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1) Анализ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ы в повести: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ы, встречающиеся в обществе и больнице.
- 2) Изучение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ей гетеротопией в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Методик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системный подход к изучению текст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1)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проявление элемент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текста,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и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формы текста.
- 2) Экстр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ссыла на фон создания текста и факторы, определяющие смысл изучаемого текста.
- 3) Компаративный метод: толкование текста на основе теорий философов М. Фуко и М. Бахтина, чтобы раскрыть глубину смысла повест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разработкой принципов анализа

- 1) теории власти и гетеротопии М. Фуко, и
- 2) теория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М. Бахтина и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её воплощения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онцлагери в вузовских курсах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могут стать материалом по изучению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мира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а также в спецкурсах по изучению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Содержание работы :

Данн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состоит из введения (первая глава) , трёх глав, заключения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Во Введение (первая глава) освещаю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темы, цели, задач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оказываются метод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роме того, в данной главе уточняются объект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обла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б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темы.

Вторая глав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власть-дисциплина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Глава "Анализ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ы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делится на 3 части.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Набросок теории Фук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

- 1)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еории власти М. Фуко.
- 2) чем теория власти М. Фук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еорий власти, созданные иным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мыслителями.
- 3) значимость его теории власти по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Вторая часть второй главы — "Анализ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ы в раковом корпусе", в которую включа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элементы:

- 1)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ы в раковом корпусе.
- 2) иерархический многоярусный мониторинг в раковом корпусе.
- 3) инспекция и контроль в раковом корпусе.

Третья часть второй главы — "Анализ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ы в обществе", показывает

- 1) функция санкции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 2) " импорт людей в документ "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ы.
- 3)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паноптисизма в обществе.

Третья глава — "Формы и значимост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ой корпус»"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формы и значимость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еорией власти М. Фуко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ся важность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властью и людьми.

В третью главу входят 4 части. В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ключается значимость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в теории власти Фуко.

Вторая часть третьей главы —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к власти" включает следующие элементы:

- 1) анализ текста в аспекте теории "гетеротопии" Фуко.
- 2) анализ текста в аспекте теории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Бахтина.

Третья часть третьей главы — "Формы и значим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к лечению" включает 5 элементов:

- 1) образ Тостоглотова как борца за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 2) значим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к инъекции.
- 3) значим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к рентгеновским лечением.
- 4)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ознания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с помощью самолечения.
- 5) значимость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трагедии быть жертво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Четвёртая часть третьей главы — "Формы и значимость сохранения сексуальной субъектност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формы и

значимость сексуальной субъектности пр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к власти-дисциплине.

Четвёртая глава — "Анализ гетеротопий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делится на 4 части: место ссыл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магазин, зоопарк и резиденция врача Веры. Сказанны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отражают движение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мира Костоглотова, процесс потери его субъектности.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подводятся итоги проведё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ела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выводы:

- 1)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тексте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власть-дисциплина оказывает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ерсонажей.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власть-дисциплину отражается субъектность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разных формах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 2) Гетеротопии,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в повести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играют рол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и изображают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персонажи.
- 3)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 не только метафора, он усиливает идеологию,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 писателя, которое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очетается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оссии. С позиции писател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 н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вятой Руси» а болезнь, рак. Борьб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против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ж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устремление писателя к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а и русской идеи.